

渭南简史

渭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渭南简史 / 渭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1.6
ISBN 978-7-224-14190-0

I. ①渭… II. ①渭… III. ①渭南—地方史 IV.
① K29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107987 号

渭南简史

编 者	渭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1.5印张 4插页
字 数	187千字
版 次	2021年6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年6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4190-0
定 价	158.00元



前言

自2012年《渭南市志》正式出版至今已逾7年，对于地方志如何服务经济社会这一课题，渭南市志办进行了细致的调研，认为志书的超大体量造成了阅读、使用的障碍，基于此原因，渭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了《渭南简史》，力求学术与趣味并存，内涵与通俗兼具。

《渭南简史》全书共15万余字，分8个部分。第一部分“河岳灵壤”概括介绍渭南市的自然环境、建置沿革、经济源流和文化脉络。第二部分“民族摇篮”通过对长期流传的神话故事和考古挖掘整理的资料，介绍了渭南先民的活动足迹。第三部分“施政纪要”选择了发生在渭南历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76个重大政事，简要回顾了几千年来渭南人民奋斗的历程。第四部分“重大战事”选择11个发生在渭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做了典型记述。第五部分“文物古迹”介绍了地方文化特色鲜明的古代建筑、帝王陵墓、碑碣墓志、博物馆纪念馆。第六部分“民间文化”诠释了独具渭南特色的戏曲、方言、习俗、饮食、艺术等演化的历史全貌。第七部分“人物”概括介绍了渭南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19位人物的简要事迹。第八部分“美丽渭南”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渭南已经建设成为国家农产品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工业大市，形成了密集便捷的交通网络，生态文明、宜居城市建设取得明显变化，介绍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景区。

《渭南简史》是一部浓缩的渭南历史。希望它的出版发行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志书纷繁芜杂、不利检索的弊端，成为深入了解渭南、渭南人民的一扇窗口。

目 录

一、河岳灵壤.....	1
二、民族摇篮.....	10
三、施政纪要.....	18
四、重大战事.....	52
五、文物古迹.....	76
六、民间文化.....	88
七、人物.....	119
八、美丽渭南.....	164

一、河岳灵壤

渭南市地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圆点近旁，黄河流域中游，西北黄土高原东南缘，陕西关中盆地东部，地理坐标为北纬 $34^{\circ}13'$ ~ $35^{\circ}52'$ ，东经 $108^{\circ}58'$ ~ $110^{\circ}35'$ 。东与山西运城、临汾隔黄河相望，东南与河南三门峡毗连，西和西南与咸阳、西安相接，南跨秦岭与商洛为邻，北倚黄龙山与延安、西北与铜川接壤。是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东大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处于亚欧大陆桥的中部，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前沿地带。境内南北长182.3公里，东西宽149.7公里，总土地面积13134平方公里。辖2区7县3个开发区1个风景名胜區，代管2个省辖市，538.29万人。

1. 自然环境

渭南地貌类型多样，适宜人居。秦岭、黄龙山脉，玉屏侧立；黄、渭、洛河，三水盘流；渭河平原，广袤坦荡。这里有险、奇、雄、秀的西岳华山，灵泉千眼的黄河湿地，此起彼伏的平原沙苑，众多各异的秦岭峡谷。境内平均年径流量大于1000万立方米的河流30条，多年平均总径流量486.92万立方米。地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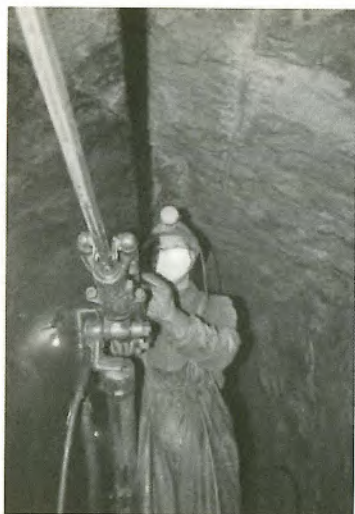
洛河乾坤湾

地下水资源总量20多亿立方米。临渭区、华州区、华阴市、韩城市的黄河漫滩和渭河傍河区为地下富水区，大荔、蒲城、富平等县的地热水资源丰富。

渭南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适宜。除秦岭山区外，年日照时数2009小时~2528.1小时，平均气温 11.5°C ~ 13.6°C ， 0°C 以上积温 4250.3°C ~ 5022.9°C ，大于 10°C 积温 3780.8°C ~ 4509.4°C ，是关中地区热量的高值区。无霜期为199天~224天，年降水量508毫米~608毫米。



金钼集团露天矿



潼关黄金开采

全市常用耕地面积52.59万公顷。有野生动物360多种，其中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35种，如丹顶鹤、黑鹳、大天鹅、青羊、金鸡等。人工饲养的畜禽20多种，其中以秦川牛、关中驴、奶山羊等量大质优，驰名全国。有野生植物2500多种，栽培植物150多种，主要有小麦、玉米、谷子、薯类、豆类、棉花、烟叶、油菜、花生、芝麻、苹果、酥梨、柿子、葡萄、花椒、红枣、核桃、板栗、杏、桃等。

全市已发现矿产51种，探明储量的有煤、钼、铅、锌、铁、铝、白银、石灰石、大理石、蛭石等33种，易开采的20余种，以煤、钼、金、铜、石灰石、大理石为优势矿种。煤地质储量255

亿吨，已探明储量50亿吨，保有储量49亿吨；钼已探明储量150万金属吨，居全国第二位；铜保有储量21.7万金属吨，占陕西省45.7%；石灰石地质储量133亿吨，保有储量5400万吨，是烧制水泥的优质原料；大理石储量1.3亿立方米，为优质建筑材料。潼关被称为华夏金城，华州区被誉为中国钼都。

2. 建置沿革

渭南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距今180万年至100万年前，在今大荔、蒲城交界的洛河两岸和临渭区、华州区南部生活着古人类。23万年至18万年前，较完整的古人头骨化石在今大荔县段家镇解放村出土，是全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接近于直立人的早期智人，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命名为“大荔人”。约5000年前，氏族部落联盟领袖轩辕黄帝在华山召开各酋长会议，境内时有华、阳武等大批氏族部落。大禹划九州，渭南属雍州。



刘家洼周代遗址—芮国古墓群

夏代，在今合阳县洽川一带封有莘国。殷商时，境内封有芮、莘等国。西周时，渭南全境属京畿的一部分，封有郑、

彤、郕、芮、莘、韩、梁等国。周平王五十一年（前720），大荔戎族部侵入，灭郕据芮，建大荔戎国。除方国外，有彭衙、屠等城邑。春秋前期，城邑增加，境内东部属晋，西部属秦，后全部归秦。周庄王十年（前687），秦国在今华州区设郑县，属中国最早的县之一。战国时期，魏国派大将吴起夺回黄河之西原属晋国之地。周威烈王二十年（前406），魏国在境内黄河以西、洛河以东、南起华山、北至韩城置西河郡，吴起为郡守。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秦败魏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迫魏献河西地，境内全属秦，秦普遍置县。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在京城咸阳设内史，渭南市境内属内史东部。项羽占据关中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大封天下。封司马欣为塞王，境内属塞国。西汉高祖元年（前206），刘邦灭塞国后，将境内南部划属渭南郡，北部划属河上郡。九年（前198），全部改属内史。太初元年（前104），南部改属京兆

尹，北部改属左冯翊。新莽时，南部属翊尉郡，北部属师尉郡。东汉时期，南部复属京兆尹，北部复属左冯翊。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句龙王吾斯等造反，朝廷将上郡治所迁至夏阳（今韩城市）。

东汉建安初，渭南境内设左冯翊郡，辖5个县，属辖区内第一个体制完备的县以上政区。三国时，更名为冯翊郡。北魏太平真君八年（447），迁北地郡治所至泥阳县通川（今富平县流曲镇）。太和十一年（487），于李润堡置华州，辖华山、白水、澄城3郡。景明元年（500），移华州治所于武乡县（今大荔县）。孝昌二年（526），于郑县置东雍州。孝昌三年（527），在今临渭区光明原上设过渭南郡。西魏废帝三年（554），改华州为同州，改东雍州为华州。同州、华州在境内延续了一千多年。北周闵帝元年（557），在富平县中华原上设过中华郡。建德三年（574），在今临渭区巴邑设过延寿郡。唐武德三年（620），在河西县（今合阳县洽川镇一带）设过西韩州。金贞祐三年（1215），设祜州（治所今韩城市）。元至元六年（1269），撤祜州。清康熙五年（1666），设潼商道，治所潼关县。雍正十三年（1735），同州升为府，华州降为散州连同属县并入同州府。



潼关古城西门

民国二年（1913），撤销府、州，渭南境内各县属关中道。二十七年（1938），在大荔设第八行政督察区。三十七年（1948），在华县设第二行政督察区，在蒲城设第十一行政督察区。

1949年3月渭北各县相继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设大荔分区，辖8县（大荔、合阳、朝邑、平民、韩城、澄城、蒲城、白水）；设渭华分区，辖6县（渭南、临潼、蓝田、华县、华阴、潼关）。5月，渭华分区更名为渭南分区。1950年5月，大荔分区并入渭南分区，渭南分区更名为渭南专区，驻渭南，辖13县（渭南、临潼、蓝田、华县、华阴、潼关、大荔、朝邑、合阳、韩城、澄城、蒲城、白水）。1953年1月，渭南专区辖县18个，增辖富平、耀县、三原、泾阳、高陵5县。1956年10月渭南专区撤销，各县由省直辖。1961年8月，渭南专区复设三

原、泾阳县划归咸阳市，高陵县划归西安市，渭南专区辖14县及铜川市。1966年6月，铜川市改由陕西省直辖。1969年10月，渭南专区改称渭南地区。1979年11月，耀县划归铜川市。1983年9月，临潼、蓝田县划归西安市。1984年1月，渭南、韩城撤县设市。1990年12月，华阴撤县设市。1995年5月，撤销渭南地区，设立地级渭南市。原县级渭南市改称临渭区，韩城、华阴2市改省直辖，由渭南市代管。至2017年底，渭南市辖2区2市7县。

3. 经济源流

渭南的经济发展山回水曲、源远流长。距今8000年以前，渭、洛河下游的先民制作精细石器，从事渔猎。老官台文化时期，华县老官台、元君庙和临渭区北刘、史家等地的先民从山区走向平原，开始了早期粗放农耕和广谱采猎活动，种植粟类，驯养家畜，制作陶器。华州区泉护村1997年出土的彩陶盆是中国至今发现最早的彩陶，被誉为彩陶之源。黄帝时在今富平荆山冶铜造鼎¹。杜康在今白水酿酒，揭开了华夏民族饮酒的历史。后稷在永丰教稼，促使农业走出原始化。舜帝时，黄、渭、洛河通航。夏、商、周时，尤其是西周，境内种养业已经成熟，并大量出现了青铜冶炼、制陶（瓷）、玉雕、织造、酿造等手工业。国家管理经济的封土建国（邑）、缴纳贡赋、“井田制”等级奴役制度随之产生，成为古代经济发展的基础。



黄河高铁第一桥（张让欣拍摄）

¹ 见《史记》卷十二。《汉书·地理志》载：荆山在冯翊怀德县也。怀德县城在今富平县华朱乡怀阳城。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凭借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向东扩展，渭南境内陆续归秦。公元前3世纪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成为诸侯强国。时年，渭南境内农业已比较发达，畜力牛耕和铁质农具得以使用，产量倍增。郑县（今华州区）、夏阳（今韩城市）已有冶铁官建置，设有专门作坊。公元前257年，秦国在临晋关（今大荔县朝邑镇东）黄河上首建浮桥。公元前246年，秦修筑郑国渠，引泾河水灌田，今富平、蒲城等县农田受益，农耕文明再度提升。秦统一六国后，农耕“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以冶铜、冶铁、制陶、酿造、织造等为主的手工作坊遍及各城邑。建筑用的砖瓦、陶管和雕饰成为秦代新兴的文化。黄、渭、洛河航运发达，陆地上形成了横跨全境的函谷干道和临晋干道。商贾交换相应频繁，铜质货币出现。公元前120年，汉武帝诏修龙首渠，自澠（今蒲城县洛滨镇避难堡村）穿渠引洛水，至商颜山（今铁镰山，在大荔县西北），灌田万顷余。此后，直至东汉末年，渭南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魏晋南北朝时，国家四分五裂，政权更迭不已。渭南境内虽有前秦苻坚短暂“偃甲息兵”的“劝课农桑”和减轻税赋等策略，但经济总体衰退，耕地荒芜，商业凋敝。

隋唐定都长安后，渭南出现较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地方官府奖励垦荒，修复水利，铸造新式农具，推行粮田复种，境内各州、县粮仓丰盈，渭河两岸桑、麻相望。纺织、印染、采矿、金银器制作、陶瓷碾础和石料加工、酿造等手工业门类众多，其中石刻艺术高超，售往全国各地。交通运输以长安为中心，陆路主干驿道和境内州县驿道相接，并在黄河临晋关架设了以两岸铁牛为柱的大型铁缆浮桥，商贾往来十分方便。商品交换出现“飞钱”形式的初级汇兑票据，对外贸易以西域大食（今阿拉伯）为主要对象，瓷器、丝绸、药材大量出口。五代后，京城东迁，战争频发，境内华州、同州人丁稀少，户额分别减少了48%和55%，经济发展延缓。直到宋真宗年间，流民归田，粮食产量增加。矿业开采、冶炼较唐代有所进步，瓷器制作、生丝织造、造纸亦较普遍。商业贸易渐次回升。金元代，连年穷兵黩武，境内经济备受摧残。明代，耕地扩大，人口增加，商品经济萌生，经济逐步发展。明万历年间，关中缴纳粮赋最多的11个县中，境内有蒲城、渭南、富平、澄城、合阳5县。其中蒲城达到54533石，为陕境之冠。商流活跃，成为北京至陕、甘、川、疆的货物中转站，连接华北、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作用不断增强。清代，华州（散州）、合阳、朝邑、渭南、大荔等县棉花生产初具规模，棉花家纺遍及农村。白水、澄城建矿采煤，华州、韩城铁器远近闻名，同州制绒、裘皮驰名陕甘川等地，富平石料雕刻名扬天下。境内出现了现代

金融汇兑、邮政电信等新兴产业。清末，由于政治腐败，民族和社会矛盾迭起，加之烟毒泛滥，灾荒不断，经济衰落。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事不断，渭南经济时苏时衰。民国十六年（1927），境内棉田达180万亩，占陕西省的37%。现代机器引入，渭南、韩城、澄城等县数家棉花打包厂、煤矿和面粉厂先后开工。公路、铁路亦通行渭南，大部分县通邮，并开通长途电话。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境内发生通货膨胀，农户破产，企业倒闭，经济全面崩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渭南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已基本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向规模化、设施化、现代化发展。工业门类基本齐全，企业摆布相对集中，向高科技、高附加值、循环链条式迈进。对内对外贸易两旺，逐步与国内、国际经济接轨。两纵一横跨境高速公路和4条铁路干线、4条铁路支线交织成网，密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4. 文化脉络

渭南的文化起源很早，形式多样，底蕴深厚。在彩陶源头华州区老官台一带，出土距今7000年左右彩陶的形状、纹式、颜色、图案很有特点，特别是玫瑰花、太阳鸟图案，显示了古老东方文化的典型风格。黄帝时期，阳武（今白水县史官乡一带）人仓颉收集、整理、创造了较系统的汉文字，奠定了华夏文化发展的基础。

夏末商初，有莘国（今合阳县洽川镇一带）人伊尹，著有《伊训》《肆命》《徂后》《咸有一德》《太甲训》多篇。西周，《诗经》中的《周南》编入不少产生于渭南境内的诗作，其中首篇《关雎》最具代表性。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高徒卜商（字夏）设教西河（今合阳、韩城一带），开渭南教育之先河。吴起在任西河郡守的二十余年



洽川日出

雷强民拍摄

撰写了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吴子兵法》。中国最早的长城魏长城穿河沿山纵跨境



内。秦国运用先进技术，在临晋关建起了第一座黄河浮桥。

秦代之初，倡导“车同轨、书同文”。下邳（今临渭区北部）人程邈，创造了3000个隶书字，同李斯的小篆一起用来统一六国文字。汉代，境内有19部著作留世。夏阳（今韩城市）人司马迁的《史记》，影响中国2000余年，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华阴人杨震，设教馆多处，育弟子3000，被后世称为“关西夫子”。境内的《曹全碑》，是汉隶的代表作，被西安碑林推为镇馆之宝。同时代的《仓颉庙碑》《华山庙碑》亦被称为神品。著名汉乐府《陌上桑》记述事件的发生地，就在今天的华阴市罗敷镇一带。宫廷乐曲传至州县，促使了后世地方戏剧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大量涌入，境内战争不断，驻军增多。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使文化与艺术种类和表现形式多样化。渭北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锣鼓队。拴马桩成为一项新兴的石刻艺术。冯翊（治所今大荔县）人王遇，主持了北魏大同、洛阳两座皇宫主要建筑的设计和修建。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达摩偕弟子慧可西游，在夏阳（今合阳县洽川镇夏阳村）创建光济寺，境内佛教由此兴起。隋唐时期，弘农华阴人杨坚二次统一中国，留下兵书30卷。杨广敕选《文章总集》5000卷，堪称旷世之作。下邳（今临渭区北部）人白居易著《白氏文集》75卷。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创作了代表作“三吏”“三别”。李白、王维、王昌龄、刘禹锡、韩愈、李商隐、张九龄、李世民、李隆基、魏征等均在渭南境内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民众与驻军创作的威武雄壮的《秦王破阵乐》，代表了唐代音乐歌舞的顶尖水平。具有浓郁民俗文化特色的焰火、社火等也兴盛于城乡。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频繁交替，渭南亦有杨凝式的《夏热帖》《神仙起居帖》《韭花帖》等书法作品留世。宋代，陈抟居华山传道，著有《先天图》《易龙图》《指元篇》著作多部。元、明时期，境内地方戏曲逐步兴盛，形成多种地方剧种，以地摊戏、皮影戏、木偶戏等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兴建书院十余座，教育由随意性的私塾向正规化过渡。韩邦靖编纂的《朝邑县志》成为天下名志。境内产生各类著述537部。宗教增多，伊斯兰教随着回族民众的风俗习惯开始兴起。

清代，渭南地方戏剧步入鼎盛时期，形成跳戏、老腔、同州梆子、秦腔、眉户、阿宫腔、碗碗腔、线腔、石羊道情等十几种戏曲。剧作家李芳桂、李灌创作40多个剧本，有些被移植成各种剧种，演出长久不衰。各种班、社应运而生，产生了申祥麟、白长命、黄三儿、魏长生等一批跨江进京演出的名演员。府学、州学、县学、书院、乡学、社学等各类教学机构全面兴起。州志、府志、县志、

专志、乡土志纷纷编纂。境内形成各类著作1110部。

民国时期，现代教育逐步兴起，杨松轩、党晴梵、杨虎城先后创办了咸林中学、合阳中学、尧山中学，境内小学、中学、师范、职校形成一定的覆盖面。新的戏剧班社维新社、正化社、觉民社、培风社、怒吼社等接连成立，不仅改编传统剧目，还给戏剧注入抗日、革命、进步等内容。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创办了文化图书社和小型报刊。摄影、广播、黑白电影开始进入渭南。著名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在家乡主持设计、修建了洛惠渠、渭惠渠等大型水利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渭南的地方戏剧、新闻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图书、文学创作、文物保护、民间艺术、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地方志编修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学前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已成体系，职业教育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卫生设施、体育设施遍及城乡，科技成果、文化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科技正纳入全国统一布局，境内建成北京时间报时中心、卫星回收中心、卫星测控站等重大科技设施。

二、民族摇篮

渭南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民族发祥的神话传说，也有字史佐证，更有遍布境内的先民足迹可供踏寻。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与文字记载的正史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民族创生神话本身承载了先民的集体记忆，这种神话认同，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在渭南体现得比较充分。仓颉造字所引起的“天雨粟，鬼夜哭”，既是神话传说，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黄帝会群仙于西岳华山、造鼎于富平荆山，司马迁从历史传说与神话中为民族探源，将黄帝作为《史记》开篇《五帝本纪》的第一人，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近代章太炎考证，华山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中华”“华夏”皆因华山而得名。现代考古则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可以从渭南数千年的发展中领略中华民族文明传承史。这些说明，地处渭洛河下游，关中平原东部最开阔地带，黄、渭、洛三河汇流处的渭南大地，实际上就是肇端于新旧石器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华先民最早繁衍活动的生息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是华夏民族形成的摇篮。

1. 远古足迹



大荔猿人

古时渭南气候温润，地形多样，河流纵横，湖泊广布，林木茂盛，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现代有学者从史料及考古成果验证：古三门湖是中华民族摇篮，是炎黄的发祥地，渭南就处于古三门湖的核心区段。全市相继发现古文化遗址600余处，其中旧石器时代14处，中石器时代30处，新石器时代500余处，证明渭南是先民广泛活动的区域。

甜水沟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遗址出土的2291件石制品表明，约180万年至100万年前，今大荔、蒲城交界的洛河两岸，

劳动生息着古人类。约115万年蓝田公王岭遗址表明，今临渭区、华州区南部（同一地质单元）生活着古人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证：大荔县段家镇解放村发现的较完整的古人头骨化石，距今约23万年至18万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接近于直立人的早期智人，遂命名为“大荔人”。约3万年前的韩城禹门口洞穴遗址出土的1202件人工打制石器，说明旧石器时代人类在此活动。距今8000~4000年的华州区元君庙一泉护村遗址面积大，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已成为研究仰韶文化、探讨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结构的代表性范例。

2. 风陵千秋

女娲，这个中国人传说中的抟泥造人者，也与渭南息息相关。原属渭南地区的临潼骊山最高峰之上，传说有当时女娲补天的采石场。至今这里还有一座供奉伏羲女娲的古老寺庙香火氤氲。而在相邻的渭南市临渭区的川里史村，当地人说女娲是川里史的女儿，专门建立了“姥姥庙”来纪念她，



甜水沟遗址

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平安。在潼关，距离黄、渭、洛三河交汇处大约10公里的黄河南岸，有一座高约百米，阔约数千亩的土山，名叫东山，也叫“女娲山”，相传是女娲造人之处。女娲昼夜不停地造人，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于是便长眠在了黄河岸边，后人尊她为娲皇，其墓号为风陵，如今连接山西、陕西的风陵渡也由此得名。

创八卦的伏羲氏，以大智慧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唐代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写道：“太昊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祭天而为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这个传说明显带有原始母系氏族的烙印，只知母，不知父。而华胥氏则活动于原属渭南地区的蓝田一带。《太平寰宇记》载“蓝田卫三皇旧居，境内有华胥陵”。《陕西通志》中说：“羲母（华胥氏）陵在蓝田县北三十五里”。蓝田当地曾经有石碑刻文：“古华胥伏羲肇娠地”等字样。据有关专家研究考证，这位华胥氏在中华先祖中的位置是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因此，华胥氏为中华民族

的始祖母，是民族之母。

3. 陶韵久长

制陶是中国古人类活动对女娲抟泥造人的现实演绎，也是人类制造史上的一次飞跃。约8000年至6000年前的临渭区北刘、史家、白庙遗址，华州区元君庙、老官台遗址表明，渭南先民已能制造陶器，种植粟。老官台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当时的先民们已经种植粟类植物，并饲养猪、狗等家畜，过着定居的聚落生活。当时的制陶工艺比较原始，火候低、器类少，彩陶尚处在萌芽阶段。这里出土一些彩陶片和三足陶灶，还有大量双唇口光底瓶、曲腹盆、罐、甑等器物，其中还有一件铜筭，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铜制品之一。



尧头窑

先民制陶的技艺在渭南得到延续。2008年，富平县城北发现的一处窑场出土了大量的陶瓷碎片，包括砖瓦瓷、黑釉、黄釉、青釉、白釉及花釉，时间跨越汉、唐、宋、元各朝代。澄城县尧头窑则从唐朝至今，一直烧制瓷器。

4. 荆山造鼎

富平县西南的荆山，名为山，实是一片沉厚的台塬，当地人称掘陵原，刘邦葬父于此，称太上皇陵。《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汉书·郊祀志》有相同的记载。《书·禹贡》：“导岍及岐，至于荆

山。”孔颖达疏：“《地理志》云：《禹贡》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

《后汉书·郡国志一·冯翊》刘昭注引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禹铸鼎於荆山，在冯翊怀德之南，今其下（有）荆渠也。”怀德是富平的旧称。1989年，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杨东晨在《中华都城要览》中指出：“黄帝铸鼎的荆山有湖南衡阳、陕西朝邑、陕西富平、河南灵宝、安徽怀远之说，但陕西富平、河南灵宝记载较多，且陕西富平距黄帝葬地桥山（陕西黄陵县）较近，比较可靠。”唐代李泰的《括地志》云：“雍州荆山，即黄帝及禹铸鼎地也。”今富平境内的吕村塬上有一铸鼎村，相传为铸鼎处。唐天祐二年（905年），在今富平境内的美原镇设鼎州。清代富平文人陈觉有《荆山铸鼎》诗曰：“维禹实大智，疏浚有先后。乘辇荆山顶，用古洪炉烟。山峙渭之北，漆沮绕其前。山明水亦秀，铸鼎辨神奸。”

另外《史记》卷十二载，约在5000年前黄帝常登华山，大会群仙。据《华山经》云：华山“白帝少昊司之，百神之所冢也。盘古死，委厥足巨灵掌以通河曲。轩辕氏莅止，乃会神祇。”这也可以看作是黄帝在华山会见氏族部落首领，相当于原始部落联盟召集的首脑会议。其实，黄帝时期，渭南就居住着不少氏族部落。夏商时境内先后有莘国、芮国等方国古邑。

5. 文字传承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通用文字。汉字从诞生以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在汉字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渭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历史上公认仓颉是中国文字之祖，是汉字的创造者。《荀子·解蔽》《韩非子·五刑》《吕氏春秋·君守》等许多典籍中，都记载着仓颉造字的事迹。仓颉是古阳武（今陕西白水杨武村一带）人，任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文字，对于现代人来说，无异于天书。位于白水县史官村的仓颉庙中，《仓圣鸟迹书碑》上的28个字，普通人虽然无法理解它的意思，但不能否认，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早期的文字符号，才有了今天的汉字。

仓颉创造的文字，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到了商、周时期，形成了甲骨文和金文，这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汉字。到春秋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各居一方，各个国家的汉字，形体有很大的不同。秦统一六国后，为了方便交流，对文字进行了改革，把复杂的大篆改为小篆，并全国统一推广使用。秦朝下邳县（在今渭南市临渭区）人程邈做抄写公文的狱吏，喜欢研究文字，很快就能熟练地书写小篆。后来，他犯事被关押在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狱中，除从事劳役之

外，专心研究文字，整理出三千多个比小篆简易的新型文字，上奏朝廷。朝廷同意先在隶人（工役）中使用。秦朝很快结束了，但程邈改进的这种文字却流传下来，这就是汉朝普遍使用的隶书。隶书以横、竖、点、撇、捺的用笔方法，取代了篆书绘图式的圆转用笔法，既方便学习，写起来也简便，使汉字向实用性迈出了一大步。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记载郃阳县（今陕西合阳县）令曹全世系与政绩的《曹全碑》，既是渭南汉隶文字成熟的标志，也代表了当时全国汉隶文字的发展水平。

汉字发展到唐朝，形体方正、用笔规矩、结构森严的楷书和流动、自如、轻松、潇洒极具实用性的行书广泛流行。渭南境内唐朝的汉字楷书和行书作品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在全国名列前茅，如褚遂良书写的《同州圣教序碑》、李邕书写的《云麾将军碑》、张少悌书写的《高力士碑》等均为汉字名碑。宋、元、明、清各朝，汉字的字体没有大的变化，渭南境内也留下一批在当时以至现代具有一定影响的汉字作品，如宋朝陈抟的《开张天岸马碑》、元朝的《蒙汉合文碑》、清朝毕沅的《重修西岳庙碑》等。金代澄城铁钟铭文，上有162个简体字，是中国简体字之源。渭南的先哲们既创造和传承了汉字，也应用汉字记录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献，据不完全统计，渭南市历史上成书的仅地方志书就有160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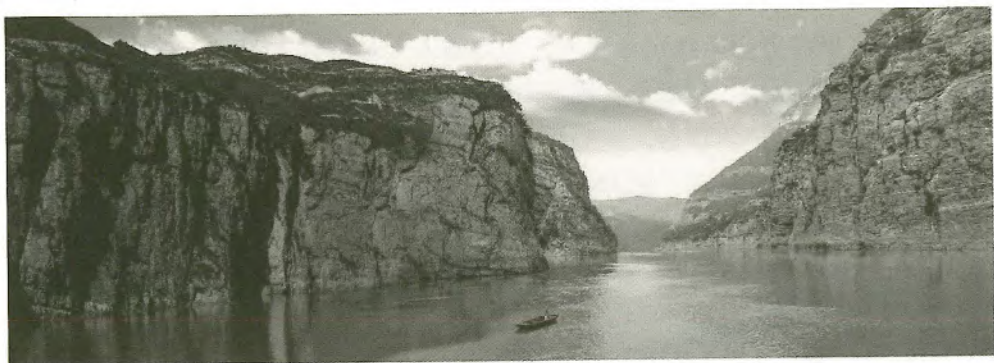
6. 尧巡舜狩

相传唐尧、虞舜及周武王都曾巡狩华山，事载《华岳志》《史记·封禅书》等。尧与华封（今华阴）人的对答，还留下了华封三祝的典故。古时在今华阴市岳庙办醴泉立有石碑，以志其事。据《庄子外篇·天地篇》所载：“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多福、多寿、多子孙，在中国民间这三种祝愿都是最美好的。后人以“华封三祝”为祝颂多福多寿多子孙之辞。亦有据此典故绘画雕图，后成为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之一。通常是以竹或天竹谐“祝”字，配上其它两种吉祥花卉，凑成“三”数来表达“三祝”寓意。或者因“竹”与“祝”谐音，画三棵竹，也可寓意“三祝”。此外，还有一种用佛手、桃和石榴组合的《福寿三多》吉祥纹图，也含“三祝”之颂，以“佛”寓多福，以“桃”寓多寿，以“石榴”寓多子孙，亦称《三多图》。郑板桥就有题画诗：

“写来三祝乃三竹，画出华封是两峰”，即寓意“华封三祝”。

7. 禹凿龙门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传说。据说，在尧的时代，有一个部落首领叫鲧，住在有崇，号“崇伯鲧”，这便是禹的父亲。尧命他治理洪水，他用筑堤的方法去“堵塞”，结果用了九年也没有把洪水治好，被尧杀死在羽山。舜命他的儿子禹继承父业治理洪水，禹改用“疏导”的方法，开山挖河，把洪水导入河海，终于平息了水患。大禹治水有功，后来舜便把天下禅让给他，建立夏朝。在治水过程中最有名的就是凿通龙门。



龙门（图片来源韩城市博物馆）

黄河流经禹门（龙门），河道渐狭，河水腾激山浪，人称“禹门三级浪”。禹门出口处，宽百余步，水流湍急，波涛汹涌，真是“平地一声雷”。相传大禹治水，走到黄河中游（今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省河津市交界处），发现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黄河之水在这里无处宣泄。禹领人凿山开道，使黄河水一泻千里。禹看黄河水如游龙从此畅通无阻，便把此门命名为龙门。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又将龙门称为禹门。这就是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禹治水的事迹最早记载于《墨子·兼爱中》：“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注后之邸，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

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不避寒暑，不畏艰险，正是这种恒心和毅力，振奋人心，这才战胜了洪水，疏通了河流，奇迹般地开凿了龙门天险。禹门口黄河两岸均建有禹庙，韩城咎村镇王带村大禹庙至今还有古代绘制的禹凿龙门壁画传世，表达了两岸人民对英雄的纪念。清顾炎武曾作《龙门》诗一

首，颂扬禹凿龙门的不朽功绩，诗曰：

亘地黄河出，开天此一门。

千秋凭大禹，万里下昆仑。

8. 姓氏人口

渭南历史悠久，在华夏民族的肇始发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多的名人给渭南形成了一些望族名姓，如天下杨氏出华阴、郑姓源起在华州。目前渭南户籍显示的中华姓氏有千余个。这在国内除省会城市以外的地级市里，比较少有。这与渭南是陕西省第二人口大市（西安第一）有关，201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538.29万人。

同时，也与中华民族发祥有关。“大荔人”是由猿人向智人过渡时期的代表。随着人类的发展，婚姻形态逐渐向族外群婚过渡，昭示氏族制度开始形成，是后世姓氏的发端。再往后，人类社会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向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在关中地区除半坡遗址外，还有临潼姜寨、华州的泉护村和元君庙、华阴横阵村和临渭史家村等处，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郑桓公墓

当然，这也与渭南历史上地处京畿，名人辈出相联系。在渭南现存的姓氏里，不但张、王、李、赵、孙、刘、黄、杨诸多大姓比比皆是，众多复姓如皇甫、上官、欧阳、诸葛、司徒、司马及令狐、呼延、相里、金中、延陵、公冶、第五、端木、单于，等等，也为数不少。甚至叶赫那拉、无西列氏等多字姓氏，也出现在渭南这片文化悠远的土地上！

特别是渭南在历史上，也产生了不少姓氏。例如，“杨”“恽”“能”“史”姓起源于华阴，“郑”姓起源于华州区，

二、民族摇篮

“冯”“同”“相里”起源于韩城，“印”“雷”“吉”“党”姓起源于大荔，“仓”“苍”（本为仓颉氏、苍颉氏，后省简为单姓）、“颉”“史”姓起源于白水，等等，均有详细出处与记载。而郡望在渭南的有杨、刘（弘农郡，华阴古属弘农）、支、轩辕（合阳郡）、雷、吉、印、党、梁、严、郭、陈、王、颉、鱼、焦（冯翊郡）、毛、宰、相里、卜（西河郡）、蔺、严、郭（华阴郡）等。郭姓则以冯翊、华阴等为堂号，雷、吉、陈姓以冯翊等为堂号。一些地名，也彰显了渭南的姓氏文化，如韩城市新城街道办事处相里堡、华阴市孟塬镇爨家村。

三、施政纪要

1. 郑浑募民灭梁兴

东汉建安十七年（212），郑浑出任左冯翊郡左冯翊之职，时山匪梁兴聚众扰乱辖地，掠民5000余家，诸县不能抵御，官吏纷纷寄居郡城。议者以为逃移避险，郑浑则主张组织吏民抵御。他说：“梁兴等散窜在山，凭借山险扰乱，而据险自守，此示弱也！今当广开降路，宣谕恩信而招降其众，灭其锐气。”于是，召聚吏民整修城廓，并招募军民出城逐讨，明令得其财物者，获十赏七，百姓大悦，皆愿追捕梁的士卒，多得财物。山匪中失妻、失子者，陆续来降，郑浑斥责之后，归还其妻、子，令其择业安居，转相告谕，降者相继，前后归附计4000余家，均予安置。这时，郑浑乘梁兴兵势锐减之际，亲率吏民斩杀了梁兴及其支党，郡境安定，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县，令其勤稼穡，明禁令，保民安居乐业。史称郑浑清素在公，家人不免饥寒。

2. 元燮表奏迁华州于新筑城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分雍州地于华阴县李润堡（今蒲城县永丰镇温汤村东一带）置华州。北魏宣武帝初，拜安定王次子元燮为征虏将军华州刺史。元燮认为州治不宜设在李润堡，故上表奏请迁州治于冯翊。他奏说：“今州所在，岂惟非旧址，乃居冈饮涧，井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返数里，谄谀明昏，有亏礼教，未若冯翊面华渭，包原泽，井浅地平，樵牧饶广。采材华阴，陆运七十，伐木龙门，顺流而下，陪削归雉，功省力易，人各为己，不以为劳。昔宋人无井，穿井而欣得；合城无水，得水而不家庆？窃闻前政刺史非是无意，或值兵举，或遇年灾，缘此契阔，拖延至今。去岁已熟，秋禾大登，四境宴安，京师无事，丁不十钱之费，人无八旬之勤，损轻益重，乞垂昭鉴。”宣武帝允准，遂诏曰：“一劳永逸，便可听移。”于是，随即修筑新城，于景明元年（500）移华州治于新筑的华州城（今大荔县城），使州、郡、县同城而治。

3. 杨津坚持公尺收绢

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杨津出任右将军华州刺史。到任前境内收绢时，度尺特长，百姓苦不堪言。杨津得悉后，严令按照朝廷规定的标准公尺验收，对质量好的赐以杯酒，以示褒奖；对于质量稍差的虽亦收受，但无杯酒，以示治耻。于是，人竞相劝，收、调绢相当顺畅，受到吏民称颂。

4. 寇儁秉公还地

北魏孝明帝正光六年（525），寇儁任华州司空府记事参军，后任主簿。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州民史底与司徒杨椿为田产打起官司。长史以下皆附势于杨椿，欲以田产归杨椿。惟寇儁执意不从，说：“史底穷人，杨公横夺其地，为何欲损不足以给有余？”在寇儁的坚持下，终将该地还给史底。孝庄帝知道此事后，嘉其守正不挠，即拜司马，赐帛百匹，并谴责了附势杨椿的官员。

5. 贺兰祥兴修水利工程

西魏大统十六年（550），贺兰祥被任命为大将军。文帝以泾、渭灌溉之处渠堰废毁，农田不能灌溉受益，乃令贺兰祥率领军民修造富平堰，开渠引水，东注于洛，灌溉富平脾阳、大泽、丰润民田40里，人获其利。废帝二年（553），元钦任命贺兰祥为华州刺史，以大将军行华州事。废帝三年（554），元钦改华州为同州，仍以贺兰祥为刺史。任期内动员百姓在石川河修筑了龙门堰、石川堰、常平堰，灌溉富平民田。

6. 达奚武不持威仪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达奚武因战功出任同州刺史。天和三年（568）转任太傅。虽居重位，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一二人从，门外不施戟，平日只闭一扇门。有人问他：“公位冠群，何轻率若是？”达奚武正言答道：“吾昔在布衣，岂望富贵！今日富贵，不可顿忘畴昔，且天下未平，国恩未报，遇事安可威容乎？”言者惭愧而退。时同州遇旱。武帝令达奚武祀华岳岳庙。惯例祭山均在山下常所祈祷，达奚武对僚属说：“吾备位三公，不能燮理阴阳，使天子焦劳，罪责实深，不可与众人祀常所，必登峰展诚寻其圣。”华岳高峻险绝，人迹罕通。达奚武年逾六十，随数人攀藤而上。晚不能还，即于山上席草而宿。天明，云雾四起，大雨普降。武帝闻之，玺书慰勉，赐绢百匹。



7. 田式请托不行

田式，下邳县（今渭南市临渭区）人，三世守同州，世所罕见。其祖田安兴，其父田长乐，西魏时先后任同州刺史。田式性刚果，多武艺，尤以拳勇绝人，北周时出任渭南太守，政尚严猛，吏人谨慎行事，不敢违法。武帝时迁任同州刺史，在任亲友寻私，请托不行。遇事秉公而行，不为亲情所动。武帝闻悉后，进位仪同三司，赐爵信都县公。

8. 杨智积拒置田产

杨智积，隋文帝之侄，以蔡王拜开府仪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在州修身谨行，从不嬉戏游猎。听政之暇，端坐读书，门无私谒，侍读公孙尚、仪府佐杨君英、萧德言及文学侍陪于座。所设惟饼果。酒仅三酌，其简静如此。有人劝他置产业，智积对其说：“苟杂使平原露朽苦其多也，吾幸无露，何更谋求乎？”拒绝在州购置田产，以免扰民。开皇二十年（600）离任赴京。

9. 荣毗以法治事

隋开皇中期，荣毗迁殿中内监。时华阴多盗贼，越国公杨素举荐荣毗出任华州长史。杨素田宅在华阴，其部属放纵，欺凌百姓。荣毗将其绳之以法，无所宽贷。杨素说：“素之举卿，适自罚也！”荣毗回答：“毗一心奉法，恐累公所举。”杨素笑曰：“卿之奉法，乃素之所望也！”晋王（隋炀帝登基前的封号）在扬州，每令人密窥京师消息，遣亲信张衡于华州路旁置马坊，以畜牧为辞，实培植私人势力，州、县莫敢违，惟荣毗独遏绝其事。文帝闻后，欣然赏荣毗绢百匹。

10. 樊忱复凿敷水渠

隋开皇四年（584）开凿的广通渠，到唐玄宗即位时（713），渠被淤塞，水量不足，漕运量锐减，关东每年向长安漕运的粮食只有20余万石。开元五年（717），华州刺史樊忱在华阴县西的敷水河旁，率民复凿敷水渠，将敷水河水引入广通渠。工竣后，既增加了广通渠下段的漕运水量，又灌溉渠下民田，漕工与农夫皆获其利。

11. 苏瑰奏请减赋

苏瑰进士及第后，历任豫王府录事参军、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武则天长安

初（701）徙同州刺史。时关中大旱，十道使搜括天下，不少本籍人逃离别处。境内滥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百姓不堪重负。苏瑰认为靡费浩广，虽不出国用，但出民产，且僧尼滥伪参半，日殍百姓不足。故上奏请罢十道使，专责州、县预立簿注，天下同日阅正，岁一核实，检制租调，以免劳弊；并寺院，定僧尼常员，数缺则补。武则天准奏，从而使百姓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12. 姜师度引洛导黄改良盐地

陕州州西建有太原仓，为江、淮漕米运往京师长安的水陆转运站，以往是用小车载米运到黄河岸边再搬运上船，很费力气。唐开元元年（713），姜师度任陕州刺史，即从太原仓开凿地道，使仓米由高处下注河边装船，减少了车载，省银万计。开元二年（714），姜师度在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市）敷水河开凿敷水渠，灌地6顷多。开元四年（716），姜师度又率众疏导了郑县（今陕西省华州区）西南的利俗渠和东南的罗纹渠，分别引乔峪水和小敷峪水灌溉农田，并筑堤避水害。开元七年（719），姜师度任同州刺史。州境朝邑、河西二县界有通灵陂（今大荔县盐池洼），姜师度择地引洛河水灌之，并在黄河作堰导水入陂，用以种植水稻，使2000余顷弃地（折合今亩17.42万亩）为上田，内置屯10余所，收获万计。玄宗嘉其功，诏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300匹。

13. 颜真卿悉力抚民

颜真卿，唐玄宗开元年间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唐肃宗至德二年（757）自尚书御史大夫出任冯翊郡太守。时郡城正当破亡之后，又再陷凶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颜真卿面对郡城破败景象，没有气馁，而是集训壮丁，屯粮积谷，悉力安抚百姓，多有惠政，百姓拥戴。后迁任蒲州刺史，民绘图像敬之。

14. 崔淙制药济民

唐德宗建中年间，崔淙自长安令升任同州刺史。时州境遇旱岁歉，崔淙设里仓300所赈救灾民。境内俗葬尚奢靡，崔淙倡导薄葬，恳切所至，民心折服，于是薄葬者达900余家。州人多患风疾，艰难维持生计。崔淙察知后，炮制“镇风丹”治疗风疾，疗效颇佳，百姓立碑记其事。对于豪夺乡里者，尽置以法，百姓拥戴。州城自兵后城墙殆尽，崔淙大兴板筑，民皆悦服其劳，不逾月城成，民安居之。

15. 元稹因弊制事

元稹，唐朝诗人，初任左拾遗、监察御史等职。因得罪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改虢州长史，后逐渐升迁。穆宗长庆二年（822）以工部侍郎同平章外调同州刺史。元稹抱着“为国谋羊舌，从来不为身”的心态赴任。在州急吏缓民，因弊制事。先是收羨余（唐代官员以赋税盈余为名向皇室进贡的税款。白居易《重赋》诗中有：“缢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称羨余物，随月献至尊。”）千万，用以补缴亡户的赋税，缓解了州署财政困难。为了革除弊端，元稹因弊制定条规，诫谕吏民严格遵行，省事节用。居二年，徙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父老遮道攀送。

16. 牛存节择地凿井

后梁开平三年（909），牛存节以绛州刺史迁忠武军节度使，守同州。州城水卤无井，朱友谦与岐兵合围同州，欲以先前刘知俊以渴不能守同州而败走的事例，以渴疲忠武军。牛存节则择地选址，动员军民凿井80眼，水皆甘甜可饮，解决了州城饮水困难。故朱友谦与岐兵因久围不能破城而退。后梁末帝立（913），加封牛存节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7. 钱若水明敏断案

宋太宗雍熙时，钱若水进士及第，授同州观察推官。听决明敏，州治赖之。时州有富家失一女佣，不知所去。女佣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审问。录事曾借钱于富家，富家未借给，于是弹劾富家父子共杀女佣，弃尸水中，遂失其尸。富家父子不服，自服刑具上州，复审无异。惟钱若水疑案情不实，留狱数日，密使人访寻其佣，果然找见。知州崔翰甚惊，令若水将女佣密送州署。知州垂帘召女佣父母问道：“今见你女能不能认识？”女佣父母答道：“哪能不认识！”遂示女出，其父母见后哭道：“是吾女呀！”乃将富家父子释放。富家得知此乃推官之功，即倾资饭僧为推官祈福。知州欲奏论其功，钱若水固辞不受，说：“若此，当置录事于何地耶？”知州叹服，益加敬重。淳化初年，寇准执掌选荐，钱若水文学高第，召试翰林最优。加之，太宗又听说了若水断案之事，骤加进擢，授右正言知制诰。

18. 寇准修桥利民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寇准因人事问题，与太宗在殿上争执不已，太宗

不悦，贬他为邓州知州。宋真宗即位后，于咸平初调寇准为同州知州。为解决州民渡过渭河之便，寇准于王立渡之南倡修了一座桥梁，时人称“莱公桥”，方便了两岸往来。后渭河改道北流，桥被河沙淹没。寇准还倡修灌溉渠道，引富平华阳川水名曰“莱公渠”，灌溉下邽县部分农田。

19. 明镐训练强弩御寇

宋仁宗时，明镐由益州路转运使降为同州知州。未逾月，元昊寇边，明镐被任命为陕西转运使。明镐从同州厢军中调选有才武者300余人，教以强弩，学会利用机械射箭的技能，威力增强。当时靖边军破毁金明寨，议修复其城，明镐以百余骑保护将士和百姓修城，一月而成。其后，河东等地纷纷仿置。明镐以功升参知政事。

20. 雷简夫疏浚三白渠

宋仁宗时，雷简夫任同州知州。时唐代在郑白渠总干渠下修建的太白、中白、南白3条干渠（合称三白渠）久湮。京兆府遂荐雷简夫治渠事。先时，治渠岁役6县民夫费时40日，用梢木数百万，但引水量还是不足。而简夫疏浚渠道只费时30日，梢木用量减少1/3，而引水量增加，灌溉泾阳、三原、高陵、栌阳、富平、下邽6县农田3850余顷，民受其利。

21. 梁彦通平价糶粮救民

宋绍圣二年（1095），梁彦通任华州知州。时郿、延筑城，征调7州役夫，华州恰在其中，百姓恐惧。彦通奉令派遣，版示告谕百姓，“浹旬（10日）之役，近在边隅，不会逾岁，入界同也。”众乃从命而去。属岁欠收，斗米500钱。为救民难，彦通调运粮食数十万斛，以平价糶给缺粮百姓，买粮百姓接踵而来，彦通亲临监督，救活百姓以万计。朝廷获知，诏遣使臣查实后，召拟重用彦通。彦通不幸病亡。

22. 郑建充兴利除弊

金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郑建充以金吾上将军任同州节度使。建充性明果决，勇于任事，在州多兴利除弊。时河中蒲坂、河滨百姓不重视修护堤防，常遭黄河冲淹。郑建充则罢民役，每年动用驻兵数千人修护河堤，防御河洪。关辅旱饥，灾民粥于驻军者则遭驱逐，建充准许驻军放粮赈济，于灾后遣送回家。又

拿出帑缗修葺学馆，劝民送子入学读书，士民拥戴。

23. 钱茂律增建学舍

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钱茂律任同州知州。茂律志趣高洁，才思颖敏，居官清廉，其治持大纲，故政不烦而泽洽乡里。在州救孤扶弱，安老怀少，抚其饥寒。又修葺学馆，增建学舍180间，入学儿童大增。街市有低洼狭小之处，即令人填平拓宽，方便行人与商贾。曾刻守令及居官箴言于石，人以比“甘棠”（《诗经·召南》有《甘棠篇》。后世因用“甘棠”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

24. 梁万钟洗仓赈灾

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梁万钟以进士授同州知州。万钟才智机警，勤于民事。时关中凶旱，井邑空虚，民食草禾，人多流移。万钟不辞劳瘁，昼夜奔驰查灾赈济。惟粮少人多，办赈不能持久。于是，设露天谷仓数处，用以赈济灾民，又劝富绅捐输粟米。诸绅勤勉襄助，粥食饥民。前后救活饥民无数，上下皆称赞其举。

25. 刘启东劝输修校

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刘启东出任同州知州。启东清勤任事，百务皆举，多有惠政。前学舍年久失修倒塌，诸生难以在校就读，无奈辍学散去。启东激励吏民捐钱物，出劳力，修葺学校。未几功成，校舍焕然一新。诸生再聚学校，读书习文，敦比学业，争相奋励。及到学科考试，及第学子骤增，士民称颂知州之功。

26. 问仲宇锄除豪顽

明世宗嘉靖中期，问仲宇任同州知州。仲宇性赣直，政尚严。先是任华阴知县，以政绩召为户部郎，后转任同州知州。仲宇到任后，治弊克废，锄豪除顽，数月大治。巨盗刘汉，聚众肆掠，前任未能制服，反使益横，百姓甚苦。仲宇熟悉搜捕之法，不长时间，便将刘汉捕获。境内秋毫无犯，道不拾遗。城中素缺水，士民饮用困难。仲宇择地凿井，辄得甘泉，民感其德，勒石记之。离去之日，行李萧然，士民攀卧载道。

27. 傅希孟履亩按覆

明世宗嘉靖末年，傅希孟任同州知州。希孟性执直，好简素。经常外出访察民情，帮民解决困难。奉令测田，其他长吏多是坐而受成，而希孟则履亩按覆，一点也不马虎，且不包饭食，尽量减少百姓的负担。平日用餐以柿饼及数根大葱为食，三年如一日。后历姚安太守。史称希孟卒时，家徒四壁。

28. 陈烨提兵剿盗

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陈烨以工部郎迁同州知州。陈烨刚直，识断英敏，常乘车行于田野，巡查民间疾苦。境内大盗刘官营盘踞连岁，侵扰百姓，官军莫能奈何，只能望盗兴叹；陈烨详察情形后，出其不意，提兵围剿，尽皆除灭。于是境内安宁，犬不夜吠。

29. 丁有周廉洁诚孝

明穆宗隆庆时，丁有周任同州知州。有周才俊机警，条对有度。常喜谈道义，政持廉平，不施威刑，但对破坏伦理者则严加惩处。有周向来尊师重教。新生入校，自携酒杯，向教师敬酒三杯，说：“吾送弟子入学就师，乃为造就人才，望勿倒施也！”有周孀母目久失明，在任百方求疗，果得良医使母双目重明，人以有周诚孝所致，士民多为感化，尊师、尊老之风日盛。终廉州太守，家无余财。

30. 韩埏爱士怜才

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韩埏任同州知州。韩埏为政严峭，人望而畏之。然爱士怜才，喜劝励。泮宫、樵楼毁坏，韩埏倡修，不顾劳累。召集工匠修葺学校，砖砌街市水道，建造东门城楼，皆为百年计，州民尽皆悦服。工竣后，百姓受益。后迁任绍兴府同知。

31. 李际春从不阿谀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李际春任同州知州。际春身小性烈，人称“李胡椒”。御下严肃，胥吏輿台无一敢擅离职守。又好洁除，入其门肃然如水。自到任所，民受清宁之福。好贤爱士，出于至诚。不卑不亢，不为世俗所纤趋。遇上司巡游，从不阿谀奉承，赠送礼物。即司李来，也是平平身而已，不迎来送往。因此，际春未再升迁。



32. 郑璧约己爱民

明神宗万历时，郑璧以宪金左迁同州知州。郑璧在任，好教化，约己爱民。尽罢一切散从和私征、搜剔祸害百姓之徒，裁减马羊公私之费，岁省数千金。自己的衣食所需，以民间价值购买。万历九年（1581），朝廷为了改变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农民的浮税，诏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规定田赋一律征银，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郑璧认为同州不便实行，奏请说：“同州民贫且力农，不商利，利用布、粟，难输银。况征银必增损耗，官又未必尽廉明也。”法遂不行，仍用布、粟纳税，其行数年之后，其言果验，民益感服。郑璧还善学课士，孜孜延访乡约，常恐其中有失，所行皆为州民计。居三年，以察廉升迁。

33. 高登明求瘼恤民

明神宗万历时，高登明任同州知州。登明在州，明习吏事，平日持法“求民之瘼”，体恤吏民。时“狱讼苦勾摄，赋役苦催科，收头苦损值”。登明举公私所需，皆以平价购买，不遣一吏到田里，而赋完讼清。俗诬骗人，无赖之徒常以断指、拔牙、坏孕妇胎，祸害百姓。登明对佐属说：“此风不可长。”遂下令禁止，犯者严处；若吏放纵，则严束之。于是，无赖匿迹，吏清民安。居三年，升迁保定府。

34. 胡惟俊举兴百业

明洪武二年（1369），胡惟俊任华州知州。时战乱刚过，满目疮痍，生理未复，野多旷土，官之次舍，仅存废基。惟俊莅任后，令士民掩埋民骨，召逃散百姓回乡，发给其耕具，助民恢复生产。又伐木、凿石、制烧砖瓦，在州治南门外修建知州公署、同知公署、判官公署、吏目公署、六曹卷房。知州公署建有仪门、钟鼓楼、节爱堂、诫石亭。又在州治东阜之上修建儒学。在儒学建有明伦堂及东、西号舍60间，又建有会饌堂、官厨及学舍堂、厨仓、射圃。栋楹榱桷，盖瓦级砖，使士习有所，崇奉弦诵之风延及乡里。过了二年，百废俱兴，民以殷富。后惟俊迁任太仆卿，离任时两袖清风。

35. 范斌复知华州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范斌任华州知州。范斌性仁恕，不畏豪强。州有犯法豪强不服杖打，退而击鼓聚众闹事，范斌派人将其擒获。经教谕自省悔

过，罚款释放，于是众皆悚服。后范斌奉调，州民赴阙恳求留任。朝廷为范斌加参议俸，复知华州。

36. 刘亮因材施教

明宣德五年（1430），刘亮任华州训导。刘亮师道严整，尤勤训迪，善因材施教，学子皆以父事之。他曾摄渭南县学，爱其学子多秀敏，故讲授不辍，教以明理，饬行为本，成才者甚众。迁澄城县教谕，见诸生憨厚刚直难训，便刚柔并用，循循诱导，反复讲授，务使融会贯通。诸生叹服，终获成功。后改任三原县教谕。

37. 桑溥开凿惠民渠

明正德十三年（1518），桑溥任华州知州。桑溥至州，慨然以州事为重，劝善惩恶，士民言行大变。又善察奸诈之徒，据实施政，关中郡邑多称赞桑溥干练明决。州城北面有积水千顷，不能耕种。桑溥亲自查勘，令官员率民开渠，导积水入渭河。渠成，水退田出，州及华阴之民俱受其利。时人称其为“惠民渠”。嘉靖元年（1522），桑溥复任华州知州，又数擒虎以净山谷，山民免受虎害，称诵知州之功。后桑溥官至按察使。

38. 朱茹建立华山书院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发生以华州为震中的强烈地震，震级8.0级，烈度11度。华州死亡十分之六，建筑物倾塌殆尽。嘉靖三十五年（1556），朱茹受命由新蔡县知县升任华州知州。朱茹至州，接下甚谦，从政甚严，一丝一毫不放纵，严格按律令办事，民于是敬畏称治。在修建城垣、公署、祠宇等工程时，都是公家出钱，朱茹皆亲临监督，不烦民办，使民安心灾后恢复家园和生产。为兴教育，在儒学北街修建华山书院，命官请工聚材，筑以垣墙，砌以砖瓦，构屋五楹为讲堂，斋舍九楹，题其匾曰：“华山书院”。工竣后，请教师，定章程，严稽考，选拔群庠优秀者于书院就读。朱茹每如期至，阅文墨，察其勤惰，激励诸生勤学。还有治沙河、兴办中医学校，皆为州之要务。于是惠养生息二年，百废咸举。

39. 陈应麟不扰里甲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陈应麟任华州知州。应麟至诚惻怛，操守正



大。以前任朱茹建华山书院，与诸生给费，时时论说文事为楷模，实心节用，教养士民。凡遇催科立限，便缓于立科，不扰乡里。以理服民心，民辄响应，反胜于施刑罚。所有施政条令，民皆不违犯，老吏书算也皆屏息不敢为奸。里甲岁役节省的财力，尽皆施惠于民，士民深为感激。

40. 李可久重修天鹅池水渠

明隆庆五年（1571），李可久任华州知州。华州东北地势低下，南五龙、白崖等峪之水皆归于此，故其地皆溺水，古称天鹅池。嘉靖五年（1526）陕西抚院曾委官勘议，开渠排水，注入渭河。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其渠乃平，池水无法排泄。隆庆改元后，灾民以疾苦控诉于抚院，虽议浚，但未行。可久至州，阅故牍，访民情，认为事关重大，遂移文选官专主其事。同时筹备银两，征派民工千余人。次年春动土，越三月竣工。渠长数十里，宽1丈。建成石闸1座，高1丈，阔8尺；石桥2座、木桥2座，高、阔俱8尺。于是池水归渠，注入渭河，民舍方安。其间，还于万历元年（1573）裁正张光孝编纂的《华州初志》，全书共24卷。清王士禛称其为明代陕西名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也说此志“文简事赅，训词尔雅，古代佳作，于今可鉴。”

41. 孙温如改修石子坡路

明万历十四年（1586），孙温如任华州知州。华州原少华通衢为唐代以来通达郑县的古道，亦是当地百姓必由之道。因宋天禧五年（1021）阜头峰崩塌，古道毁坏，行走不便。温如到任后，主持改修古道，拓宽补壑，名曰“石子坡路”。行人方便，士民皆受其惠。

42. 汪学海据实施行《一条鞭法》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汪学海任华州知州。学海慈明仁恕，廉静宽平，及到任时，适逢州治实施《一条鞭法》。学海深念华州土瘠民穷，旦夕苦征，今又改征赋银，吏胥易贪为奸，因此仍征布、粟，民感恩戴德。州有县判保宁为悍仆弊其主之事，学海察知后将保宁革职。关辅延试第三名王敬卿早逝，学海悼其事业、文章，就到其家索其遗稿，捐俸付梓。于是，士风大振，科目联发。居三年，连岁丰登。

43. 史文楷倡建华州贡院

明崇祯七年（1634），史文楷任华州知州。文楷治州有才气，剪恶惩奸，人不敢犯科。昔时华州无贡院，华州及洛南学子皆赴蒲城贡院应考。文楷叹曰：“华州领蒲城，宪体也。焉有州士而赴蒲城应考者乎？”于是呈文上台，恳求在州建立贡院。上台批示：“可捐俸鼎新，泽及后人。”随后，贡院建成，方便了州士及洛南学子应考。

44. 邓承藩重修排水渠

明崇祯九年（1636），邓承藩任华州知州。承藩能诗善文，才能卓异，对百姓加意抚绥，实心诚求，治州有声，每为台司见重。因天时亢旱，百姓抗旱种植，承藩便奖励力田勤劳者数百缗。崇祯十三年（1640），华州饥馑频仍，承藩发仓赈救，又力劝富有而好义的乡绅，捐输分食灾民。州东有构峪与华阴方山河古河道壅塞，水患为害，数十村落高处为平沙荒草，低处为泥泞洼地，百姓殊苦，涕泣诉于承藩。翌年，遂躬行勘视，举公明干练的主簿李化龙、典史李为楠主持，于渠南百步许开新渠一条，阔5丈余，两岸各高1丈，上下约长30余里，汇流入渭。于是水害平除，五谷丰登，士民谣词曰：“麦亩两石，粟米五斛。邓君开河，乐不可支。”

45. 李文盛修堵决堤

清顺治十二年（1655），李文盛任华州知州。文盛在州宽慈清俭，遇事亲躬。顺治十三年（1656），华州发大水，河堤溃决，淹没民田数千顷。文盛及佐属率领万余兵民，用竹筐及苇编粗席盛土，打桩起闸，抢填决口，住宿河堤累旬不返，暴晒风日，炎暑不辞，直到将决口全部修好，才返回州署。洪水退泄后，近河居民怀其惠而津津称道。

46. 冯昌奕兴学修志

清康熙十年（1671），冯昌奕任华州知州。昌奕至州，便慨然捐俸修缮明伦堂、更新贡院。工竣后，定季考，督月课，学风大兴。州城四门楼，因兵火、风雨侵袭，竟至栖云罗雀。昌奕又捐半年俸银，修缮一新。华州驿站当关西要冲，供应频繁，昌奕皆发银公办。州之里差，相沿已久。昌奕奋然说：“民力几何，何勘如此侵渔？”于是，毅然予以撤销。为避免丁徭重叠，明令所属该豁除者则豁除，应入丁者则入丁，建起花名赤历丁粮封纳册簿，列款详闻，剔除了随

意更改花名赤历的弊端，士民称善。其间，昌奕还裁正了刘昌奇编纂的《续华州志》，全书共4卷，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印。

47. 谢白生疏浚构峪古道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谢白生任华州知州。时华州构峪河与华阴方山河入渭水道淤塞。州民凿渠道构峪河水由方山河入渭，方山河道难泄二河之水，水溢为患，淹没大片民田，二华士民互相争讼。白生奏请大中丞鄂公到受灾之处，仔细观测，认为过去必有水道分泄。于是，派人疏浚渠堰，果得构峪河古道石桥，即行疏浚。七日告竣，使千顷卤地变为沃土，恢复耕种。于是民讼平息，殷富一方。

48. 张奎祥始创事例

清雍正十三年（1735），张奎祥由沧州知州升任同州府首任知府。时同州府新设，始创事例。奎祥斟酌见，繁简咸宜，使政务有序展开。先是修文庙，增考棚，添书院地租，使学子安心就读。各业并举，三年全境大和。其次，表彰忠孝，采访幽隐，主持编修《同州府志》，于乾隆六年（1741）成书，全书共20卷。川陕总督尹继善在为该志撰写的序中称赞该志“提纲挈领，条贯分支，体例精详，不疏不蔓”。

49. 李星曜创建丰登书院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李星曜任同州府知府。星曜明察善断，尤重教育。为培养人才，他在府城创建了丰登书院，选拔有异才的童生入院就读，亲授课，讲诗文，课余兼教射箭。曾经三次设宴于丰登阁，饮酒赋诗，以寓“旨酒承筐”之意。凡宴登丰登阁的诗人，皆嵌名于阁壁，以示后人。乾隆二十四年（1759）省试，文科亚元李泰等16人、武科解元姬辅清等13人，皆出同州府属。次年，来者益众，士气益欢。其中为星曜所欣赏的乃韩城人王杰。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杰进士及第，殿试拔置第一，士林传为盛事，叹服星曜之言行可鉴。

50. 虞友光廉政抚民

清嘉庆十四年（1809），虞友光任同州府抚民同知，驻潼关。友光为政，以惠民为主旨，人宽法严。时关中大饥，斗米贯钱，灾民甚众。友光按户视口，赈救灾民。先自捐赈，后派人各赈济于其乡，量力捐输，不强求于民，救活无

数。狱押数十人，友光讯问清楚后，罪止主犯，释放从犯，民以不冤，称其“人宽法严”。并移凤山书院于西门内，置学田，立教规，招收学子入学。公余友光即到书院授课，要求学生务求刨根问底。后以老致仕，门人捐助送归。

51. 吉年政简讼清

清道光二十年（1840），吉年任同州府知府。吉年性严毅，学问渊博，有济世才。在府数年，政简讼清。时城垣久圯，不利守护。他令各属捐助，刻日兴工。不长时间，修筑完毕，守护无虑。公余到游艺射圃劳作，仅带妻、子、媳和一仆一婢，再无其他随从跟随。每遇疑难案件，则策骑亲往，呼两造剖判，对佐属说：“宁自己劳苦，万勿累民也！”对于聚众赌博者尽力禁止，设法捉拿训诫，由是赌风顿息。士民感其德，后于忠勇公祠置牌位祭祀。

52. 王秉勋勤政重教

清咸丰三年（1853），王秉勋任同州府知府。秉勋在府，重视教育，常到儒学给诸生授课，躬评课卷，考核品行，激励学子刻苦学习，报效朝廷。咸丰五年（1855）府属各县天旱日久，土地龟裂。秉勋教民修渠、凿井灌田。后因河水断流，井水下降，人畜饮水也发生困难。无奈之下，秉勋乃躬祷城隍庙，免冠叩首，额上叩破寸许。不久，天降大雨，士民欢欣鼓舞，皆称此乃秉勋诚意所感！

53. 周铭旗劝民掘井灌田

周铭旗，清光绪元年（1875）以进士任大荔县知县。光绪二十五年（1899）任同州府知府。他教养有素，体恤民艰，文章政事，不同流俗。每外出与士民相见，谈笑欣然，人皆忘其为官。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奇荒，天大旱，地无草，贫民无所得食。周铭旗乃创“保赈法”，延请士绅共同捐助，筹集粮食14000石，白银3000两。将全县分为42保，每保设总检查1人，负责稽核贫民，分极贫、次贫放粮。又于城区设粥厂，散牌施粥，赈济饥民。同时，劝谕乡民掘井灌田，教民采用“区种法”，颇获其利。倡导疏治湮废的白马池旧渠，近渠数十里之家欣然从之，相互协力，使渠复得其效。乡民栽植桃、杏、梨、枣数十万株，余岁获利。他刊有《荔原保赈事略》全册，“区田”“代田”诸法均记其中。他教育士子严格，每月于常课外，择其优异者，在署内亲自授课两次，成就很多。光绪二十五年（1899），同州府复遇旱，饥民很多。因周铭旗前办大荔赈务，救济办法甚多，故委任周铭旗为同州府知府。到任后，他沉着应对灾

情，尽心筹措赈灾粮钱，为民谋利，以劳叙归，救活灾民无数，黎民大和。

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时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在辖区做了造林防水、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组建防空组织、兴修公路、防汛救灾等一些对人民生产、生活有益的工作，但也做了不少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坏事。

54. 华县规定“清明日”为植树节

民国四年（1915），华县规定“清明日”为植树节。民国十七年（1928）又把植树节改为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每年植树节时，动员机关、学校、农村，广植林木。分散各处的竹、杏、柿、枣，称“经济林”；栽植于各乡河旁、渠旁的杨、柳、槐，称“保安林”；栽植于官道路旁的树木，称“风景林”。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华县县长罗传铭，派建设科助理员采购各种树苗6000株，于河岸、荒山等处，相度地形，择宜分植。此间，民众亦知植树利于宏开地利，颇听劝导植树。当年苗圃仅有树苗1000余株，全部移植公路及附近大小各路。为了防冻，还用稻草包封。

民国三十年（1941），华县县长晁广顺倡导在渭河滩地造林1700亩，植树200万株，成活仅半数，后补栽，并设林警。后因居民以河滩地畔为私产，发生田产纠纷，军、民滥伐而没。

55. 修建洛惠渠

由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倡导，省水利局局长李仪祉主持规划的大型引洛灌溉工程洛惠渠，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25日开工建设。民国二十五年（1936）12月，相继建成引水枢纽、总干渠、洛东干渠及所属中、东、西干渠，总长90.66公里。民国三十四年（1945），为解决朝邑县7万亩耕地灌溉问题，八区专员公署要求延长中干渠11公里，后因高程有误，仅有3公里渠道作为中干渠尾水段加以利用。民国三十六年（1947）12月12日举行了放水典礼，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夫人刘宦剪彩，水利部部长薛笃弼开闸放水。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题词“惠溉农畴”，副主席孙科题词“水裕民生”，行政院院长张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均有题词。由于当时田间工程只修建了51座斗门和1.6公里斗渠，尚不能灌溉受益。

56. 推广农业技术

民国二十四年（1935），陕西棉产改进所于大荔县张营村北购置荒地1000

亩，设立陕西棉产改进所棉场洛惠渠分场，从事棉种改良繁殖。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更名为大荔农场。大荔农场共购进棉花良种1627担，发出良种634担。品种有小洋花、4号斯字棉、脱字棉。随后，辖区各县先后成立了农业推广所，向棉农推广良种和防治病虫害技术。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6月开始，普及使用烟草水皂莢棉油乳剂防治棉虫技术，聘请小学教员及合作社理事等方面人士为治虫义务指导员，广泛宣传，现场指导。由于治虫人员不足，招收临时治虫助理员20人，开办短期培训班，讲授治虫知识，兼授棉作、杀虫药剂、普通昆虫学等知识，尤着重实习，然后分派各棉区工作。翌年，韩城县农业推广所选定8处试点地区，向棉农宣传、示范棉蚜防治技术，收到良好效果。

区、县农业推广机构也重视小麦良种培育和推广工作。民国二十八年（1939），大荔县农场培育出“四强麦”和“大荔52号”两个小麦良种。各县农业推广所在每年小麦收获时，派人到田间采集良种单穗，经过鉴定后予以推广。辖区经过鉴定推广的小麦良种有三月黄、红和尚、白和尚、红芒麦、金裹银、钢茬麦、蚂蚱麦、条子麦、瞎八担等。

57. 造林防火

民国二十四年（1935）7月，八区专员督察公署在黄河、渭河滩区设立了平民林场，并在平民林场和潼关县五里铺各建立苗圃300亩，为营造防水保安林提供苗木。财政每年津贴6000元，作为营植黄、渭河防水保安林的费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平民林场营造防水保安林9349.12亩，栽植各种树木1028737株，成活551635株，成活率53.62%。民国二十七年（1938），平民林场营造防水保安林14788.15亩，栽植各种树木1692812株，成活1121553株，成活率达66.25%。民国二十八年（1939），平民林场营造防水保安林4299.7亩，栽植杨、柳、桃、杏、椿、榆、中槐、刺槐等树308531株。同时，渭南、大荔、韩城、富平等4县植树造林282872株。民国二十九年（1940），平民林场动员朝邑中学等17个机关、学校栽植中槐、刺槐、侧柏、苦楝、皂莢、白榆、臭椿、桃、杏、胡桃、石榴等树木724237株。民国三十年（1941）春，平民林场栽植刺槐46107株，成活43801株，成活率高达95%。同时，白水、渭南、潼关、澄城、大荔、平民、富平、蒲城、合阳9县植树691136株，成活586570株，成活率达84.87%。

58. 组建防空组织

日军占领晋西南和中原一带后，不断派飞机轰炸潼关、渭南、朝邑、大



荔、韩城等军事要地和铁路沿线。民国二十七年（1938）国民政府成立了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八区专员公署辖区之大荔、朝邑、潼关、渭南、韩城、合阳等县先后成立了防空监视队，蒲城县成立了防空指挥部，华县成立了防空委员会，澄城县成立了防空指挥所，富平县成立了防空监视哨。防空监视队设队长、情报员、通信员、司书等5~10人，配有电话机、望远镜。观察哨所设所长、情报员、通信员、哨兵5~6人。防空监视队（哨）不分昼夜，在室外严密听音监视，发现敌机后，立即用鸣铁钟或放土炮为号，通知群众撤到防空洞、壕。同时，迅速逐级直至中央防空情报所报告敌情。各县防空组织还动员群众挖掘了防空洞、防空壕等设施。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11月至1941年10月，日军先后对辖区出动飞机212架次，投弹517枚，炸毁房屋827间，炸死炸伤民众441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县防空组织撤销。

59. 解决平民林场与平、朝两县滩地纠纷

平民林场沿黄、渭河造林地全系荒沙地，连年营造防水保安林，初见成效。而平民、朝邑两县部分民众为谋小利，不顾防水大计，经常毁林种地，发生事端，严重破坏林场造林秩序。民国二十九年（1940），农业改进所请求解决办法，省政府批示省民政、财政、建设3厅与八区专员公署和平民、朝邑两县政府会商，拟定解决办法三条：一、农业改进所由平民林场划拨黄河水利委员会林地20000亩，纯系飞沙绝对造林地，完全造林防水。二、凡群众持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7月平民林场成立以前之领地执照者，如在林地范围之内，准予发还群众。三、发还造林地时，已经造林者，应由受地者补缴造林费。上述办法由平、朝两县县长布告人民遵照执行，平民林场具体办理。使平民、朝邑两县群众毁林事件得到妥善解决，造林防水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60. 军队组训民众

民国二十九年（1940）10月，蒋介石以“佳酉机谕”密令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下设邠（县）洛（川）、商（洛）同（大荔）两个区指挥部，负责军队组训民众，实行军政一体、军民一体的反共特工组织。11月1日，商同区指挥部在西安成立，由中央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兼任指挥官，专员兼保安司令蒋坚忍任副指挥官，重点组训韩城、合阳两县。11月22日，商同区指挥部由西安迁到韩城县，将韩城、合阳两县（后将黄龙、宜川两县一部分划入）定为动员实验区，名为加强战时动员，实则加紧封锁中共领导的陕

甘宁边区。商同区指挥部责令韩城县政府成立军警联合稽查处和邮电检查所，密设谍报网。合阳县设立动员总队部，乡镇设大队部、保设中队部。后西安劳动营在商同区指挥部配合下进行大搜捕，先后在韩城、合阳两县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10多人。

61. 防汛救灾

民国三十一年（1942）8月3日14时，黄河龙门水文站洪峰量24000立方米/秒，洪水奔腾，韩城安澜、巍阳、芝秀等乡首被淹没，旋即合阳复兴乡、平民全境及朝邑乌牛、仁和等4乡相继被淹没。渭河、洛河两岸及华阴三河口、潼关吊桥一带同时泛滥，水势汹涌，浪高丈余。韩城、合阳、平民、朝邑、华阴、潼关6县受灾民众总计68000余人，死伤740余人，下落不明者300余人；淹没耕地500800亩，农作物损失13200余万元；冲毁房屋7300余栋又2100间，死伤牲畜1039头。

灾情发生后，八区专员公署随即成立了水灾救济督导组，专员兼保安司令蒋坚忍等专赴朝邑指挥救济，组织抢险队，设立4个收容所，共收容灾民24000余人。发动大荔、蒲城、合阳就近各县缴送馒头50000余斤，日发灾民1斤（小孩半斤）。抽选精干壮丁配合船户水手打捞抢救落水灾民5000余人。之后，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拨款328万元，全区募捐灾款5万余元，统筹分配，帮助灾民恢复生产。

民国三十四年（1945）7月，大荔、潼关、华阴等地遭受严重水灾，八区专员公署成立了防水指挥处，负责防汛抢险工作。

62. 修建大华公路

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八区专员公署设计的大（荔）华（阴）公路建成，北起大荔县城，南抵华阴罗敷车站，全长29公里，与省道黄（龙）洛（南）公路联通。大华公路横穿沙漠地带约10公里，削平沙丘，运垆土覆盖路面，工程异常艰巨。竣工后，大荔县政府由外地调来木船数只，在县城南2.8公里的洛河石槽处搭桥过渡，并于南门外立碑一座，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大华公路纪念碑”碑名。通车后，缓解了渭（南）大（荔）公路的运输压力。南去二华，东出潼关，比绕道渭南缩短了73公里。对公路分流和渭北煤矿开发，促进物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63. 调减韩城田赋

东禹门失陷后，韩城县当河防之冲，大军云集密布，全县进入战时状态。人民与房屋屡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各项军事供应负担加重；人民疲于奔命，无暇生产；军需草料、运输甚巨。民国三十一年（1942）6月，韩城县绅贾玉斋、杨一鹤、张孔博等20余人联名历陈近年韩城草料赔价、军运赔价、河防工事材料赔价、军粮赔价、田赋畸重、壮丁征集困难、遭炸抚恤、节储困难八款事实，呈请国民政府财政部、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设法减免或令其他各县平均负担，解决积困。8月，财政部代电陕西省田粮管理处，就韩城县田赋畸重一案，请查照详报。

民国三十三年（1944），韩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苏资琛为解决韩城历史遗留下来的田赋畸重问题，考查历史，取得充分理由和证据后，于8月赴省面陈，详细汇报，据理力争，要求核减。几经周折，终经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员覆勘批复，确定韩城税率为0.45元，较前减少0.14元，田赋总额由218516元调减为145637.56元，较前减少72874.44元，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64. 解除合阳民众困难

日军侵占晋南后，合阳变为国防前线，民众负担之重，差役之苦，较其他县为重。民国三十二年（1943）6月，合阳县民众代表王允伯等3人向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逐条陈述合阳县各种困难4款：连年歉收，百姓缺粮；土地陈报紊乱，错误颇多；军事草料，负担过重；第三批河防工事材料25万根，民众负担不起。省政府令省军事征用管理委员会、省财政厅、省田赋管理处、第八区专员公署会商解决办法。7月，陕西省军事征用管理委员会签发处理结果：一、查八区各县灾情严重，大致相同，应另案统筹救济。二、合阳县为本省第一期举办土地陈报县份，各业户间土地陈报有不符情形者，准各业户列举事实呈报省田赋管理处核办。三、马草缺乏问题，由八区专署饬驻军利用野草放牧吃青，再由各县代购半数马草，以供应夜饲。马料困难问题，本会续运豆料补充。28师已开赴洛川，该县负担之草料应即停购，以轻民负。四、运输第三批河防工事材料案，先行筹借500万元拨给八区各县，其余再设法补助。王允伯等3人反映的合阳县各种困难问题，得到解决。

65. 渭南新辟慈惠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后，中共党员王尚德在家乡兴办教育的同时，筑

河堤，兴水利，动员蔡郭、靳村等村群众修筑慈惠渠。因与华县群众发生纠纷，工程难以进行。民国三十四年（1945），陈杰三、王绍耀、杨文轩、梁志常等人呈告陕西省政府。5月，华县、渭南两县县长偕同县临参会、建设科举行会谈。因会谈没有取得共识，无果而散。11月，陕西省建设厅派科长赵璧、技正傅玺勘查后，召集华县、渭南两县代表开会，经过讨论，达成协议，同意渭南县由赤水河张村埝下筑堰开渠，并勒《准渭属新辟慈惠渠碑》1座，历年纠纷始解。之后，蔡郭、靳村等村农民出工筑堰、开渠。竣工后，灌溉农田1000亩。

大荔专署成立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干部少、工作多、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一面建立组织，调配干部；一面细心谋划，统筹兼顾。以支前为中心，结合进行了干部培训和优待烈、军、工属等工作。

66. 全力支前

1949年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兵团西渡黄河，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大荔专署及所辖各县以支援前线（简称支前）为中心任务，先后成立了分区、县、区、乡、村支前工作机构，集中人力、物力，至7月10日，顺利完成了15万过境大军的吃、喝、住、行任务。据1949年8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大荔分区支前工作总报告》记载：大荔专署按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修路的指示精神，责成各县抽派干部，动员民工，分段修路、架桥、造船。全区共动员民工200439人，共计修路33条，总长697公里，路面宽8米~9米，占用土地457.2亩；架桥24座，完成投资65881.5万元（旧币）；修造船只15只，完成投资19340.25万元（旧币）。竣工后，还组织了护路队，保证道路畅通无阻。

在沿公路、马路的附近乡村设立仓库，所在村成立支前委员会，下设米面、柴炭、油盐菜等小组，分工负责，保证西进大军就地得到供应。全区共支用小麦1126274.5公斤，小米371463.5公斤，面粉1648966.5公斤；食油20309.1公斤，食盐34847.4公斤，食碱169.5公斤，粉条1469.5公斤，生猪100头，豆芽菜28272.5公斤，其他蔬菜770.5公斤；柴260837公斤，煤375607公斤；饲料878710公斤，饲草312801公斤。其他生活用品有毛巾39453条，背包1280个，碗套3752个，仁丹610包，肥皂2730块以及牙膏、牙粉、铅笔、蜡烛、扇子、香烟等。发放时各级支前组织尽量简化手续。部队住到哪村，即由该村供给，由部队发给粮、草、料票。未带粮票的，以伙食单位打条据，由村支前委员会连夜到部队团部换取粮票。

沿大路每5里设一接待站，下设10个组，即米面、草料、油盐菜、柴炭、开



水、慰劳、补洗衣服、找房子、护路、通信战勤，迎军慰劳。全区共设招待站277个，办黑板报319块，搭彩门192个，扎彩车72辆，做光荣花43575朵、锦旗165面、慰问袋1938个。当部队通过招待站时，当地群众和学生组成的锣鼓队和秧歌队就地表演迎送，鼓舞士气。并献旗、献花、献水、送慰问品。黑板报上书写着醒目、生动的民谣：“温开水，真正美，喝起可口不烫嘴。”“同志们请喝水，不烫不凉温开水。温开水甜又甜，喝起可口不耽延。”西进大军颇感满意，曾留诗致谢：“大军向西进，路过南潘庄（今属韩城市龙门镇）。老乡送开水，招待颇殷勤。草书几个字，略表感谢心。”充分表现了军民鱼水情。

67. 培训干部

大荔专署及下辖县、区、乡行政机构陆续建立后，行政干部严重不足。先后从老解放区调配和新吸收干部5194人。其中老解放区派来260人，占干部总数（下同）5.0%；从游击队和地下党员中提拔165人，占3.18%；留用人员480人，占9.24%；从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吸收干部4289人，占82.58%。这些从不同方面汇集到一起的干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老解放区派来的干部多有工作经验，忠诚可靠，作风正派，但个别好人好摆老资格，习惯于靠经验办事；从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中提拔的干部，熟悉当地情况，与群众联系密切，但不习惯正规的生活工作制度；新吸收的青年学生积极热情，有朝气，爱学习，但缺乏工作经验；留用人员守规矩，但带有保甲作风。大荔专署和各县人民政府为尽快使各类干部提高政治觉悟，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扬长避短，做好本职工作，遂把培训干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干部。

举办干训班或轮训班，培训干部。距大荔专署较近的大荔、朝邑、平民3县，由分区干校负责培训，其他各县则举办干部训练班或轮训班，进行短期训练。全区共计培训干部1712人，占32.96%。

以师带徒。在支前和生产救灾等工作中，新老干部搭配组成工作组或工作团，采用以师带徒的方式，大胆地给新干部压担子，由老干部进行指导、检查、总结。通过实践，提高新干部独立工作的能力。

会议动员。在支前工作前，各县普遍召开区、乡、村三级干部会议，讲清政策、任务和工作方法。支前工作结束后，又召开总结会，由上而下检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进行评比表彰，对个别工作不力、违反纪律的，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坚持学习制度。县、区、乡都建立了学习制度，坚持每天早晨学政治、学

政策、学时事。区、乡干部因流动性大，采取定期集中学习的方法，收到很好的效果。

68. 优待烈、军、工属

1949年，大荔分区共有烈士家属、军人家属、供给制工作人员家属（简称烈、军、工属）及荣退人员11219户（不含10月1日前后参军的军属）。其中烈属276户，军属5656户，工属5128户，荣退人员159户。优待烈、军、工属工作，以扶助生产为主，部分特困户给予物质帮助。对没有土地、畜力，又不能进行其他生产的老弱残疾者，帮助解决粮食、柴炭，用水派人担挑。有土地但劳、畜力不足或无劳、无畜力，则采取代耕或包耕的办法。凡包耕、代耕、运煤、挑水所计工日，以乡为单位，分摊负担。各级行政组织在支前、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和秋收、秋播工作中，对生活困难和缺少劳、畜力的烈、军、工属及荣退人员，除适当减免战勤负担和公粮外，普遍组织变工组或包耕、代耕户，实行包耕、代耕及帮工收种、修缮房屋等服务，较好地解决了烈、军、工属及荣退人员的生产、生活困难。

各县在实行物质优待的同时，普遍重视了精神优待。给烈士举行追悼会，给特等功臣举行庆功会，分别介绍烈士和功臣的光荣事迹，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做好优属工作的思想认识，并见之于行动。各县人民政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演出文艺节目时，邀请烈、军、工属和荣退人员代表在前排就坐。中秋节时，发动群众给烈、军、工属送瓜果，送月饼。许多军属、工属表示要写信告诉服役和在外工作的亲人安心服役，努力工作，报答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

69. 生产救灾

1949年9月3日至10月13日，大荔分区连续降雨40余日，黄、渭、洛3河暴涨，全区沿3河地区被洪水冲淹土地330255亩，冲走小麦84560公斤、杂粮21560公斤；倒房106550间，塌窑5234孔，倒墙315745堵；死亡260人，伤134人；死大牲畜118头，伤42头，死猪羊97只；损坏农具、灶具、家具及其他物资不胜枚举。雨涝、河洪和局地冰雹造成秋田减产二成，10万多人缺吃少穿。面对数十年罕见的灾情，大荔专署高度负责，迅即行动。一面下拨救济粮28000公斤；一面抽调干部，在地委和专署的部、科长带领下，同各县下乡救灾的干部密切配合，动员一切力量，针对各地不同的灾情，有针对性地开展生产救灾工作。专署号召各级干部、战士，10月每人节约一两米。分区和各县连同以前节约的粮食共捐献



小麦61628公斤、杂粮12040公斤，津贴738900元（旧币），衣服157件，鞋袜185双。同时，各县号召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普遍开展互助互贷、亲友接济活动。全区群众共捐献小麦157542公斤，杂粮237720公斤，棉花1283.5公斤，衣服1168件，鞋袜933双，布803.4丈，麦草1429.5公斤，现金4002890元（旧币）。所有捐献的粮食、衣物和现金，通过民主评议，发放到灾民手中，使灾民度过了灾荒。在秋收秋播中，除动员干部、战士、师生帮助群众收秋20540亩、种麦2068亩外，组织变工组14591个，有72000余名劳力参加了变工。到10月底，完成了秋收秋播任务。

冬季，发动群众从实际出发，开展副业生产。蒲城、大荔、白水、澄城4县，积极组织群众运煤；韩城、合阳、朝邑、平民4县，组织群众纺织、轧油、担挑贸易。山区组织群众烧木炭、采山货、解板。朝邑县还组织群众到黄龙山区用土布换粮，一匹土布可换回粮食21公斤。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安定了社会秩序。

70. 复修洛惠渠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贺龙发布管字第36号命令，委派彭达为军事代表，接管了水利部泾洛工程局。10月1日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农业厅水利局洛惠渠工程处（简称洛工处），驻大荔县城。11月6日洛惠渠全面复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拨发小麦750万公斤，陕西省人民政府拨发工程款8.45亿元（旧币），全力支持洛惠渠复修工程。大荔专署、大荔县人民政府动员民工5000多名，开始修复五号隧洞和干、支、斗渠配套工程。受益区群众积极投工投料，修建斗渠。至12月底，大荔县许原、洛滨、平原3区共开挖西二干渠斗渠14条，计长38.05公里。1950年3月5日成立洛惠渠灌区工作委员会，大荔专署建设科科长刘崇华任主任委员，抽调30名干部常驻埝桥工地，检查指导田间配套工程。3月中旬，洛工处采用以工代赈方式开挖支渠，参加施工的有当地民工和外地灾民5230人，每挖1立方米土方付给0.75公斤小麦，多劳多得。不仅加快了施工进度，又使数万人度过春荒。4月10日，洛惠渠放水试渠。试水渠道为总干渠、西一干渠、西二干渠、东一干渠、东二干渠及15条斗渠。西北救灾委员会、大荔地委、专署及大荔县的领导参观了五号隧洞。4月12日，渠水流到大荔县城外，彩旗招展，锣鼓喧天，3000多人列队在城外迎水。4月25日、4月30日《群众日报》和《人民日报》分别报道了洛惠渠放水盛况。当年，洛惠渠实灌农田10万亩，总计灌溉面积达13万亩次。

71.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渭南专署和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全区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通过土改使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为农业的发展开拓了道路。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全区10173名反革命分子分别给予处理，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新生政权。通过对揭发出有贪污行为的5884人的处理，纯洁了干部队伍，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1950年10月，美国出兵侵略朝鲜，直接威胁中国安危。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号召。11月，全区展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至1951年10月自愿报名参军的达10万余人，经检查合格批准入伍的17228人。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渭南专署领导全区人民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有计划地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到1956年春，全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1.55%，87%的个体手工业户加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85%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把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改变为以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56年10月，渭南专署建制撤销，所辖18个县直属省上领导。各县认真贯彻中共“八大”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重要经验。1957年夏季以后，党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左”倾错误。各县按上级部署开展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使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工农业生产受到挫折，造成了1959年以后连续3年的严重困难。

72. 拨乱反正与真理大讨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建设成为全区工作的重点。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署抓住新的转机，全面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农村，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市场，发展社队企业，建立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销人民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实行乡、村建制。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在城市，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积极推进机构改革，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实行党政分设、企业承包、厂长（经理）负责制，通过扩大权力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工交、商贸、交通、邮电、社会事业呈现出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至1985年底，按1990年不变价格（简称90不变价格）计算：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4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9.38亿元，第二产业产值8.17亿元，第三产业产值3.9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12%、13.69%、13.14%、1.27%。工农业生产总值达29.89亿元，其中工业产值18.58亿元，农业产值11.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9.08%、25.86%、9.06%，均创历史新高。城乡居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3.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1.2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12%和17.29%。

73.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86年以来，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署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积极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内部结构。对农村承包土地进行“大稳小调”，延长土地承包期，拍卖“五荒地”（荒山、荒坡、荒沟、荒滩、荒水）使用权；筹集资金，加大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力度；利用世行贷款和国际援助12296万美元，相继建成大荔、蒲城、渭北三大引改水工程和东雷二期抽黄工程；扩大城乡建设投资规模，大力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



大荔黄花菜基地

序，抑制通货膨胀，着力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波及渭南，中共渭南地委和渭南地区行署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依靠人民群众做好区内个别学校闹事学生的疏导转化工作，并认真开展清查清理工作。查清和破获重大政治案件18起，明令取缔了非法组织“渭南师专爱国自治会”。为顺利实现全区现代化建设第一步战略目标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到1990年底，区内工业生产形成多门类的工业体系和“两线”（陇海、西韩铁路线）、“三区”（南部有色、北部能源、中部轻纺）的地域分布格局。拥有“外资”企业3户，实现了“外资”企业零的突破。农村初步建成国家级、省级商品粮、优质棉、花生、烤烟、苹果、秦川牛、奶山羊、笼养鸡、商品猪、商品鱼十大基地；区域性名优特产品花椒、黄花菜、红杏、西瓜、大葱基地有较大发展。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一步战略目标，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按90不变价格计算：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76亿元，提前两年实现了翻番，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7.54亿元，第二产业产值16.46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0.7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7.69%、19.72%、14.22%、19.95%。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扬。同1980年比较，第一产业比重下降9.41%，第二产业比重下降7.23%，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6.46%。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5.69亿元，其中工业产值28.97亿元，农业产值26.7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73%、7.77%、3.61%。粮食总产量达到171.88万吨，比上年减少4.7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511.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至1116.8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69%、8.87%。住房面积农村居民人均18.02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9.68平方米。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26%。

1991年，中共渭南地委制定《渭南地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意见》，确定了“强农、重工、兴商”战略方针，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发挥农业大区的优势。各级政府带领干部群众，大搞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实施以科技服务为重点的科技兴农方案，兴办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开展学习雷北、保宁村活动。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署印发《关于我区农村实施“小康工程”的规划纲要》，全面实施“小康工程”，引导农民实现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跨越；在企业进行第二轮承包中，普遍推行领导班子集体承包和交纳风险金的风险承包制度，逐步把企业推向市场；鼓励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批发集团，充分发挥国有、合作商业的“蓄水池”作用。随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地区行署明确提出政府部门对工商企业只管“两个一”（一个法

人代表，一个合同），全面推行“四放开”（经营、价格、用工、分配放开），小型商业实行改、转、租；融资渠道，改主要靠银行贷款、财政拨款转向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农村改革以发展社会服务为重点，组建专业性、综合性农业服务组织。围绕“东联西进，南接北推”的对外开放战略，扩大开放范围。地、县（市）与全国有关市、县（市）广泛建立友好关系。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后，地区行署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要求，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和县级机构改革，理顺关系，精兵简政，转变政府职能，全面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搞活企业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12月，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署印发《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发展各种形式的股份制、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组建“公司+农户”和“贸工农”一体化组织。截至1994年1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渭南地区时的统计资料：全区386户国有企业完成清产核资，其中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达179户，77户股份制企业的股本总额达1.67亿元；累计拍卖“五荒地”使用权256万亩，收回资金1210万元；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经济组织1000多个，成立一体化组织2000多个。初步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产加销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的格局。地、县（市）与全国20多个出口口岸、有出口权的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了联系，与20多个县（市）建立了友好关系。按90不变价格计算：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8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22.34亿元，第二产业产值29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8.5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94%、4.01%、14.62%、8.95%。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0.8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7.37亿元，农业总产值33.4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38%、23.08%、0.89%。粮食总产量143.5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83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059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9.92%和32.12%。

74.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1994年1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原渭南地区，设立地级渭南市。1995年1月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以文件通知撤销渭南地区设立地级渭南市。新设临渭区，以县级渭南市的行政区域为临渭区的行政区域。市政府驻东风街83号，区人民政府驻前进路。渭南市辖原渭南地区的华县、潼关、大荔、合阳、澄城、蒲城、白水、富平和临渭区，韩城市、华阴市属省直管，由渭南市代管。1995年5月21



白水河大桥

日，渭南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设立，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名称也随之变更。

1995年5月，渭南市人民政府挂牌成立。11月，中共渭南市委、渭南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明确市级各部门、各单位机构改革领导责任的通知》，批转市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级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等6个配套文件，进行新一轮市级机构改革。之后，印发《关于制定渭南市“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走“开放、优境、强农、重工、活商、兴城、积资、育才”的发展路子，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重点建设渭南中心城市，基本构筑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中共十五大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两个决定”精神，市、县（市、区）抽调800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有关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帮助指导工作；继续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着力实施防洪保安、水保生态、骨干水源、节水灌溉、城乡供水五大工程，启动山川秀美工程；大力推广优质专用小麦良种、果实套袋、高接换头等先进实用技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不断整治法制环境和服务环境，规范、简化项目运作程序，依法保护企业和重点项目，清理整顿农村信用社基金。至2000年底，全市纳入改革范畴的国有企业已完成改制480户，占应改制数的97.96%；新增个体工商

户2.2万多户；新增私营企业832户。渭南国贸中心、市体育馆、渭南直属粮库、澄城西河大桥、茨沟大桥、合阳太枣沟大桥、白水大桥、朝邑内滩排灌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营运，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6.54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31.59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94.2平方公里。按90不变价格计算：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3.7亿元，提前两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目标。非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其中第一产业产值40.1亿元，第二产业产值64.0亿元，第三产业产值59.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3%、8.3%、11.8%。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21.3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工业产值73.7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工业产品中有2个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7个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农业产值47.6亿元，比上年增长1.2%。粮食产量1998年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215.2万吨，2000年因灾减产，仍达183.7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65元，比上年下降2.9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16元，比上年增长17.79%。住房面积农村居民人均23.8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17.30平方米。全市高考升学率连续5年名列全省前茅。

75. 全面复兴

2001年，中共渭南市委、渭南市人民政府继续贯彻落实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的“两个决定”精神，制定出台了“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并举战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全面开放除国家明令禁止和产业政策等限制以外的其他领域，创新融资方式，建立项目储备库，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发展境外加工贸易；继续推进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务公开和特派员制度；以市直国有企业改制为重点，继续进行未改制企业的改制和完善已改制企业的指导监督工作；推进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多渠道扩大就业；继续调整经济结构，调优一产，调强二产，调大三产；稳粮、优果、增菜、兴牧、促林，大力发展绿色设施和生态农业，发展“公司+农户”“协会+农户”的产销龙头骨干企业，着力提高农民收入。至年底，取消行政审批事项281项，精简率为53.5%；取消违规收费项目547项，签订引资合同71个，合同引进资金30.8亿元；改制市直国有企业38户；新增个体工商户10926户、私营企业512家。火车站改造、东风广场建设等7项市政工程及市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项目全面完成。按90不变价格计算：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0.19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达到32%。其中第一产业产值41.97亿元，第二产业产值62.32亿元，第三产业产值65.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4%、6.7%、9.1%。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24.3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其中工业产值77.0亿元，比上年增长

4.5%；农业产值47.36亿元，比上年下降0.5%，粮食产量在遭受40年不遇特大干旱等自然灾害和调减粮食面积92.5万亩的情况下，总产量仍达154.6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489元，比上年增长1.6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541元，比上年增长10.32%。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住房面积稳步增加，分别比上年增长5.06%和4.45%。

2002年，全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六大和陕西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着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落实型政府。工商企业实施“四三二一”工程（即每年实现4个资产重组项目，3个招商引资项目，组建企业集团2个，计划内破产企业项目1个）；农村全面推行税费改革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五大工程”（即种子工程、优果工程、塑棚工程、养殖工程、山川秀美工程），推进粮食生产向市场化、商品化、效益性转变。渭南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韩城二电厂、渭南师院新校区、沱河城区段综合治理等重点项目先后开工建设。至年底，市级理顺部门职能133项，取消行政审批事项186项，合并36项，下放25项，降低31项，提高了办事效率。全年造林4.95万公顷，退耕还林2.6万公顷，绿化渠、路、坝3000公里，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市”称号；农村税费改革农民人均减负57元；中心城市道路、供排水、天然气利用、电网改造、农田水利、人饮解困、防洪保安、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果汁、油脂、饲料加工等一批工、农业重点项目相继建成。按90不变价格计算：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1.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44.3亿元，第二产业产值66.5亿元，第三产业产值71.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0%、13.3%、8.7%。工农业总值达到137.09亿元，比上年增长10.49%。其中工业产值87.9亿元，比上年增长14.14%。工业结构得到优化，原煤等10种工业产品产量有增有减，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达99.2%。农业产值49.19亿元，比上年增长3.86%。粮食总产达172.1万吨，比上年增长11.32%。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57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5344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97%和17.66%。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3794元，比上年增长15.1%。渭南市及韩城、合阳、澄城、华县、华阴5县（市）被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军区命名为双拥模范城（县）。

2003年全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团结依靠干部群众，一手抓防治“非典”和抗洪救灾，一手抓经济建设，夺取了防非抗灾和经济发展的双胜利。全市没有出现一例“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例，为全省防“非典”守住了东大门。发自8月下旬的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和连阴雨灾害致309.5万人受灾，202万



亩农作物绝收，倒塌房（窑）37.7万间（孔），25.57万人无家可归，4.9万名学生无法入学，淹没区达200多平方公里，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2.3亿元。抗洪救灾期间，累计紧急动员和撤离安置受灾群众37.76万人。调拨粮油和发放供应证，解决29.8万受灾群众每天的吃饭问题；筹集下拨棉被17.3万床、单棉衣物130多万件，搭建帐篷1.9万顶、保暖住房4.5万间，购置安装取暖炉具4.5万套；派出21支医疗防疫队日夜巡诊，组织11个专业打捞队对淹没区漂浮的20余万头动物尸体进行打捞和无害化处理。组织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机关干部和群众4.6万人，排除险情800多处，完成罗纹河、石堤河、方山河入渭口等决口的抢堵合龙。组织113个市级部门和中省驻渭南单位包联重灾村重建家园。采取破堤自排和机械抽排的办法，排完5.2亿立方米积水。支持灾区抢播小麦176万亩。市电信大厦、中行渭南支行综合楼、金水路北段污水管道、沱河综合治理污水归集等工程全面完成。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全市的重中之重，生产总值6.34亿元，增长37.2%。108国道部分路段大修改造、绿色通道建设、韩城10万吨炭黑一期、澄城海升果汁等32个项目竣工或投产，润峪水库等28个项目开工建设。通过举办洽谈会、推介会和组团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招商引资，签订招商引资合同304个，其中上亿元的大项目29个，实际引进资金2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8.7亿元（其中技改投资14.4亿元），增长34.9%。按90不变价格计算，全市生产总值完成207.5亿元，比上年增长8.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4.1亿元，增长1.5%；第二产业增加值82.4亿元，增长15.8%；第三产业增加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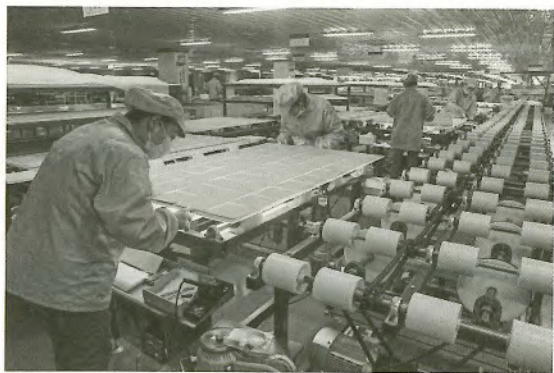
海升果汁

81亿元，增长5%。果品冷藏库容超过20万吨，果汁加工能力新增11万吨、达21万吨，成为全省最大的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苹果加工基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7.6亿元，增长17.8%；实现利润4.53亿元，创近年最高水平。新发展私营企业620个，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35.5%，提高了1.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完成80303万元，同口径增长5.2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61元，增加317元，增长5.9%；农民人均纯收入1589元，增加11元，增长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6亿元，增长7.9%。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95.9亿元，比年初增长16.9%。新增城镇就业岗位4.1万个，新增外出务工人员13.1万人。“两个确保”“两个保证”和城市“低保”得到较好落实。100个扶贫重点村建设、移民二期安居工程等进展良好。严打整治斗争和反对“法轮功”邪教及其他非法组织的斗争，基本实现“两年内使社会治安工作取得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5.17%。

2013年，全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260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24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103.8%，50个项目建成投产，36个前期项目提前开工，澄城烟厂技改、西石化搬迁等前期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举办首届黄河金三角投资合作交流大会，全年签约招商引资项目337个，到位资金494.5亿元，增长20.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67.6亿元，增长25.2%。粮食总产211.2万吨，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到28个，“大荔模式”成为全国农资农技双服务的典范，富平成为全省唯一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改革与建设试点示范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1728.5亿元、增加值603.3亿元。高新区国家级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获得科技部批准，陕煤70万吨聚烯烃生产线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投资60亿元的陕化节能技改项目建成投产，投资50亿元的经开区申华汽车博览园项目开工建设。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2户，工业园区建成区面积达到110.9平方公里，入园企业达到924户。出台《关于促进大华山旅游目的地建设的若干意见》，全市接待游客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12亿元，增长36.3%。新培育发展限上贸易企业95户，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403.4亿元，增长9.6%。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522.4亿元，贷款余额726.02亿元，分别增长13%和16.6%。中心城市实施建设项目163个，完成投资163.8亿元。城市“五纵六横一环”道路网络基本形成，供、排水管网覆盖率分别达到90%和84%。渭河综合整治堤防工程基本完成，城区段2万亩河滩全面实施退耕还河还湿地全年财政民生支出224.8亿元，占全市财政支出的81.5%。新中心医院建成投用，市体育中心、市文化艺术中心和市博物馆基本建



成：新增城镇就业7.4万人，劳动力转移就业130.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3%；65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体检40.3万人，4.5万农村孕妇免费住院分娩，34.4万70岁以上老人享受津贴，15万人享受医疗和临时救助，新农合参合率和城镇基本医疗覆盖面均达到99%；建成各类保障房18918套；34万城乡低保人口应保尽保，18.5万人实现脱贫，33.2万人饮水安全得到解决；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56.48%和68.16%。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企业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在全省率先启动，“营改增”试点进展顺利，组建了4个国有企业集团，完成了12户商贸企业改制。韩城计划单列试点进展顺利，简政放权取得阶段性成效，下放县市区经济管理权限127项，向社会中介组织转移职能49项。行政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初见成效，减少财政供养人员553名。全市“三公”经费下降10.06%。全年科技研发投入13.23亿元，技术交易额完成6094万元，专利授权量529件。首次从优秀工人农民中考试录用公务员27人，先后引进博硕士人才132名，柔性引进院士、专家75名。完善报告工作和联系沟通机制，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复率达到100%。



光伏玻璃制造

2017年，中共渭南市委、渭南市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追赶超越主题，落实“五新”战略任务，着力“三地一中心”建设。新兴产业，新能源动力电池产值超过60亿元，中广核风电一期、桂花光伏并网发电。

增材制造企业发展到65家。编制完成卤阳湖航空产业发展规划，国家民航试飞基地开工建设。中国酵素城入驻企业26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7%，非能工业产值增长31.7%。全面取缔“地条钢”，淘汰火电产能42万千瓦。粮食总产211.54万吨，新增瓜果面积14.8万亩，新建扩建规模养殖场240个，渭南市被授予中国优质果品示范基地，白水被命名为全国绿色食品（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全年新增4A级景区2家，全年接待游客5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26亿元，均实现30%以上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6%。330个市级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年度任务。争取中省预算内资金22.3亿元，专项债券到位41.6亿元，288个



风力发电

PPP项目纳入国家储备库。全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738亿元，增长19.3%。西韩城际铁路、韩（城）黄（龙）高速公路顺利开工。渭东新城加快建设，中心城市“四纵四横”道路提升改造基本完工，水系建设进展顺利。棚户区改造开工2.5万余套，货币化安置率100%，碧桂园、恒大落地建设。全市城镇化率达到46.32%。全域建成清洁乡村1219个、生态乡村361个，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15个。深化“放管服”改革，取消、下放、转移中、省审批事项173项、市级管理权限1385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3.9万户，增长34.5%。金钼独立工矿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试点得到国务院国资委肯定。在西安建设“双创”孵化器，新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市级众创空间7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2家。渭南高新区东区、渭南高新区蒲城园区揭牌成立，富阎一体迈出重大步伐。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设立驻外经贸代表处4个，新增友好城市2个、外贸备案企业40户，实现进出口总额11.57亿元。铁腕治霾，对所有建筑工地实行挂牌监管，先后拆改燃煤锅炉3245台，削减规上工业燃煤141万吨，淘汰黄标车829辆。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建成生态水面1.7万亩，渭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全年造林绿化56.6万亩。渭北采煤沉陷区和秦岭北麓、桥山环境治理成果较大。华能秦电等10家企业实现超低排放，万元GDP能耗下降5.65%。1.18万户群众搬进城镇，1717户危房改造全部完工。全年脱贫8.43万人、退出贫困村194个。全年民生支出344.1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4.4%。新增城镇就业6.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21%。全市安全生产事故同比下降52%。全市“三公”经费同比下降5.61%。全年查处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1091件，处理违纪违规干部1184人。生产总值达到1656.62亿元，增长8.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31.22亿元，增长19.3%；地方财政收入实现73.58亿元，增长12%；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29808元和10260元，增长8.5%、9%。

四、重大战事

1. 秦国晋国之间的争夺战



金陵关

春秋初期，渭南境内东部属晋国地盘。秦国立国后，不断发展壮大，开始同晋国争夺这块战略要地。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正月，晋国发生内乱。晋献公宠妾骊姬谋杀太子申生，立其子奚齐为太子，晋公子重耳逃至蒲城后转白狄，公子夷吾避难于屈后至梁国（今陕西韩城市夏阳镇一带）。周襄王二年（前650），晋献公去世，晋大夫荀息立奚齐为晋君。后奚齐被大夫里克所杀，荀息又立奚齐异母弟卓子为晋君，卓子又被里克杀死。里克遣使赴狄欲迎重耳回

国，重耳婉言谢绝。里克又使人迎夷吾于梁，夷吾遣使赴秦，以割让晋河西之地予秦为条件，请秦国出兵助其归国继位，秦穆公遣大夫百里奚率军护送夷吾回国。夷吾回国后即位，是为晋惠公。

晋惠公即位后并未按承诺割河西之地与秦，秦穆公不快。周襄王六年（646），晋发生饥荒，求助于秦，秦不计前嫌并赠予晋大批粮食。七年（645），秦遭灾求助于晋，晋未给粮，还想借机攻打秦国，秦穆公恼怒，决定攻晋。同年秋，秦穆公亲率大军攻击戍边晋军，三战三捷。冬，深入晋国腹地，晋惠公领兵迎战，十一月，两军决战于韩原，战中秦穆公受伤，晋惠公被俘，晋军全军溃败。

秦穆公将夷吾带至王城（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准备处死。穆公之妻夷吾的姐姐闻后出面求情，穆公答应与晋国谈判。晋大夫阴飴甥与穆公会盟，以太子

圉作为人质，并将河西地割让给秦国为条件，要求释放惠公。双方达成协议。年底，晋国将河西八城划归秦国，晋太子圉入秦，晋惠公回国。

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晋文公、郑文公先后去世。秦穆公趁两国都在新丧之中，于次年派遣大军至晋桃林、崤函，远程奔袭郑都。因途遇郑商人弦高犒师，以为郑已有防备，遂灭晋边小国滑（今河南偃师南）撤军。晋卿士先轸认为秦系晋称霸中原的潜在障碍，于是晋军联合姜戎于崤山（今河南陕县东）设伏，全歼秦军。

周襄王二十七年（前625）春，秦将孟明视请求兴兵伐晋，以报崤山之辱。秦穆公许之，遂命孟明视为主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兵车四百乘攻伐晋国。晋襄公派先且居为大将，赵衰为副将，狐鞫为车右，迎战秦军。当时秦军尚未进至边界，晋将先且居认为“与其等秦军到来，不如主动出击”。遂指挥兵马西进。二月七日，两军相遇彭衙（今陕西白水縣史官鎮南彭衙村），双方摆戈列阵。晋将狼瞫请求先且居说：“过去老师以我无能，罢黜不用，今日让我试打头阵，以雪前耻。”即与好友鲜伯率精兵百余，直冲秦阵，英勇厮杀。两军混战，鲜伯被秦将白乙丙杀死。先且居登车见秦阵已乱，遂率主力发起攻击，孟明视战败逃走，晋军获得大胜。狼瞫在战斗中遍体鳞伤，不日身亡。同年冬，晋国联合宋、陈、郑三国组成联军，命先且居为大将，同宋公子成、陈大夫辕选、郑公子归生率师再次攻打秦国，占秦邑彭衙及汪（今陕西白水县雷牙镇西方城村南）。

孟明视彭衙战败后，仍不灰心，调集兵马，加紧训练。周襄王二十八年（前624）五月，孟明视以“若不能雪耻，誓不生还”的决心，请求秦穆公亲往督战，出师伐晋。秦穆公说：“寡人乃三见秦败焉，若再无功，也无面目回国”。选精车五百乘，择吉日兴师，东渡黄河后焚舟决战，攻占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及郃（今山西临猗西南）。继而北上进抵晋都翼郊，晋采取“四境坚守，毋与秦战”的对策。秦军求战不成，遂经茅津（今山西平陆县西南）南渡黄河至崤，收敛崤山阵亡遗骨，葬于山间僻拗之处。秦穆公素服设祭，哀恸至极。彭衙及汪两邑百姓闻穆公伐晋取胜，哄然相聚，驱逐晋国守将，重归于秦。

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秋，晋襄公为报王官之仇，围攻秦国东部边邑新城（今陕西澄城县赵庄镇新庄村）和祁（今陕西澄城县交道镇元里村）。秦军顽强抵抗，使晋军无懈可击。晋军久攻二城不克，士气低落，只好撤退。秦军乘胜追击，将晋军驱逐出境，夺得大战胜利。

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晋襄公亡。晋卿士赵盾欲立在秦为质的晋襄公庶弟公子雍为君，派使季武子赴秦迎雍。周襄王三十二年（前620）春，赵盾受

襄公妻穆嬴威逼，拥立襄公之子夷皋为君，史称晋灵公。秦康公不知晋已另立新君，派兵护送公子雍回国。赵盾闻讯，一反常态，秘密率军拦截，在令狐（今山西临猗县西南）击败毫无准备的秦军。

秦军败归后，康公对晋反复无常的做法十分不满，准备发兵伐晋，以报令狐之役。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秦康公发兵进攻晋西南边陲重镇武城（今陕西华州区柳枝镇蹇家窑村东北）。经激战，晋军失城败走。秦占据武城后，置武城县。

秦晋武城之战后，晋于周顷王二年（前617）春攻秦，取秦东部边邑少梁（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东少梁村）。夏，秦康公亲率大军反攻晋国，夺占晋西边邑北征（今陕西蒲城县洛滨镇避难堡村）。

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夏，楚国已从晋国手中夺取中原霸权。七月，秦桓公乘晋霸业中衰之际，领兵东进，攻入晋国，进抵辅氏（今陕西大荔县范家镇小伏坡村）。二十七日，晋景公在攻灭潞氏之狄后在稷（今山西稷山南）集结、演练兵卒，令晋军向东北挺进，勘定原潞氏之狄的疆界，使灭亡于潞氏的黎国（今山西黎城东北）复国。闻秦军入晋，急令晋军回师西进，抗击秦军。但晋国衰亡已势不可当。此后，秦国借机占据晋在河西的大片疆土。

2. 魏国攻占河西与秦国收复河西



魏长城烽火台

雷强民拍摄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文侯任用了李悝、吴起等贤臣、名将，通过一系列改革，国家实力日益增强，因此魏国想夺取秦国河西原属晋国之地。而此时秦国则由于内部权力之争，政局不稳，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对外政策。

周威烈王八年（前418），魏文侯令公子击攻打少梁，夺城后，加紧修筑城池。秦国即发兵进攻少梁，两军在少梁交战，秦军战败。秦军为阻止魏军向外扩

张，沿黄河边修筑防御工事。十三年（前413），魏军开始向河西秦军进攻，深入至秦纵深的郑（今陕西华州区西南）地附近，大败秦军。

周威烈王十七年（前409），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大将，再度发起对秦进攻，连续攻克临晋（今陕西大荔朝邑镇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交道镇元里村）两城邑，并在临晋筑城。十八年（前408），魏军复克洛阴（今陕西大荔羌白镇明水村）、合阳（今陕西合阳洽川镇莘里村）两城邑，亦在洛阴筑城屯兵驻守。至此，魏军已尽占河西之地。秦军则节节败退，至洛水沿岸修筑防御工事，并筑重泉城邑（今陕西蒲城龙池镇重泉村）以防御魏军，阻其继续西进。

秦献公即位（前384）后，想收复河西地区，为东进中原做准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周显王三年（前366），秦国开始了收复河西故地的战争。当年，韩、魏两国在宅阳（今河南郑州北）会盟，准备联合攻秦，秦军在洛阴击败魏、韩联军。五年（前364），秦军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杀魏军6万，获得大胜。七年（前362），秦出兵攻魏，在少梁大败魏援军，占领了繁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魏国采取守势作战，修筑了河西长城（南起今陕西华阴，经大荔、白水、澄城、合阳，至韩城）。

献公死后，孝公即位。孝公任用商鞅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十五年（前354），秦军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歼守军7000人，并攻占少梁。二十九年（前340），秦孝公派商鞅率兵攻魏，魏使公子卬率兵抵御。两军相遇，商鞅约公子卬相见，议和罢兵。公子卬不知是计，前往赴会，双方盟誓已毕，正饮酒时，秦预先埋伏的甲士冲出，俘虏了公子卬。秦军又乘势攻魏，魏军无备，大败。魏惠王闻讯，十分惊恐，被迫割让大片河西之地与秦求和。三十一年（前338），秦再次由繁庞渡河进攻，于岸门（今山西河津南）败魏援军，俘主将魏错。同年，秦孝公死，惠文王继位，杀商鞅，重用阴晋人公孙衍。

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公孙衍率军攻魏上郡（西河郡北，黄河中西部延河流域），魏军8万迎战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南），被歼过半，主将龙贾被俘。四十年（前329），秦分兵两路，北路以河西为基地，渡河攻魏河东；南路以阴晋（今陕西华阴市岳庙乡岳东村北）为基地，沿黄河南岸进军，直抵魏崤山长城。次年，秦军继续攻河东，魏求和，将上郡15城全部献秦。此时，秦完全控制了黄河天险，打通了东进中原的要道，战略上居于优势地位，奠定了进军中原的基础。

3. 刘邦还定三秦与韩信木罌渡军

秦末，项羽占领关中之后，把关中一分为三。立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陕西兴平市东南），辖咸阳以西；立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古城村南），辖咸阳以东至黄河；立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区延河东岸），辖上郡之地。封刘邦为汉王，辖汉中之地。刘邦进入汉中后，立即扩充实力，储备物资，广纳贤才，为进入关中做准备。

汉高祖元年（前206）八月，刘邦的汉军由南郑出发，避开雍军主力，从故道迂回到雍军侧后。汉军通过故道要隘，迅速推进到陈仓附近。雍王章邯闻讯，立即仓促率军驰援。两军在陈仓附近展开激战，雍军以轻车列阵，汉军樊噲率部猛冲，一举攻破雍军。章邯撤退，汉军乘胜追击。这时，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派兵支援雍军。汉军与三秦军战于壤东（今陕西武功县东南），经过激战，三秦军大败，章邯只得率军退守废丘。此后，汉军留樊噲率军围攻废丘，其他部队分数路，分别由周勃、灌婴、靳歙等人率领，向三秦军各据点进攻。汉军一路攻城略地，塞王司马欣自知不是对手，很快投降汉军；翟王董翳也无力抵抗，只好束手就擒。这样，三秦大部分地区被汉王刘邦平定，只有雍王章邯率余部据守废丘，拒不投降。刘邦在已占领地区设渭南（后为京兆尹，约今西安市辖区）、河上（后为左冯翊，约今渭南市辖区）、上郡（治所在今榆林市东南）三郡。为扩大战果，第二年三月，刘邦留韩信率兵围攻废丘，自带兵马，从临晋渡黄河东进。由于东进受阻，同年六月，刘邦还师关中栎阳，集中兵力围攻废丘。废丘城池坚固，汉军久攻不克，最后决定用水攻的办法。汉将樊噲派兵掘开渭水河堤，引水冲击城垣。城墙坍塌，汉军乘势攻进城内。章邯见汉军进城，知道大势已去，于是自杀身亡。废丘攻克，三秦属地全部平定，刘邦还定三秦大功告成。

刘邦平定关中之后，认为河东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进对关中构成威胁，南下可以截断汉军的粮道，与楚军形成对汉军的夹击之势。于是，派酈食其前去劝说魏王豹归顺汉王，并许诺封以万户之邑，却遭到魏王豹的拒绝。刘邦见劝说无效，决定发兵征讨。他任命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一起伐魏。韩信在出兵之前，找来酈食其了解魏将领情况。他听说魏王豹不用有战斗经验的周叔为大将，却用无经验的柏直，心中就有了对敌之策。他分析魏必然凭借黄河天险，扼守主要渡口，采取固守的战略，打持久战。于是，他审时度势，针锋相对地制定了速战速决的战略，决定用奇袭的战术一举击破魏军的防线。汉高祖二年（前205）八月，韩信率军从关中出发，兵临黄河岸边。魏王豹得到消息，立即派大将柏直率主力部队集中于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封锁了从黄河西岸

临晋到蒲坂的渡口，派重兵把守，防止汉军过河。韩信探知魏军的部署之后，将计就计，在黄河西岸大布疑兵，陈列许多渡船，摆出一副从这里渡河的架势，暗地里却派曹参率部向北进发，到黄河北部的夏阳（今陕西韩城市南）选择渡口，制作了大批“木罌”，作为简易渡河工具，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黄河。汉军过河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魏重镇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魏王豹闻讯大惊，急忙回师救援，但军心已经大乱，难敌汉军的猛烈进攻，遭重创后向东退却，汉军乘胜追击。九月，汉军俘虏了魏王豹，兵不血刃进入魏都平阳。随后，韩信又分兵平定河东各县，在黄河以东置河东郡。韩信木罌渡军打败魏王豹，不仅消除了魏对关中的威胁，对减轻刘邦主力在中原作战的压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著名战例。

4. 绿林、赤眉起义军华阴之战

新天凤四年（17），长江中游地区爆发了王匡、王凤等人领导的绿林起义。新地皇四年（23）二月，受刘汉正统思想影响，起义领袖拥立刘玄为帝，国号仍为汉，建元更始。王莽听到起义军建立政权的消息，十分震惊。为了加强对长安的守卫，除调动兵马驻守洛阳外，命督尉朱萌、右队大夫宋纲加强对武关的守备。同时，加封史熊、王况、郭钦等九人为将军，均以虎为号，号称“九虎”，率领御林军数万人，在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一带布防，保卫京师粮仓，护卫长安。八月，王匡亲率绿林军主力攻打洛阳，命西屏大将军申屠建等率军攻打武关。武关攻克后，义军又挥师北进，进逼华阴。在华阴，王莽的九虎率御林军北起渭河，南抵秦岭，摆开一字长蛇阵，各自据险自守，应对绿林起义军。因为他们的妻儿老小均在长安，实际上被作为人质，所以，只有背水一战。绿林军王匡带着弓箭手占据高地向九虎挑战，而邓晔率2万余人，从阌乡南山绕道北行，直出王莽军后面，突入九虎军营。九虎众将顾此失彼，顿时乱作一团。王匡从高处看见邓晔的军队，当即率军驰下夹击，杀得九虎将措手不及，大败而逃。史熊、王况逃回长安，在王莽的逼问下，自杀而亡。华阴之战，导致王莽政权彻底灭亡。更始二年（24）二月，刘玄从洛阳迁都长安。

刘玄迁都长安不久，内部腐化分裂。山东人樊崇领导的赤眉起义军决定西攻长安，以取代已蜕变的更始政权。赤眉起义军一路过关斩将，于更始三年（25）正月，到达弘农（今河南灵宝境内），因一路取胜，人员大增。于是，对军队进行整编，每万人组成1营，共30营。每营设三老、从事各1人，实施管理。随后，向华阴进军。六月，到达郑县（今陕西华州区），遂设坛立刘盆子为帝，

称建世帝，自号建世元年。以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义军继续西进，经高陵，然后攻入长安，更始政权灭亡。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领导集团内部互相争权夺利，纪律松弛，丧失人心。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十二月，赤眉军20多万人离开长安，经郑县、华阴之大道向函谷关进军。此时，光武帝刘秀派遣征西大将军冯异向关中进军，越过函谷关进入关中。次年正月，冯异的军队与赤眉军在华阴遭遇，两军相持60多天，交战数十次，互有胜负。后冯异东撤崤山，与邓禹合兵一处，利用崤山天险，一举打败赤眉军。刘盆子投降刘秀，建世政权灭亡。

5. 潼关大战

潼关地处陕西东端，秦、晋、豫三省要冲，南临巍峨秦岭，北濒黄河、渭河天险。潼关设关城始于东汉。建安元年（196），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改入关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此后，潼关成为长安的门户，兵家必争的要地，经历了无数次战争。这里仅记几次主要战事。

曹操潼关战马超发生在东汉末期。东汉建安十六年（211），丞相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进攻汉中的张鲁，同时命征西护军夏侯渊渡黄河入关中，名义去汉中与钟繇会合，其实是逼关中的马超、韩遂反叛，进而名正言顺讨伐之。果然，马超、韩遂等人联合起来，抗拒曹操。他们拥兵10万，割据关中，扼守潼关。八



潼关十里画廊

月，曹操率主力逼近潼关，与马超形成隔关对阵。曹操用大部兵力佯攻潼关，吸引马超，却派徐晃、朱灵2人率4000人，由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偷渡黄河，占据河西地区。随后，曹操率军由潼关北渡黄河。他让部队先行渡河，自己与百余勇士在南岸掩护。马超率军向曹操进攻，射来的箭如同暴雨，曹操稳坐行军凳一动不动。许褚扶曹操登船，因船夫中箭而亡，他一手举马鞍为曹操挡箭，一手划船。紧急时刻，校尉丁斐放出一群牛马。马超的军队开始抢夺牛马，顿时陷入混乱。曹操趁机渡过黄河，向北前进。又从蒲坂西渡黄河，沿黄河西岸向南推进。马超的部队退到渭河口，抗拒曹军。曹操四处设疑兵，迷惑对方，暗中令士兵在渭河架浮桥，南渡渭河，宿营渭河南岸。马超趁夜间偷袭曹营，被曹操的伏兵击败。九月，曹操的军队全部渡过渭河。马超多次向曹军挑战，曹军总是坚守不战。曹操按照贾诩的计策，挑拨马超与韩遂的关系，马超果然中计。后来，曹操约定日期，与马超会战。曹军先以轻装士卒与马军作战，待挫伤对方锐气之后，立即派出骑兵，突然从两面夹击，大败马超军队。马超、韩遂逃往凉州，曹操全部占领关中。

东晋与后秦潼关之战是导致后秦灭亡的战事。东晋义兴十二年（416）八月，东晋太尉刘裕统率10万大军，以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为先锋，北征后秦。这时候，后秦姚泓既要在西部与大夏作战，又要应对东晋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十月二十日，檀道济率军逼近洛阳。后秦守洛阳的征南将军姚洸不战而降。次年正月，王镇恶不等刘裕大军赶到，便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镇恶率领，迅速进抵潼关城下；另一路由檀道济、沈林之带领，自陕县北渡黄河，去进攻蒲坂。此时，后秦以太宰、大将军姚绍率武卫将军姚鸾等5万人镇守潼关，又命姚骧增援蒲坂。蒲坂城屡攻不克，檀道济、沈林之便商议，南下与王镇恶合兵攻打潼关。三月，二人抵达潼关。姚绍率军出战，被檀道济、沈林之军队击败，损失1000多人。姚绍退兵于潼关西之定城（今华阴市境内），据险防守。同时，派姚鸾领兵截断大路，阻止东晋军运粮。姚鸾先派将军尹雅与东晋军战于潼关之南，被东晋军打败，尹雅也被俘。三月四日晚，沈林之率精锐士兵偷袭姚鸾军营，杀死姚鸾及数千人。姚绍又派姚赞屯军黄河岸上，以截断东晋军水运。沈林之再次出击，姚赞兵败，逃回定城。但东晋兵后援未至，粮草短缺，军心浮动。王镇恶派使者驰告刘裕，却远水不解近渴。他们不得不亲自到弘农，动员民众捐献粮草，才暂解粮草之危。四月，姚绍再次命长史姚治、宁朔将军安鸾等率2000人，驻守黄河以北，欲再断东晋军粮草，又被沈林之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姚绍得知姚治等人兵败身亡，悲愤至极，不久病死。姚赞率兵偷袭沈林之军营，又被

击败，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八月二日，刘裕率大军到达潼关。王镇恶见定城久攻不下，决定绕过定城，沿渭河逆水而上，直逼长安。姚赞得知东晋军已到长安，只得放弃定城，退守郑县（今陕西华州区）。八月二十三日，王镇恶攻入长安，姚泓率群臣投降，后秦灭亡。

哥舒翰与崔乾祐之战发生在唐天宝年间。天宝十四年（755）二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率兵15万西进反唐。唐玄宗任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领兵20万，扼守潼关。次年，占领洛阳的安禄山派部将崔乾祐攻打潼关。哥舒翰认为潼关宜据险固守，不宜出战。但朝中杨国忠日进谗言，怨哥舒翰逗留不进，坐失战机，奏请玄宗催促哥舒翰出关进兵。禁不住杨国忠多次催促，唐玄宗便一日派三使，催促哥舒翰出关。哥舒翰无奈，只好率15万步兵，东出潼关。行至灵宝塬，见叛军南依秦岭，北控黄河，据险扎营。哥舒翰令王思礼率兵5万，充当先锋。别将庞忠引兵10万接应，自率亲兵3万，登黄河以北高地，扬旗擂鼓，督战助阵。崔乾祐领兵万余人，前来挑战，却三三两两，不成队形，忽合忽离，忽进忽退。官兵不知是计，便挥军向前，渐及敌阵，崔乾祐遂偃旗退去。王思礼、庞忠督军力追，走入隘道，正观望间，忽听连珠炮响，木头石块，一齐抛下。官军进退维谷，伤亡惨重。经此一役，官军元气大伤。六月十四日，潼关失守，哥舒翰也被部将火拔归仁劫持，投奔安禄山。后囚于洛阳，安庆绪兵败撤退时被杀。

6. 宇文泰、高欢沙苑之战

西魏大统三年（537），西魏丞相宇文泰在潼关击败东魏军，占据东魏弘农（今河南灵宝一带）。时值关中遭灾，粮食匮乏，宇文泰就驻兵弘农，休养生息。附近的东魏地方官员，当地的豪绅纷纷依附宇文泰。

东魏高欢见宇文泰抢占了弘农，立即发兵争夺。九月，亲率20万大军，渡黄河逼向西魏军。同时，派大将高敖曹率3万人，扑向关中。宇文泰兵力不足1万，得知高欢要渡河西进，立即率军退入关中。高欢率军渡过黄河，直逼华州（后改为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华州刺史王黑立即布置兵马，严加防备。高欢见一时难以取胜，就率军驻扎在许原（今陕西大荔境内）西部。

宇文泰驻军渭南，并迅速发令，让各州军队前来参战。同时，他召集在渭南的将领开会，商讨对敌之策。宇文泰首先发言：“高欢翻山渡河，远远赶到这里，是天将灭他。我打算与他决战，大家认为如何？”众将领信心不足，认为应该让他再西进一下，然后待机决战。宇文泰态度坚决：“要是让他西进咸阳，关

中人心就会浮动，社会就会骚乱。现在趁他立足未稳，正好打他。”于是，宇文泰令部队在渭河架上浮桥，每人只带3天的口粮，轻装渡过渭河。军中大量輜重，则沿渭河向西运送，屯放于安全之处。

十月一日，宇文泰率军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县南部），与高欢的军队相距60余里。高欢得知西魏军到来，便率大军前来迎战。二日，宇文泰得到消息，立即召集众将，商议对策。李弼建议，敌众我寡，不能在平坦之地列阵对敌，应将部队开到向东10里的有利地形，与其决战。宇文泰采纳他的建议，下令军队向东开往渭河湾处，面东背水，形成包围圈。李弼军为右翼，赵贵军为左翼。令将士们把身体和武器隐藏于芦苇丛中，听到鼓声再奋起厮杀。过了正午，高欢率军赶到，宇文泰只用少量兵力诱敌深入。高欢见对方兵少，带兵穷追不舍，想一举歼敌。等高欢军队进入伏击圈，宇文泰亲自击鼓，李弼、于谨等6员战将率将士们冲出芦苇，奋力拼杀。高欢军队猝不及防，手忙脚乱，被截成两段，互相不能照应，全军乱了阵势。两军大战到晚间，东魏军被杀6000余人，投降2万余人。高欢乘着夜色，率残兵败将向东逃跑。西魏军穷追不舍，直追到黄河边上，又杀死和俘虏许多东魏士兵。此役，宇文泰共俘虏东魏军8万余人，除留2万收编为西魏军外，其余全部遣散。



沙苑晨曦

战后，西魏文帝晋升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将其采邑增加到5000户。对其他有功将领，也都进行了封赏。宇文泰率军回到华州后，一些受命参战的军队才赶到华州。为纪念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宇文泰让参加战斗的将士，每人在沙苑

战地植树一棵。

7. 同州、华州的攻防之战

西魏废帝三年（554），原治所在武乡县（今陕西大荔县）的华州改为同州，原治所在郑县（今陕西华州区）的东雍州改为华州。从此，渭南境内两州并存达一千三四百年。历史上，同州、华州作为陕西关中东部重镇，曾经发生过许多兵家相争的浴血战争。这里仅记述几次有一定代表性的攻防战事，以示同州、华州地位之重要。



同州

唐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破潼关，进入长安，建立“大齐”农民政权。随即派出大将朱温为同州刺史，驻守同州；任命部将乔钐为华州刺史，留守华州。次年三月，官军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长安城。五月，昭义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市）高浚出兵西进，攻打华州城。守城义军顽强抵抗，但因孤立无援，华州失陷。八月，义军将领李详在石桥打败高浚，重新收复华州。黄巢遂任命李详为华州刺史。这时，长安已被唐军包围，黄巢之令已很难到同州、华州。中和二年（882）七月，义军同州刺史朱温杀死监军严实、大将马恭，将同州献给唐军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九月，李详也准备降唐，被黄巢察觉，斩首于渭南赤水镇。黄巢任命弟弟黄邺为华州刺史。十一月，李详旧部王遇赶走黄邺，投向唐军，王遇升任华州刺史。至此，同州、华州均被唐军占领，黄巢东部门户洞开，情况更加危急。次年正月，唐军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4万骑兵进军同州沙

苑地区，打败黄巢二弟黄揆。二月，李克用联合王重荣等进军渭南，欲攻长安。黄巢即令京兆尹王璠、军使林言为左路军，宰相尚让、赵璋为右路军，起兵15万迎战，与唐军大战于渭南良田坡。黄揆乘隙率军袭击华州，赶走王遇，重新占领华州。二月十七日，李克用率军攻打华州，在城外四周深挖壕沟，树立木栅，将华州城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引兵救援华州，在零口（今西安临潼区零口镇）被王重荣打败。黄揆独守华州孤城，处境艰难，遂于三月二十七日弃城逃走，李克用占领华州。

光启元年（885）三月，宦官田令孜挟持唐僖宗由成都返回长安。对田令孜当政，藩镇将领多有不服。五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调任泰宁节度使。王自认收复京城有功，不肯就任，并上表历数田令孜离间君臣10罪，要求清君侧。田令孜大怒，令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等出兵讨伐王重荣。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得到李克用支持。十月，田令孜令朱玫、李昌符率本部军卒及神策、鄜、延、灵、夏等军各3万人，屯驻同州沙苑，抵御李克用。十一月，王重荣领兵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迎战，战死沙场。王重荣与朱玫相持月余，李克用引兵来到，与王重荣合兵一处，共同御敌。十二月二十三日，两军展开激战，朱玫与李昌符战败，率残部逃回本镇。李克用、王重荣进逼长安，田令孜挟僖宗出逃凤翔，二人遂还军河中。

后梁乾化二年（912）六月，梁太祖朱温的私生子、郢王朱友珪杀父篡位，改元为“凤历”。八月，藩镇河中的冀王朱友谦对其十分愤恨，连同河中之地一并归顺晋王李存勖。次年二月，均王朱瑱等人起兵讨伐朱友珪，将其杀死，登上皇位，史称梁末帝，复改年号为“乾化”。这样，朱友谦又再次归顺于梁，但仍与晋王关系密切。贞明六年（920）四月，朱友谦为扩充势力，起兵攻打同州，晋、梁之争由此而起。朱友谦先派儿子朱令德驱逐了同州忠武节度使程全晖，然后奏请梁末帝让朱令德接任。梁末帝起初不准，后又让朱友谦兼任节度使。朱友谦在朝命未下之前，又求于晋王李存勖，晋王则亲书手令准许。于是，朱友谦彻底背叛末帝而归顺晋王。末帝闻讯大怒，调泰宁（今山东兖州）节度使刘鄩为河东道招讨使，率兵围攻同州。朱友谦命朱令德坚守不战，使刘鄩围城多日难克，同时又向晋王求援。晋王派内外藩汉马步总管李存审等率兵相救。八月，晋兵西渡黄河入陕。李存审深谙兵法，知梁军素来轻视河中兵，选派晋兵200人混入河中兵内，直冲梁军刘鄩阵中。刘鄩令千余骑兵迎战，搏杀中方知是骁勇善战的晋兵，大惊失色，被俘50余骑，大败而归。李存审趁势占领同州以东的朝邑，并分兵连夜进攻华州，毁坏华州外城。李存审在朝邑休整后，再次进攻刘鄩军营。刘

郭无奈，率全军迎战，结果惨败，死伤万余，退至罗文寨，死守不战。后寻机退向渭河以北下邽、蒲城一带。

8. 宋金富平之战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金太宗完颜晟拟乘宋西北部精兵东调之机，派兵攻打陕西。金军左副元帅完颜宗翰派遣陕西都统完颜洛索和副都统萨里罕由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出兵攻破长安，分兵攻打延安、凤翔府，继而攻打陕、华、陇、秦诸州。南宋陕西制置使钱盖知情后，檄告集英殿修撰、鄜延经略王庶，兼统环庆、经原二路兵抗击，随后各路宋兵纷纷响应，金军被迫东撤。是年七月，南宋朝廷极力主张抵抗金兵侵略的资政殿学士、东京留守、开封府尹宗泽病故，金国闻讯后决意向南宋大规模用兵。

建炎四年（1130）七月，金太宗完颜晟因四太子完颜宗弼（兀术）渡江攻宋受挫，根据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的建议，在中原扶植南宋降臣刘豫建立伪齐政权，形成与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带。同时，将攻宋的主要方向由东南转向西北，以右副元帅完颜宗辅替代陕西都统完颜洛索为攻陕主帅，并将完颜宗弼由六合县（今属江苏省）西调洛阳，企图集中兵力，先定陕西，尔后入川，迂回灭宋。是月，在金兵追击下由扬州逃往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的宋高宗，由于不知金朝改变攻宋方略，在完颜宗弼西调后，犹恐金军再度南下，便命知枢密院事兼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在陕西发动攻势，以牵制淮南金军，使其不能集兵南下。短于用兵的张浚急于转守为攻，拒绝了都统制、威武大将军曲端按兵据险，先行防御，待一二年后再行反攻的正确建策，并罢去其兵权。他选将治兵，调整部署，决心按宋高宗旨意大举反攻，准备先分兵攻取同州、鄜州（治所在今陕西富县）、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然后，与金军决战。八月，张浚发布攻金檄文，命权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收复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命环庆路（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经略使赵哲收复鄜州、延州等地。金国闻宋军出击，急令完颜宗弼率精兵二万由西京（今山西大同）星夜驰入潼关，又令完颜洛索率军数万由河东进屯绥德军（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遏阻宋军，并与完颜宗弼会合。张浚得悉金军主力入陕，遂命熙河路（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经略使刘锡、经原路（治所在今甘肃平凉县）经略使刘锜、秦凤路（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经略使孙渥东进，与赵哲、吴玠会合。五路大军共40万人、马7万匹，向关中平原耀州（治所在今陕西耀县）、富平地区集结。张浚预借了川陕五年民赋，集中粮草，以供军需，坐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督战，并以刘锡为都统制节制诸路大军，与

四、重大战事

金军决战。九月，刘锡率各路军马进抵富平，完颜宗辅也率金军屯兵于下邽（今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一带），两军相距80里。宋军在富平县城北虜营（今军寨）布防，以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地为屏障扎营列阵，诸路运送粮草、辎重的民夫，以车马为卫，在宋营外围设寨。宋军部署已完，诸将建议张浚，趁北路金兵完颜洛索部尚未到来之前，先攻南路完颜宗弼军队，各个击破。而张浚自持兵多势众不听，执意致书金营，约定日期会战。金兵因北路军未到，不作答复，缓兵以待完颜洛索会合。不几日，北路金军完颜洛索部驰抵富平。完颜洛索率领数十骑兵，登高望远，发现宋军虽多，但布阵不齐，壁垒不固，极易攻破。待宋军约定决战之日，金兵仍然示弱不出，致张浚误以为金军怯阵不敢应战，更加骄傲轻敌。吴玠认为宋军所处地势不利，建议应移据高地，以遏制金军的骑兵，刘锡等人却以为宋军众而金军寡，又有苇草和沼泽地阻拦，骑兵难以驰骋，不听吴玠的建议。为了恫吓金军，刘锡还诈立已被罢官的曲端军旗，以张声势，被完颜洛索识破。九月二十四日，刘锡先后派遣千余人，向金军发起试探性进攻，完颜洛索据险设防，并以轻兵诱宋军深入，前后夹击，将其斩俘殆尽。随后，完颜洛索选精锐骑兵3000，以土囊在苇泽中垫路，逾淖而进，先攻宋军外围的民夫小寨。民夫们慌乱逃入宋军营中，引起诸军大乱。金军以完颜洛索部为右翼，以完颜宗弼部为左翼，向宋军发起进攻。宋军仓促应战，失去统一指挥，五路各自为战。刘锜身先士卒，率泾源路宋军迎击金兵完颜宗弼部，杀获金军甚多。金将韩常被流矢射中一只眼，与完颜宗弼冲破包围，被迫退却。完颜洛索见金军危机，率右翼猛攻环庆路赵哲部属，使金军军势稍有振作。但由于诸路宋军互不接应，赵哲孤军无助，临阵擅自脱逃，致部将也争相逃遁，宋军溃乱。战至黄昏，金军奋力猛攻，宋军

大败。刘锜也退往邠州，遗弃车马、辎重无数。

十月，张浚以败军之罪贬逐刘锡，斩赵哲及其部将张忠、乔泽，使军心惊惧。环庆路将领慕容洮叛投西夏，泾原路将领张中彦、李彦琪叛降金军。张浚退守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陕西大震。

此次宋金之战后，金军乘胜向陕西内地大举进攻。张浚率残部退至兴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县）。耀州、凤翔府也先后降金。至次年三月，金军攻占陕西五路大部地区。宋朝军队退守秦岭北麓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以及阶州（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成州（治所在今甘肃成县一带）等地，据险设防，与金军对峙。



9. 蒙金潼关之战

金贞祐三年（1215）元月，蒙古太师穆呼哩派部将史天祥攻取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围攻中都（今北京市）。七月，成吉思汗派繖格巴图为帅，率万余骑兵自西夏经关中京兆（今陕西长安）攻金国潼关。因金将死守而转由南路经汝州侵扰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在距汴京20里处被金花帽军击败，兵退陕州，渡河北去。其时，蒙古兵势正盛，金国派人向蒙古议和。蒙古部将萨木哈因贪战功，派伊实里对金宣宗说：“若要议和，金国需以河北、山东所有城邑献于蒙古，且取掉帝号称臣。”因此议和不成。是年九月，蒙古攻取金城寨862个。

金贞祐四年（1216）四月，知平阳府胥鼎闻蒙古兵再度进攻潼关，即派必喇阿鲁岱、图克坦伯嘉率军1.5万人，由便道过河，赶赴潼关，自己率精兵援助汴京。同时，派布萨萨固珠率兵增援潼关，并相机与诸将会合，防备蒙古兵破潼关向东进攻。九月，蒙古进攻金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县南），金宣宗急令御史大夫永锡领兵赶赴陕西，相机从事。是月，蒙古进攻金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部将格巴图鲁率兵由西夏赶赴潼关。十月，蒙古兵进攻潼关，金陕州宣抚使兼安西军节度使尼庞古富勒呼兵败战死，潼关为蒙古占领。遂后，蒙古分兵东犯河南。河南行省胥鼎闻潼关失守，命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市）元帅左监军必喇阿鲁岱率兵1万，孟州（治所在今河南孟县）经略使图克坦伯嘉率军5000，由便道过河赶赴潼关。十一月，蒙古兵至澠池，大败金将富察伊尔必斯。胥鼎担心蒙古兵扼守黄河，急令绛、解、隰、吉、孟五州经略司会合，对蒙古军形成夹击之势。蒙古军战败，自三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北三门镇）、集津（今河南三门峡市集津镇）北渡黄河，向平阳退去，金兵再次收复潼关。

金元光元年（1222）十月，蒙古部将布哈领兵进攻金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蒙古兵马都元帅石天应对将佐们说：“河中东西都是平川旷野，南有潼关，西有京兆，北接汾晋，西连同（州）、华（州），实为用武之地。若起漕运供给粮饷，则关内即日可取”，大大鼓舞了士气。随之，攻克河中。继而西渡黄河，进攻同州。金同州同知节度使完颜额尔坚守抵抗，双方死伤惨重。十一月，同州城内粮草断绝，节度使李复亨、同知节度使完颜额尔战败自杀。穆呼哩继而驱兵蒲城，直逼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哈达率兵20万抵抗，蒙古兵久攻不克。

金元光二年（1223）正月，金将侯小叔自中条山率兵攻袭河中。蒙古兵马都元帅石天应派骁将吴泽引兵五百夜出东门埋伏于两谷间，在金兵行进过半时前

后夹击。因吴泽当晚喝醉了酒卧倒在山林中，使金兵直抵城下，守城兵卒多是新兵，四处逃散。金将侯小叔登上城楼，石天应仓促应战。金兵四面合拢，石天应战死。穆呼哩在同州欲过黄河增援，浮桥已拆，遂领军在河西破金国堡寨十余处，后东渡黄河营救河中。

金正大四年（1227）七月，蒙古太祖成吉思汗消灭西夏国后身染重病，临死前对左右大臣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攻破。不如借道于宋，宋、金两国世仇，必能答应。如此方可从唐、邓二州进军，直逼大梁，金国必然从潼关调兵，但数万兵千里救援，人乏马困，虽然到达，也疲惫不能战，攻之即破无疑。”是年十二月，蒙古大军逼近京兆，并破关外诸路关隘。金兵则放弃河北、山东，调精兵20万增援河南，保守潼关。金正大七年（1230）十月，蒙古将领图垒率部再度入陕，与金兵转战于京兆、同州、华州之间，破除金兵栅寨60余所，进逼凤翔。金派完颜哈达及布哈行省事于阆乡，固守潼关。十一月，蒙古兵先攻潼关、蓝关（今陕西商县西北），因金兵守围严密，攻而不克。东路受阻，借走南路亦不成，蒙古兵遂转攻韩城、蒲坂。

金正大八年（1231）春，蒙古兵围攻凤翔府。金行省完颜哈达和布哈受命救援，出潼关到华阴，与蒙古渭北军交战一天，晚上怕潼关失守，急退入关，无力顾及凤翔。九月，蒙古兵进攻河中。金权签枢密院事草火额尔克、元帅板子额尔克担心兵力不足，放弃河中城一半，据守另一半。蒙古兵筑松楼、掘地穴，奋力攻击。苦战半月，蒙古兵生擒守将草火额尔克，并将其杀死。板子额尔克闻讯，率3000余名败兵逃往阆乡。蒙军穷追不舍，进攻潼关东小谷（禁谷关），金驻关总帅领兵迎战。金还派完颜彝（陈和尚）领忠孝军一千，都尉夹谷浑军一万来援，蒙将速不台战败退走。

金正大九年（1232）二月，蒙古军攻破饶风关（今陕西石泉县境），金速令图克坦乌登行省事于阆乡，图克坦伯嘉为关陕总督，以防蒙兵攻潼关。伯嘉入陕后，号令县镇迁入大城，粮草、辎重屯于陕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同时，诏令乌登与潼关总帅纳哈普舍音，秦蓝总帅完颜重喜等率军11万、骑兵5千，从虢调军粮数十万斛，用二百余艘船沿渭河运入同州、华州、阆乡。又将民间的粮食运至灵宝、硤石以作补给。完颜军在途中与蒙古骑兵相遇，激战后溃退。金潼关守将李平抵挡不住蒙军的进攻而投降，潼关失陷。蒙古军长驱直入陕州。乌登所率领的阆乡军士，夹杂许多百姓，由西南进入南部大山之中。蒙古军闻知后，从卢氏以数百骑兵一路追赶。由于山路积雪，道路昼消夜冻，泥泞不堪，军中老幼嚎哭不止。行至铁岭，战不能战，退不能退，完颜重喜首先投降，被立斩于马

前，乌登、纳哈普舍音亦被蒙古骑兵抓获后杀掉。

10. 护国军讨袁逐陆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陕西蒲城籍学生井勿幕就加入了同盟会。次年，他回到家乡，宣传同盟会的主张，并先后发展数十人加入同盟会。蒲城县高等小学堂建立时，有不少同盟会员在该校任教。光绪三十三年（1907），蒲城县成立教育分会，同盟会员常铭卿还担任了会长。同盟会在蒲城的活动，引起知县李体仁的惊恐，他一边写信给陕甘总督升允，一边将自己的亲信向高等小学堂安插。他的行为遭到了师生的抗拒。李体仁借故查封学堂，解散教育分会，并逮捕了常铭卿及40多名学生，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学生原斯建因受刑过重，被释回家，不久死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蒲案”。该事件在西安、上海、北京及日本东京都引起了巨大反响，清朝廷不得不将李体仁革职。蒲城、华州（今陕西华州区）早期同盟会的活动，使渭南成为陕西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但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护国运动风起云涌。陕西革命党人策应云南的护国战争，掀起“反袁（世凯）逐陆（建章）”的斗争。革命党人在西安商议组织讨袁义勇军，推举康毅如为临时总司令，李养初为东路总司令，吴希真为西路总司令，李秋轩为南路总司令，曹世英、高峻为北路总司令、副总司令，并商定以各总司令所在地区的长安、蓝田、乾县、华阴、华州、白水为据点，伺机发难。

1916年初，东、南、西三路举义均遭失败，只有北路的斗争日益高涨。3月24日，郭坚、耿直、曹世英、高峻等在李岐山的策应下，于白水县树起“西北护国军”的义旗，由高峻任西北护国军总司令，郭坚任副总司令，并发出讨袁通电。为了扩大影响，护国军向北进发，在几个月内，接连攻占黄龙山以北多县，准备渡黄河讨袁，因晋军阻拦，未能实现。护国军又南下到富平县美原镇一带，各地会党、刀客、退伍士兵等纷纷追随，部队达到20000人，实力大增。

此前，陆建章为防备渭北革命活动，任命第四混成旅旅长陈树藩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由大荔移防蒲城，准备进攻郭坚等部。国民党人士开始做陈树藩的工作。胡景翼到蒲城，表示愿到陈的手下当差，很快得到其信任，被任命为备补连连长，很快又提升为游击营营长，驻扎富平。护国军力量的发展，使陆建章十分震惊，急召陈树藩，令其剿灭护国军。陈树藩派陆建章之子、

秦军第一旅旅长陆承武率“中坚团”3000多人，开赴渭北巡防。5月7日，陆承武率军到达富平。胡景翼与民党人士商议，决定趁其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举旗反陆。当晚半夜时分，游击营官兵同时向书院、县衙等处发动猛烈进攻，城内百姓、城外豪侠也纷纷参战。拂晓，城外联络民军的张义安、岳维峻率部赶回参战，义军战斗力大增，胡景翼亲率部队攻入县衙，活捉陆承武。陆部其他官兵得知主帅被擒，不敢再抵抗，遂退至三原。这次战斗，胡景翼率部共毙伤“中坚团”官兵300余人，取得了讨袁逐陆斗争的重大胜利，史称“富平兵变”。

“富平兵变”发生后，陆建章发电报给胡景翼，表示只要保证其子生命安全，一切愿谈判解决。云集富平的革命人士商议对策，一致同意成立陕西护国军，公开树旗讨袁逐陆，并推举胡景翼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恰在这时，陈树藩率骑兵百余人，由蒲城来到富平，胡景翼遂拥戴陈树藩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5月9日，陈树藩在蒲城宣布陕西独立。11日，正式通电全国，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12日，进驻三原，并以起义部队为主分编左右两翼，胡景翼任左支队长，率两营经高陵向西安以东挺进；郭坚任右支队长，经三原向西安以西挺进；陈树藩的亲信刘世璇率部向西安以北集结，形成对西安的包围态势。并以陆承武为交换条件，迫使陆建章离陕。陆建章见在陕西已难立足，遂与陈树藩达成“献城赎子协议”。26日，陈树藩护送陆建章全家离陕，陆建章向袁世凯推荐陈树藩登上陕西督军之位。6月6日，袁世凯病逝。7日，陈树藩便宣布取消陕西独立，表示效忠北洋政府。10日，北洋政府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7月，又让其兼任陕西省省长。这样，陕西护国军讨袁逐陆的成果被陈树藩窃取。

陕西革命党人的革命行动并未停止。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出兵讨伐段祺瑞。12月3日，高峻首先在白水起义，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独立，发布檄文，历数陈树藩的罪状。陈树藩急忙调兵围剿。10日，耿直乘省城兵力空虚之际，亦起兵反陈。郭坚闻讯，从凤翔赶去支援。郭坚、耿直会合后，在周至召开将校会议，发布檄文，护法讨陈，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坚任总司令，耿直任副总司令。陕西靖国军与北洋军阀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陈树藩进行了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1921年，陈树藩逃离陕西，冯玉祥任陕西督军，靖国军各部分别被收编。9月25日，胡景翼通电取消靖国军。1922年1月，靖国军总司令部全部解体。



王尚德烈士（临渭区教育局提供）

11. 渭华起义

1922年7月，王尚德受中共武汉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陕西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8月，同张浩如等人一起，在赤水镇建立陕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9月，建起私立赤水职业学校，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1924年6月，按照团中央指示，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8月，改称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特别支部。这是陕西建立的第一个团支部。1925年12月，赤水职业学校的六七名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赤水特别支部，从此，陕西东部乃至陕西省共产党的发展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时期，渭南、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一带是陕西革命斗争最活跃的地区，先后爆发了渭南县故市、东西两塬和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高塘10余万农民轰轰烈烈的交农运动，成立了陕西地区最早的农民协会——东张村乡农民协会，召开了有临潼、澄城、富平、渭南、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等地60多个团体、200余人参加的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些由陕西早期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活动，为渭华起义的发动既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提供了必要的干部准备。



崇凝苏维埃政府旧址——老爷庙

1928年2月，渭南发生了“宣化事件”。渭南县城西北八里处有座庙宇叫宣化观，观内有地下共产党员管理的宣化小学和当地劣绅控制的乐育小学两所学校。28日，乐育小学以县政府要对两所学校校舍之争“过堂”为借

口，诱骗宣化小学的多数教师进县城。随后，纠集地痞流氓四五十人闯入宣化小学，砸坏校牌，殴打教师，驱赶学生。中共渭南县委及时采取措施，29日，组织群众声讨其恶行，并通知地下党掌握的地方武装——三张民团配合。声讨行动中，有群众和学生遭到乐育小学校长刘铭初的谩骂和殴打，愤怒的群众打死了刘铭初及其帮凶。宣化事件后，渭南的革命活动遭到疯狂镇压，先后有40多人被

捕。

3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今渭南市临渭区故市镇）、华阴、临潼5县为陕东暴动区，积极策划组织武装起义。省委成立了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简称陕东特委），由省委常委刘继曾任书记，渭南县委书记肖明为组织委员，团省委宣传部部长李昌英为宣传委员，并增派一些不便在西安工作的人员，到渭华地区加强工作。4月上旬，中共陕东特委从华县、渭南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秘密前往洛南许权中旅学习军事。月底，许旅党委派营长、共产党员李大德率领经过培训的人员，回到中共陕东特委驻地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三教堂。陕东特委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陕东赤卫队，移驻渭南塔山，构筑工事，作为军事据点和基地。

这时候，爆发了陕西军阀李虎臣反对冯玉祥的战争，削弱了军阀在陕西的统治。陕东特委和渭南县委决定，5月1日在渭南崇凝镇举行暴动大会。当日，渭南东塬数千名农民和学生手拿武器和小旗，聚集在崇凝镇街南大庙戏台前举行大会。会上，公开杀了两名恶差。由渭南县委书记肖明宣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并处死了县催粮委员，捣毁了大恶绅杨鹏霄和东南区长李玉兰的商号。受崇凝区苏维埃成立的鼓舞，渭南赤水、阳郭、三张、沈河川，华县高塘等地先后举行暴动大会，短短一个多月，渭南、华县的塬区，国民党政权相继覆灭，成为革命群众的天下。

为配合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权中旅不去潼关参加李虎臣部与冯



淮海战役重要组成部分——壶梯山战役旧址



玉祥部的混战。但许旅党委讨论省委指示时产生分歧，多数领导主张部队开赴渭华参加农民暴动，许权中则主张先攻占潼关，然后利用军阀混战再到渭华参加农民暴动。于是，决定由雷天祥、许维善率教导营一部去渭华配合农民武装开展斗争，其余部队于5月7日离开洛南开赴潼关参加反冯战争。5月10日，李部在潼关被冯玉祥部击败。当晚，唐澍、刘志丹未告知旅长许权中和杨晓初，即率一部撤出战斗，向渭华地区进发。许、杨发现部队撤离后，立即向渭华赶来。部队抵达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瓜坡镇，宣布起义，摘去国民党军队的帽徽，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在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地方党组织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会上宣布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任参谋长，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军总顾问，杨晓初任军财政经济委员。军下辖4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即警卫队）和一个骑兵分队。工农革命军和当地农民运动相配合，在渭华一带形成了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

渭华起义使驻守陕西的军阀十分震惊，他们开始组织反动力量进行疯狂围剿。6月上旬，渭南县保安团倾巢出动，进攻塔山，受到陕东赤卫队英勇阻击，加上高塘援军及时支援，保安团伤亡惨重。10日，田金凯骑兵师又从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出发，向高塘工农革命军司令部进攻，遭到工农革命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仓皇逃回县城。两次反围剿获胜后，刘志丹主持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军委扩大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决定把部队撤往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后，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向省委汇报。果然，工农革命军还没来得及行动，19日，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就亲率魏凤楼、孙连仲、田金凯三个师，在地方民团的引领下，分东、中、西三路，向高塘、塔山进攻。工农革命军军委及时调整部署，准备把部队撤入南山，以保存革命力量。并由马子敬所部和丰原里18村苏维埃赤卫队在桥峪口阻击东路田金凯师，掩护主力撤退；许权中、雷天祥、李大德指挥第四大队、骑兵分队和陕东赤卫队，在塔山阻击西路之敌；刘志丹、唐澍指挥主力部队阻击中路宋哲元带领的部队。经过近两天的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工农革命军孤军无援，不得不向南山撤退。25日，唐澍、刘志丹率领的大部退至洛南县两岔河、保安一带。许权中、杨晓初率领的一部退到蓝田县许庙一带，与蓝田县委掌握的沙王村自卫团合编隐蔽。

7月1日，军阀李虎臣的5个残旅在地方民团配合下，围攻驻保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唐澍在救援战斗中英勇牺牲，李大德被俘后也壮烈就义。这时候，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的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回到两岔河，任工农革命军党代

表。刘继曾、刘志丹和许权中、杨晓初分别率部会合于蓝田县的张家坪。刘继曾召集会议，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的组织隐蔽起来；停止开展苏维埃运动；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暂归李虎臣部刘文伯师。后许权中率部归刘文伯师，任旅长。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渭华起义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总结经验教训，成功地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渭华一带燃起的革命火种也从来都没有熄灭过！经过渭华起义锻炼的许多干部，在以后的长期革命实践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2. 智取华山

华山解放前夕，渭南境内发生了澄合战役、荔北战役、永丰战役三次大的战役，为渭南全境解放奠定了基础。

澄（城）合（阳）战役是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歼灭胡宗南整编第三十六师的战役。1948年8月8日，澄合战役打响。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第一、四



华岳仙掌

纵队及警备旅在歼灭敌外围据点守军后，向澄城冯原镇整编第一二三旅发起攻击，第三、六纵队向冯原镇以东地区的整编一六五旅发起攻击，第二纵队在第一纵队一部配合下，向冯原镇东北的壶梯山发动攻击。经过五天激烈战斗，解放军消灭了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大部，毙伤俘国民党军9079名，粉碎了胡宗南企图封锁西北野战军于黄龙山区的计划，收复了澄城、合阳、韩城三县城。

澄合战役结束后，胡宗南为防御解放军南下，在以大荔、蒲城为中心的地区，部署了7个多军的兵力，并亲赴大荔指挥作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澄城赵庄野战军司令部召开前委扩大会，研究荔北战役作战方案，确定总的指导思想为“突击分割，各个围歼”。10月6日，解放军发起攻击，荔北战役打响第一枪。在10天时间，经过多次大规模反复拉锯战，西北野战军共歼胡部第十七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及地方武装总计25300人，争取地方武装起义1100人，解放军亦伤亡9119人。

荔北战役之后，西北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白水、澄城、合阳以北地区进行整



训。11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向胡宗南部队发起冬季攻势。彭德怀将西北野战军分成左右两个兵团，以第一、四纵队及警备旅、骑兵第二旅等组成右翼兵团，向铜川、耀县地区进攻；以第二、三、六纵队组成左翼兵团，隐蔽集结于洛河两侧，准备歼击回援之敌。25日，胡部第七十六军进至蒲城永丰镇及洛河以西的石羊地区。西北野战军第二、三纵队果断发起攻击。经过四天激烈战斗，第七十六军被全歼，总计歼敌25000余人。永丰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胡宗南所谓“重点的机动防御”新战术，巩固了澄城、合阳、白水地区。

1949年3月，渭南渭河以北各县相继解放。大荔解放前夕，驻大荔县城的国民党陕西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和第八保安区司令部南逃到华阴县城。第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韩子佩以华阴、华县为据点，招兵买马，成立陕西保安第六旅，自任旅长。5月20日，西安解放，韩子佩深感情况不妙，率保六旅旅部及特务营100余人，逃进华山。随即强行控制山上各处庙宇及储存物资，并将大部分道士和道姑赶下山，加强了各险要路段的工事设施，企图凭借华山的险要，负隅顽抗。

解放军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党委和军事会议经过分析认为，对付华山守军，不能强攻，只能另辟蹊径。6月1日，总队侦察参谋刘吉尧奉命率领侦察班一行10人，来到皇甫峪口，向村民了解情况。有人反映，峪内沟壑两岔口王银生的父亲曾从皇甫峪上华山采过药，可能知道上山路。4日，侦察班进山，沿羊肠小道行进十几里路，找到王银生家。王家住在靠大石崖搭的一间茅草房内，祖祖辈辈居住山中，可耕地极少，主要靠采药打柴维持生活。王银生自小上山打柴、采药，练就一身攀崖登山的绝技，当地人称“爬山虎”。只是前几年他的父亲上山采药坠崖身亡，母亲再也不敢让他上山采药。

侦察员自己割草砍树，在王家茅草屋旁搭了间草房住下来。他们白天帮王家打柴、锄地，晚上和王家老小拉家常，讲解放区农民翻身当家作主的新鲜事，讲只有肃清华山兵匪才能过上好日子。王银生渐渐地转变了思想，表示愿意为侦察员上山带路，可她的母亲就是不松口。7日下午，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傍晚时分，狂风卷走了王家的茅草房屋顶。刘吉尧二话没说，立即带领侦察员帮王家冒雨抢修房屋，柴草不够，侦察员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被单搭上王家屋顶。抢修完毕，战士们个个浑身湿透，大家围坐在大石下烤火取暖。看到侦察员奋不顾身的举动，王银生的母亲深受感动，终于答应让儿子给侦察员上山带路。

9日，路东总队政委王生荣、二营营长何信德来到两岔口，要求侦察班做好上山侦察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为配合侦察分队的行动，路东总队部署2营4连严守

黄甫峪口和猩猩沟，随时准备接应；1营2连和机炮排从北峰正面占领莎萝坪，佯攻青柯坪，吸引守军的注意力。13日清晨，刘吉尧（队长）、王银生（向导）、孟俊甫、路德才、杨建东、杨党成、崔朝山、张自发8人组成的侦察分队奉命出发。

侦察分队进入猩猩沟，穿过2公里的柏树林，开始攀登5道险关。第一关叫“天井”，是一个高90厘米的石洞，直上直下，壁上布满绿苔，还有溪水滴落，仅有一些凸出的石尖可供利用；第二关叫“飞云峡”，峡宽十余米，向下是深不见底的深谷，仅有一根木头架在两边的树干上；第三关叫“吊石板”，形似天井，只是比天井稍低一点；第四关叫“青龙背”，陡立的石坡，黑黑的像条龙背，坡上仅有能容下脚尖的小石孔；第五关叫“老虎口”，是一道十多米长的横槽，高不过一米，犹如张开的老虎嘴，向下是几十米的深谷。侦察分队在王银生的引领下，历尽艰难险阻，攀过五道险关，在天黑前，来到华山北峰之下。侦察分队经过分析研究，觉得在如此艰险的山间小道上，大部队根本无法行动，只能智取。

14日凌晨1时前后，刘吉尧率领侦察分队，开始向北峰移动。越过鹿砦，乘守军哨兵换岗之机，冲进大庙，高喊：“解放军到了，缴枪不杀！1排向里冲！2排向岭上冲！3排跟我来！”庙内20多名敌兵从睡梦中惊醒，乱作一团。敌排长企图顽抗，被路德才一枪击毙，其他人纷纷投降。侦察分队用二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顺利占领北峰。天亮后，侦察分队又乘胜出击，先后控制了百尺峡、千尺幢，占领了苍龙岭、金锁关。15日，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北峰，并相继占领其它山峰，仅剩西峰由韩子佩控制。这时候，韩子佩与逃往汉中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及胡宗南部的电台联络也已中断。迫于无奈，19日韩子佩部缴械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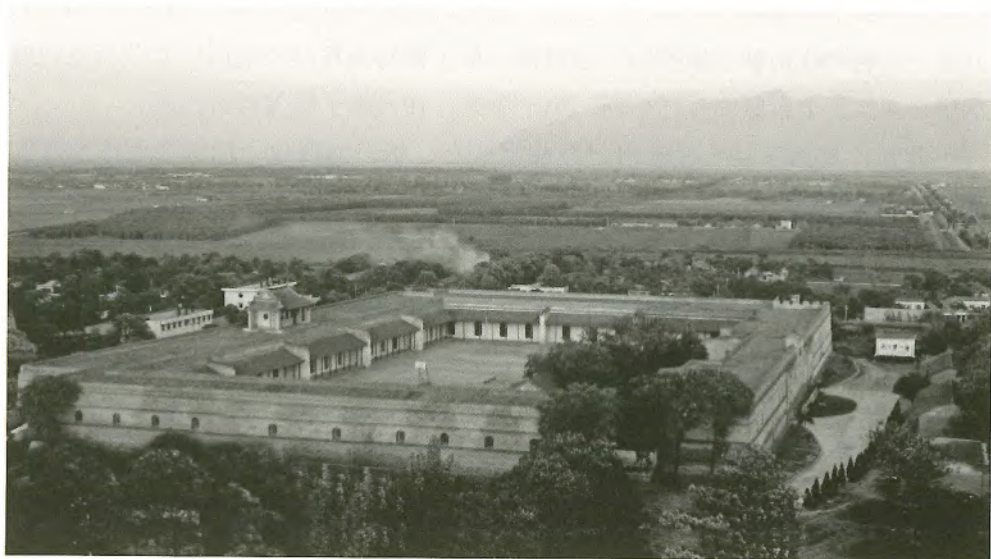
此前，渭南各县人民政府已经相继成立。华山的解放，标志着渭南彻底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五、文物古迹

1. 古代建筑

渭南是陕西古代建筑遗存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历来为建筑界、史学界所重视。类型大致有建筑遗址、塔刹、单体木构建筑、组群木构建筑和青石建筑，其中建筑遗址数目众多，时间跨度长。如韩城、华阴等地的魏长城遗址、韩城芝川的少梁城和汉扶荔宫遗址、华阴的阴晋城和京师仓遗址、潼关的十二连城遗址、渭南崇凝的大型秦代宫殿遗址、大荔朝邑的长春宫遗址等，这些遗址在当时都是雄伟壮观的重要建筑。

隋唐以后，佛教盛行，渭南境内寺院塔刹林立。全市现存古塔35座。这些古塔的构造有实心密檐式塔、空心楼阁式塔。建筑用材有砖木结构、砖石结构两种形式。塔的外形以方形最多，也有六角、八角，个别的是十二角和圆形。从用途上分，绝大多数为佛教寺院遗留下来的舍利塔，其次是镇风压水的风水塔，也



丰图义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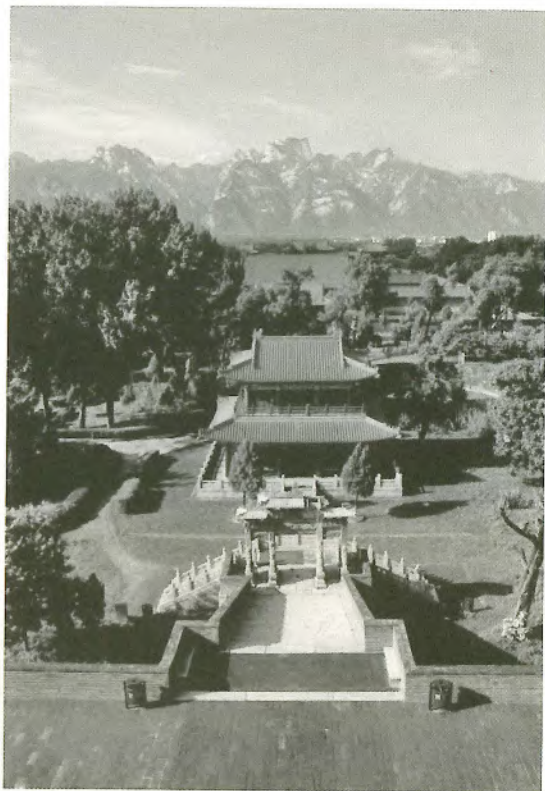


岱祠岑楼

有少数点缀河山的风景塔，这些塔的历史涵盖唐朝到民国的千余年时光，其中唐9座，五代1座，宋代3座，金代3座，明代4座，清代14座，民国1座。唐贞观元年（627）修建的蒲城慧彻寺塔（俗称南寺唐塔）为现存最早的塔式建筑，此塔为方形密檐式砖塔，共11级，高36米，基层平面9平方米。塔体砖缝不见石灰，相传用糯米汁灌缝。塔的一层南面开有券洞，洞内供一佛像，是唐代石佛；二层北面墙壁中嵌一石碑，刻有“诸佛舍利宝塔”6个字。从第二层起，每层四面均仿照木构建筑，隐现出三间方柱、斗拱，上承横梁叠涩出檐，间一至二层菱角牙子，分别用方砖和条砖砌成。一、二、三层叠涩出檐多至15层，四层以上渐次减少。自二层至六层，每层均有对开券洞望窗一对，在方位上，各层相互错开，除第三层外，各层券洞望窗两边均饰有横条格窗棂。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古塔之外，还有大量木构、青石建筑。其中既有粗犷简练的元代建筑，又有古朴雄浑、严谨烦琐的明代建筑。比较有名的有合阳的福山建筑群、王村青石殿，道教重地华山玉泉院，大荔朝邑的岱祠楼、丰图义仓，韩城的司马迁祠，白水的仓颉庙，蒲城的清代考院，合阳、韩城、澄城的文庙等，这些建筑有的斗拱飞檐，雕梁画栋，琉璃屋面，光彩生辉，古朴典雅，雄伟壮观；有的青石构筑，浮雕人物故事，线刻禽兽花鸟，构思巧妙，秀丽多姿，引人入胜；有的依地形组合，曲径通幽，环境优美，使人流连忘返。有的还有很高的建筑学研究价值。比如被誉为“陕西故宫”的华山西岳庙建筑群、韩城党家村的民居建筑群。

西岳庙位于华阴市城区岳庙办。西汉元光初年建于黄埔峪口，称集灵宫，



西岳庙

东汉桓帝刘志时迁今址，更名西岳庙，是历代帝王祭祀西岳华山的场所。现存建筑为明代以后的建筑。西岳庙坐北向南，面对华山，四周有围城，主要建筑依南北中轴线对称布局，集中在城内。南门为正门，又称灊灵门，有3个门洞，门额书“敕修西岳庙”，正前方14米处是一座30米长的九龙壁。穿过灊灵门，进入瓮城，正北距灊灵门20米处是第二道大门，又称午门，也叫五凤楼，是一组砖石和木结构建筑。穿过午门向北，是西岳庙的第三道门，也叫棣星门，整体是一座每间由4根石柱支撑的七楼八柱形牌楼。棣星门向北是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天威咫尺”石碑坊，其结构为四柱三开间五楼式，以石梁、石柱、石枋组合而成，人物、禽兽、花草遍布其上，艺术价值独特。“天威咫尺”石碑坊向北是西岳庙的第四道大门，也叫金城门，是一座单檐歇山顶式的正殿门，上书“金城门”3个鎏金大字，为清代所建。过金城门是金水桥，又叫望仙桥，为石拱三孔，上有石栏杆，雕有珍禽异兽和花卉草木，属明代建筑。金水桥以北的灊灵殿是举行祭祀活动的正殿，建在用石条砌成的方台上，台前立有“华山全图”和“西岳全图”石碑，御道上雕刻有“二龙戏

双桥大街石碑坊



双桥大街石碑坊

珠”图案，大殿为单檐歇山顶式木结构建筑。殿两侧有对称的歇山顶重檐御牌楼和攒尖顶八角亭。灏灵殿向北是寝宫和司房，寝宫外有御花园，园内有吕祖台、望华亭、石碑坊、放生池等，其中御书房内的乾隆手书“岳莲灵澍”卧碑为陕西罕见。西岳庙最北是万寿阁，与北城墙连为一体，为高台楼阁，最上层房檐下有“万寿阁”匾额，阁楼东西两侧各有藏经楼1座，并内置木楼，装有机关，可以旋转，故又称“转藏楼”，万寿阁与二楼以架空的飞廊相通。登万寿阁可以南望巍巍华山，北赏黄、渭、洛三河交汇壮景，所以又称其为“望河楼”。万寿阁原建筑1932年已毁，现为近年仿建。西岳庙内碑碣众多，现存的就有北周、唐、宋、明、清等名碑200余通。西岳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党家村民居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北方典型传统民居村落，被誉为“人类居住的活化石”。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现存建筑为明、清两代所建。清咸丰元年（1851）另建寨堡，村寨相通，连为一体。党家村民居以四合院为主体，全村现存四合院共125座。每个四合院占地约260平方米，呈长方形，前有高大的走马门楼，门上正中砖雕大字牌匾，门两侧有石狮、石鼓、石门墩，阶下有拴马桩、上马石。进入大门，迎面有屏风，院内中间是砖铺天井，两侧有厢房，一般为两室。前厅与厅房相对应，前厅用于待客，厅房高大宽敞，有3间的，也有5间的，一般作为祭祖和举办宴会的场所。门厅、厢房、厅房一级高过一级，取连升三级之义。每个院落集石雕、砖雕、木雕为一体，风格古朴、典雅。除四合院建筑外，村中还有宝塔、祠堂、私塾、节孝碑、看家楼、暗道、哨门等建筑，现存祠堂7座，牌坊5座，看家楼3座，宝塔2座。看家楼为砖砌方形3层楼阁



党家村景区管委会 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式，有精美的仿木砖雕，高14.5米，登顶可俯视全村。文星塔在村东南，为六角形楼阁式砖塔，共7层，高37.5米，意在祈求文运兴盛。历史上村民读书之风盛行，明、清两代有5人考取进士、举人，有44人考中秀才。党家村民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渭南的古代建筑其实是古代渭南人民用木材、石头写的一本历史书。它渊源悠久、体系完备。无论是塔刹殿阁，还是民居仓廩，都是古代渭南人民对当时社会生活独特审美体验的集中表现，是渭南人千百年来追求美的见证。

2. 帝王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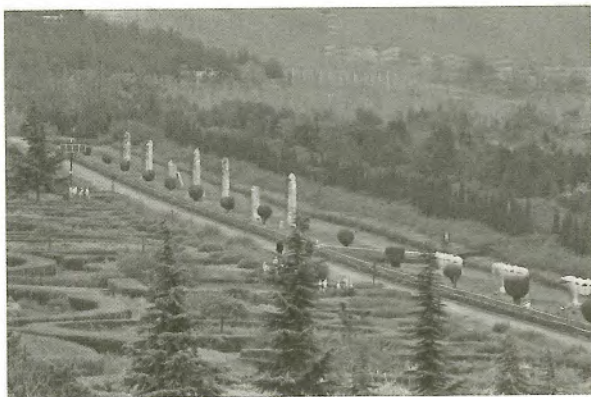
惠陵地宫壁画

渭南的帝陵主要分布在蒲城、富平二县，共15座。分别是西魏文帝永陵、北周文帝成陵、唐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文宗章陵、懿宗简陵和高祖献陵。另外还有死后被追封为帝的唐让帝惠陵，富平刘邦父亲的万年陵，白水的前赵国君刘曜父亲的永恒陵。

这些帝陵平地起冢的有万年陵、永陵、成陵、献陵、惠陵、永恒陵6座，其中西魏文帝永陵最有代表性，永陵位于富平县留古镇何家村东北，是南北朝时期西魏文帝元宝炬与文皇后乙弗氏、悼皇后郁久闾氏的合葬陵墓。北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元修落难入关中，被宇文泰所杀。宇文泰扶元宝炬继帝位，改国号为大统，都长安，史称西魏。元宝炬在位17年，朝政多由宇文泰定夺，郁郁寡欢，大统十七年（551）三月死于长安，谥号文皇帝，葬永陵。文皇后乙弗氏，16岁入宫，大统元年（535）册封为皇后，大统四年废后，出家为尼，大统六年赐死，葬天水麦积山，文帝崩，遗诏合葬永陵。悼皇后郁久闾氏，大统四年册封为皇后，时年14岁，大统六年死于难产，葬少陵原，大统十七年归葬永陵。永陵现高15.4米，周长230米，占地面积6670平方米，地面建筑无存，冢南200米处仅有一石兽，高1.9米，身长1.93米，胸阔0.72米。

渭南的帝陵中，唐帝陵都是按照唐制依山设陵。其陵园广阔，寝宫豪华，特别是唐睿宗、唐玄宗父子的桥陵、泰陵，形制规整，规模宏大，是盛唐帝陵的代表。桥陵是唐睿宗李旦的陵墓，陵墓依山建设，凿山腹为墓室，总面积852.7

万平方米。四面各设门阙，前朱雀门，后玄武门，左青龙门，右白虎门。主要建筑有献殿、阙楼、陵署、下宫等，今已无存，仅剩土阙和围墙遗址。唯有神道两侧的石刻，虽经近1300年的风雨侵蚀，其丰满高大的体形，表情各异的神态，仍不减当年风采。神道长625米，宽110米，两侧石刻由



桥陵石刻

北向南，依次为：石狮1对，高2.8米，位于朱雀门两侧，坐北向南；翁仲10对，身高3.67米至4.28米不等，文臣武将装束，东西对面而立；石马5对，身長2.3米至2.6米，高1.7米至2米，东西对面而立；鸵鸟1对，属浮雕石刻，刻于两米见方的石屏上，羽毛丰满，形象生动，东西对面而立；獬豸1对，身高3米，体形硕壮，怒目露齿，东西对面而立；华表1对，通高8.64米，由座、柱、顶三部分组成，座为方形，柱为八棱形，顶为仰莲承桃，上下均有浮雕。另外，在玄武门、

青龙门、白虎门外，各有石狮1对，玄武门外还有石马3对，可惜已经残损。桥陵合葬的有肃明刘皇后和昭成窦皇后。陪葬墓有贤妃王芳媚、申王李杲、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代国公主、凉国公主、郾国公主、金仙公主和彭国公李思训的墓葬，其中凉国长公主碑、郾国长公主碑、金仙长公主碑的碑



唐惠陵

文均为唐玄宗亲撰，书法家李邕所书。

泰陵位于蒲城县椿林乡金粟山南麓，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陵墓。陵寝布局仿照长安城，分内外城，主要建筑集中在内城。内城东西南北各设一门，依次为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四门之外均有石刻，唯朱雀门外石刻最多。门外两侧有石狮1对，高1.6米，长1.2米，为泰陵石刻精品。神道两侧的石刻由北向南依次为：翁仲10对，身高2.5米，东西对立，文臣持圭，武将拄剑。其中7尊



较完好，其余残损；现存石马6尊，其中东侧5尊，西侧1尊，高1.8米，长1.7米，鬃毛浓密，鞍蹬俱全，另有牵马人3尊，高1.5米，惜头已损坏；鸵鸟1对，刻于石屏上，羽毛丰满，体态生动，高1.45米，宽1.93米；天马1对，高2.4米，长2.1米，造型雄伟高大；华表现存东侧1座，八棱柱身，莲花底座，顶托宝珠，周身线雕缠枝卷叶花纹。白虎门、青龙门各有石狮1对，且门阙遗迹清晰可见。玄武门有石狮、石马各1对，另有牵马人1对，可惜已残损。泰陵的陪葬墓除元献杨皇后祔葬外，仅有内侍监高力士墓，位于椿林乡山西村西门外，呈覆斗形，高5.3米，底部周长70米，墓志铭为唐代著名书法家张少悌所书。

总的来说，渭南的帝王陵墓是集建筑、雕刻、绘画、自然环境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完全符合古时“事死如事生”的帝王陵寝文化理念。帝陵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仿照帝王生前的设置。庄严肃穆，古意盎然，颇能引发人思古之幽情。

3. 碑碣墓志

自古以来，渭南雕石树碑成风。从汉到清的两千余年间，石刻艺术不断发展，日益成熟，留下了许多碑碣墓志，其中不少已被视为珍品，受到了严格的保护。

仓颉庙碑属东汉衙县（治所今白水县史官镇彭衙村）令仇君于汉延熹五年（162）到任后筹资所立之碑。碑身高1.6米，宽0.6米，下部方形，上部锐形并有穿孔。碑文书体为隶书，有文字466个，其中135字已残损，尚有331字清晰可辨，且字形俊美，清秀自然，记述了仓颉造字益于后世的功德。碑阴与碑左右两侧共有文字643个，其中185字已残损，还有458字可以辨识，记载了立碑修庙捐资人姓名与款额。



仓颉庙碑拓片（朱建明提供）

曹全碑属东汉碑，立于汉中平二年（185）。碑身为长方形，高2.72米，宽0.95米。碑文书体为隶书，有20行，每行45字，共840余字，记述了东汉合阳县令曹全的世系、政绩及有关历史事件，既具有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又为汉代隶书碑石中之精品。

广武将军吕口碑属晋代碑，前秦苻坚建元四年（368）立碑。碑身为长方

形，高1.83米，宽0.67米。碑文书体为隶书，有文字498个，其中200字已残损，有298字可以辨识，记述了广武将军的文德武功。碑阴与碑左右两侧共有文字944个，其中239字已残损，有705字可以辨识，记载的是人名及官职。



广武将军碑拓片（朱建明提供）

西岳华山神庙之碑位于华阴市西岳庙内，属南北朝时期石碑，立于北周天和二年（567）。碑首有六螭，碑身为长方形，通高2.35米，宽1.11米，厚0.36米。碑额书“西岳华山神庙之碑”，书体为篆书。碑文书体为隶书，共20行，每行54字，由于瑾撰文，赵文渊书写。碑阴刻有“唐华山精享昭会之碑”，碑左侧有唐代颜真卿的题记，碑右侧有唐代贾竦的诗刻。

杨素墓志属隋代墓志。杨素为隋代开国武将和权臣，曾为隋朝司徒、尚书、太子太师、太尉，隋大业二年（606）以62岁死于豫州，归葬故里弘农华阴。杨素墓志呈方形，边长0.92米。铭文为楷书，共45行，每行34字，因残损，撰书人不详。志盖亦散失。墓志铭记载了杨素的生平经历，对隋史研究有重要价值，为国家一级文物。



李元谅碑

苏孝慈墓志属隋代墓志。苏孝慈先后在北周和隋朝任职，官至隋朝刑部尚书、大将军，隋仁寿二年（602）死于交州，次年二月归葬故里同州莲勺县崇德乡（今蒲城县苏坊镇）。清光绪十四年（1888）夏，雨后地陷，墓志铭出土，现藏于蒲城县博物馆石刻室。墓志为方形，边长0.84米。铭文为楷书，共1296字，记述了苏孝慈的生平经历，撰书人不详。

李元谅墓志属唐代墓志。李元谅官至唐朝尚书左仆射。李元谅墓志一合，呈方形，边长0.9米。盖为覆斗形，篆书“大唐故尚书左仆射赠司空李公墓志铭”16字，四条线刻缠枝纹及十二瑞兽。铭文为楷书，共40行，每行37字，记述了李元谅的生平经历，由上

都尉杜确撰文，孤子平书。

渭南的碑碣墓志还有北魏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唐代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李光弼碑、高力士碑，宋代的宋修西岳金天王庙记碑、元代的蒙汉合文碑、清代的重修西岳庙碑、岳莲灵澍碑，北魏的杨穆墓志，唐代的房陵公主墓志、淮南公主墓志、金仙公主墓志、王贤妃墓志等。大都出自名人之手，同样颇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4. 博物馆纪念馆

渭南市的博物馆、纪念馆除澄城县博物馆属新建外，其他多数依托原有的文庙、旧址等，加以修葺、改建，基本保持了原有文化遗产的风貌。



清代考院

渭南市博物馆：位于临渭区乐天大街。占地90亩，总建筑面积35940平方米。主体建筑共分四层，其中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基本陈列《与华相宜——渭南故事》分为八个单元：物华天宝——渭南的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远古寻根——史前时期的渭南；先秦记忆——夏商周时期的渭南；京畿重地——秦汉时期的渭南；龙兴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渭南；国脉所在——隋唐时期的渭南；俗风和雅——宋元明清时期的渭南；烽火秦东——近现代的渭南。各单元下设小节。每个单元以时代为背景，选择著名人物、代表性事件、重大成就作为“点”，以“点”串“线”、以“线”构“面”，突出各个时代文化特点。

韩城市博物馆：位于金城区韩城文庙内。馆内有展室6个，面积1400平方

五、文物古迹

米，收藏有化石、石器、骨器、铁器、砖、瓦、石刻、木雕、织绣、书、画、拓本、钱币等各类文物4135件。所收藏展出的文物以新石器时代较多，其中有古籍善本经、史、子、集4种共7200余册，有古钱币2.6万枚，有陶楼、釉陶孔雀灯等陶器，有沈周、张泽、于右任等历代名家的字画，有清乾隆、嘉庆两朝皇帝赐军机大臣王杰的御书华匾，有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左冯太守李水部黄河清记》、王杰书《重修龙门学署记》和万文治、林则徐等名人书法石刻，还有元代大型艺术根雕等。

蒲城县博物馆：位于蒲城文庙内。馆内有展室4个，面积1450平方米，馆藏文物有2254件组。文庙大成殿展室内陈列有古代名人牌匾，其中有清道光皇帝和林则徐等人为军机大臣王鼎母亲书写的寿匾，有明代大书法家王进德书写的巨型牌匾“城隍庙”匾等。中院两边厢房为修葺后的明代古建筑厦房，分别为出土文物展室和书画展室，陈列展出的文物有新石器时代先民用过的石斧、石锄、骨针、彩陶片、纺轮和近现代名人字画等。明伦堂内外为石刻展室，现存碑石共200余通，其中不少碑石，如苏孝慈墓志、金仙公主墓志等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澄城县博物馆

澄城县博物馆：位于澄城县城东九路古徵公园东侧，总面积6600平方米，其中陈列大厅建筑面积2507平方米。现有藏品3000余件，其中历史文物2030件。馆藏文物有金银器、玉器、铜锡器、铁器、古钱币、石器（含碑刻）、陶器、瓷器、古字画等，设有古代文明厅、陶瓷艺术厅、雕刻艺术厅、民俗工艺厅、当代发展与规划厅5个展厅。全部馆藏中，石雕拴马桩、尧头陶瓷为最有地域特色的群集性文物。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藏品为金代大铁钟、秦汉时期的壁纹空心砖、汉代铸钱铜范和“宫”“与天无极”“千秋万岁”及各种云纹图饰的瓦当。

清代考院博物馆：位于蒲城县东槐院巷内，面积6200平方米。考院始建



于明代，明万历年间县署西边建有考棚，供华州考生参加院试。清光绪十七年（1891）蒲城知县筹资建考院，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动工修建，历时一年建成。考院坐北向南，依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有大门厅、二门、甬道、东西号舍、论秀堂、东西厢房、内堂等。考院内既有文考场，也有武考场，还有考生考前沐浴换衣和考官阅卷、议事的场所，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清代考院。考院大门外两侧砖墙上刻有“金鸡报晓”“凤凰展翅”“猿猴攀枝”“老鼠拉葡萄”等浮雕图案，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亦别具一格。

王鼎纪念馆：位于蒲城县达仁巷王鼎故居内，面积1063平方米，有房屋10余间。大门两侧的楹联为“血浓于水，道光愤庸失王土，丧主权，青史悲鸣文死谏；叶系于根，共和鼎盛雪国耻，圆缺镜，香港回归告忠魂”。二门正中高悬“王鼎纪念馆”黑底金字匾牌，由陕西省原省长程安东题字。门内正中有王鼎半身塑像，高3.6米，呈古铜色。塑像头戴一品花翎顶戴，身着朝服，挂朝珠，右手压案，左臂背后，双眉紧皱，目注前方。馆内中厅有王鼎生平事迹展览，上房内陈列有王鼎家谱、书信遗稿、遗物和道光皇帝书赐王鼎寿匾“靖共笃祜”，以及林则徐在蒲城期间所书“味兰书屋”等诸多墨宝。



王鼎纪念馆

渭华起义纪念馆：位于华州区高塘镇高塘中学西侧，由渭华起义旧址和渭华起义烈士纪念塔两部分组成。旧址总面积8757平方米，共有6个展室，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1928年5月，渭华起义的指挥部工农革命军司令部驻扎于此。纪念馆坐北向南，建于高台之上，门内西侧为工农革命军军委扩大会议旧址，正北各展室依次排列。穿过第一展室，有一长方形天井，中间以鹅卵石铺底，用砖

拼砌出长9.1米、宽2.1米的路基标语，内容为“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这是陈述善、李维俊于1927年11月组织学生铺砌而成。纪念馆内共收藏有革命文物128件，革命历史文献资料75件，其中原件32件。纪念塔位于指挥部旧址南100米处的高台上，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1988年4月建成。塔呈方形，共9层，通高29米，塔身高19.28米，正面镌刻着“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10个大字，为中央军委原主席邓小平题词，背面为悼念死难英烈的碑文，塔内有楼梯可盘旋而上至塔顶，塔前有一组英雄群像雕塑和徐向前题词的墨玉石碑。

杨虎城纪念馆：位于蒲城县东槐院巷内，属杨虎城故居。故居建筑始建于1934年，坐北向南，由东、西两个院落组成，东院为正院，西院为花园，是关中典型的四合院式民居宅院。正院面积75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平方米，由南向北依次有门



杨虎城纪念馆

房、大厅、女厅、后楼房等。西院总面积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8平方米，有门房、花园、书房、两侧厦房和后上房等。纪念馆内有大小展厅7个，展出的物品有杨虎城将军用过的桌、椅、床、柜等家具，杨虎城母亲孙老太太60寿辰时蒋介石、邵力子、马鸿逵等名人赠送的寿匾和字画，杨虎城与张学良两位将军互赠互勉的条幅字画，西安事变的纪实图片展览，杨虎城生平事迹展览，以及杨虎城用过的作战兵器等共90多件。

渭南市的博物馆、纪念馆还有位于临渭区的航天测控装备博物馆，合阳县博物馆，潼关古城博物馆，蒲城林则徐纪念馆等，也有一定的规模。

六、民间文化

1. 戏曲



华阴老腔

渭南戏曲历史悠久，剧种剧目繁多。既有古代戏曲，也有现存戏曲。古代戏曲有角抵戏、歌舞戏、参军戏、傩戏、拍弹、唱经、唱道情、唱曲子、大曲、法曲等。现存戏曲有同州梆子、富平阿宫腔、东府碗碗腔、华阴老腔、二华眉户、石羊道情、合阳线腔、跳戏以及渭南、韩城的秧

歌。现存戏曲与古代戏曲有脉承关系，从现存戏曲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戏曲的影子，比如合阳跳戏以吟、跳为主的表演方式就和古代傩舞非常接近。4000多年前，华州区境内的氏族欢兜（丹朱）祭祀神灵时，也是经常脸上涂满红土，一边舞蹈一边吟唱，可能就是渭南歌舞、戏曲的源头。

殷商时，殷王整甲徙居西河（今陕西合阳、韩城、大荔一带），非常想家，遂制作西音化解乡愁。西周时，长公（周昭王右车辛余麋的封号，封为西翟长公，在今陕西洛川东南30里）以西音为基础创制了周音。后来秦穆公采风作秦音（秦声），就是借鉴先贤作西音、周音的成果。



跳戏

雷强民摄

《史记·李斯列传》上说：“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声也。”秦国地域广大，渭

南地方戏曲的形成可能还汲取了《诗经》韩、魏、郑等国乐舞诗词及其它本地民歌小调的营养。汉武帝时，朝廷新设乐府，到处采集民歌小调，歌舞戏盛行，百戏集演盛况空前，京兆、长安（渭南、西安）民众编演的角抵戏《东海黄公》，人物、情节、冲突、结局固定，人多视其为中国戏曲之雏形。汉魏六朝时，秦声乐舞和百戏一直盛演不衰。西汉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今陕西华阴人），遭贬赋闲在家，收养优伶，常常以歌舞音乐排遣幽情，日夜无度。地方长官劝其收敛，恽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汉书·杨敞列传》）。

隋末唐初，战争频仍，民族融合加剧，歌舞戏特别是武舞盛行，华阴军民共创武舞《秦王破阵乐》，其发扬蹈厉、慷慨激昂人称秦王腔。唐玄宗时，弘农华阴一带倡伶大都入教坊、梨园，渭南地区成为唐梨园、教



线戏

雷强民摄

坊艺人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安史之乱后这些人大多回到渭南民间，梨园的宫廷乐曲随之进入民间。到“州有伶，府有戏”的唐宪宗时期，散乐、参军戏、傩戏、拍弹、唱经、唱道情、唱曲子遍及境内各地，大曲、法曲盛行。据考证，境内现存的眉户戏、老腔、碗碗腔和唐大曲、拍弹都有一定的脉承关系。这一时期，境内各州县官衙大都新建“社厅”饮宴观剧，民间则多于天气晴和时在居室的院子外面，用屏风临时隔起一个场子，雇请乐人前来进行歌舞表演，客人们排坐在凳子上饮酒观看。北宋时，勾栏瓦肆遍布，夜市通宵，都市生活开始活跃，同州乐工王钩容、程士守依唐时法曲，为《霓裳谱》谱曲，其所用六么、法曲等和今天秦腔的音乐曲风非常相近。唐宋大曲、舞队、鼓子词、杂戏进一步地方化。元朝时，政治衰微，科举遽废，文人沉入下僚与民间艺人为伍，寄情于戏曲创作，加之元朝蒙古贵族喜好歌舞、戏曲，杂剧大兴，地方戏曲越来越精致。大荔人李仲章擅作杂剧，著有剧作3种，现存《勘头巾》一种。源自秦声的本地剧种得到极大地丰富和提高，形成了不同声腔的剧种，北曲别派的西腔、乱弹，跻身元杂剧

之列。

大约到了明初，同州梆子就形成了一个剧种，明朝中期，渭南的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商业经济繁荣，集市贸易，渡口贸易发达，再加上明代传奇文学发展鼎盛，大批文人涉足剧坛，力图突破明初文网的桎梏，表达对时代的感受，张扬自身个性。渭南传奇剧作家王异、李灌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著名戏曲理论家祁彪佳在《远山堂曲话》中说：“无功（王异）喜传侠女，故红妆中每有技击者”。其作“格善变，词善转”“通本不脱豪侠之气”“洗脂粉之病”。李灌26岁时“累冠诸生、名驰三辅”，其文磊落雄逸，其人任侠、豪爽，终日混迹于民间艺人之中，著述颇丰，总计30余种。晚年李灌与合阳线腔艺人过从甚密，对线腔戏进行了大量改革。所有这些，为以同州梆子为代表的渭南戏曲孕育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末清初同州梆子便初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激越、古朴的艺术风格，成为独立的剧种。



火社

雷强民摄

乾隆后期，同州梆子曲牌音乐、板式日益丰富，音乐的戏剧性不断增强，巧妙地化解了外在的音乐结构与故事戏剧性的矛盾。变得“善于传情”“易入市人耳目”，很快就被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农民及民间艺术家所喜闻乐见。同州梆子名旦

魏长生（魏三）下扬州，进北京，挑起秦腔与昆剧的“花雅之争”，令江南“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称雄剧坛，史称“魏派秦腔”。此后同州梆子声名远播，形成了以同州梆子为代表的梆子声腔剧种体系，进而带动了渭南地区地方小剧种的发展。秦腔、老腔、碗碗腔、阿宫腔、线腔、跳戏、眉户、二华曲子、韩城秧歌、渭华秧歌、石羊道情等地方小剧种大都完善、兴盛于此。戏曲剧本创作也随之活跃，著名者有：渭南县（今临渭区）剧作家李芳桂，人称李十三。所著“十大本”：《春秋配》《白玉钿》《香莲佩》《紫霞宫》《如意簪》《玉燕钗》《万福莲》《火焰驹》，折戏《四岔捎书》《玄玄锄谷》。情节传奇，结

构严谨，语言典雅诙谐。嘉庆时秦腔艺人姚翠官在京演出其代表作《春秋配》，倾倒京师观众。清中叶传奇作家蒲城人崔问余，曾任翰林院编修，诗词书皆精，幼时曾与单氏女指婚，及长彼此爱慕，但崔家破落，单家悔婚，单女赠崔碧玉钗明志，被逼出嫁时，单女缢亡于另嫁的花轿内，崔闻噩耗，悲不自禁，遂作《碧玉钗传奇》以作纪念。剧本词曲绝妙、感情充沛，读之使人涕下。此时其它剧种也积累了丰富的剧本，包括阿宫腔、老腔各百余，线腔的“十二龙”“二十二鸳鸯”“二十四传”等五百余本，总计达三四千本。内容上自先秦、下至清代，包含政治军事斗争、宫廷遗事、民间故事、大案奇闻、人情风俗、才子佳人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慷慨激昂的同州梆子、典雅委婉的阿宫腔、清丽缠绵的碗碗腔、悲壮奔放的线腔、活泼明快的眉户、通俗风趣的道情、载歌载舞的秧歌、粗犷古朴的跳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对台戏”“并台戏”“对并台”“跑台戏”“风搅雪”演出形式丰富而多样。

清末民初，清廷覆灭，民国建立，灾荒不断，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传统的以写意为主的表演风格受到挑战，境内惯演传统戏的农村自乐班与类似戏曲班社，受到冲击纷纷解散，艺人社会地位极低，民间谚语打趣艺人说他们“住的祠堂庙院，吃的清汤胡涮，穿的补丁吊线，撵戏两腿跑断，迟了挨打受弹。”20世纪30年代红极一时的“盖陕西”白长命饿死寒窑，名净王赖赖久蛰不出。戏楼有的让乞丐流民占据，有的被军队拆毁修建炮楼地堡，传统地方戏曲濒于灭亡。此时，蒲城的李同轩、富平的高培支、华县的白瑞生宣传民主思想，倡导戏曲改革。随后，宣传民主思想的时装戏、文明戏增多，“强聒社”“秦义社”“维新社”“竞化社”“马当剧团”等剧团班社相继建立，秦腔一度繁荣，艺人辈出。秧歌、眉户等地方小戏因其适应时俗，一度中兴。渭华起义后，大荔地下党领导“哀鸿剧社”排演宣传马列思想的剧目《翠英之死》，好评如潮。国共合作抗日后，蒲城、白水、韩城、富平抗日宣传如火如荼，境内抗战剧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戏获得新生，戏曲改革大潮涌动，现代题材的新剧目纷纷走上舞台。1953年改编自眉户《婚姻要自主》的秦腔现代剧《梁秋燕》首演，引起轰动效应，年轻人戏言“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1956年，反映新型农民爱社如家的秦腔现代剧《母女俩》首演。1958年，秦腔电影《火焰驹》上映，发行全国。1964年，古装剧、传统剧停演。强调戏剧创作为政治服务，阶级斗争为纲、农业学大寨的题材占领舞台。此后，“革命样板戏”一枝独秀，百花凋零。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风起云涌，阿宫腔《三姑娘》《四季歌》眉户剧《杏花村》陆续上演，对农村经济改革进行了热情讴歌。80年代中期，文



坛兴起“寻根文学”，剧作家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用现代意识审视历史、再现历史，对历史题材剧目进行改编。秦腔《王鼎尸谏林则徐》《千古一帝》《焚佛记》《金石魂》是渭南这一时期的优秀剧目。

90年代初至今，文化多元，渭南的地方戏曲受到一定影响。但戏曲工作者仍创作了不少精品，如眉户剧《五味什字》、秦腔《涝池岸边》《关中往事》等。特别是文化体制改革中“一元剧场”深受观众喜爱。2018年，渭南市临渭区推进“戏曲进校园”活动，剧目有秦腔、碗碗腔等。

2. 方言

渭南方言属北方话关中方言区中的“东府话”。全市11县（市、区）的语音体系、词汇构成及语法特点，同东府话的其他主要地点方言——如西安话、铜川话、商州话基本一致，只有部分差异。由于周边方言的影响，行政隶属关系多变，人口迁徙频繁，渭南方言文白异读普遍，特殊读音较多，随着时代的演进，日益向关中方言的代表西安话靠近。

渭南方言除具备东府话的共同特点外，在语音方面有3个突出特色：

其一，普遍存在尖团音的区别，但各县区别程度不一。

其二，约半数地点保留pf、pf'、f系列读音，即俗称之“飞音”。

其三，在较大范围内存在极为独特的系列读音，如韩城、白水、澄城3市县流行的z l，以及局部地域如蒲城县内一些村镇流行的张、昌与刚、康同音现象。

方言与民俗密不可分。在渭南话中，以婚育类方言中反映的民俗事象最多，其次为饮食。现简记如下：

（1）婚育类

换馄饨与吃馄饨。前者所称“馄饨”并非通用意义，而是澄城县一带对造型馍的别称。新婚之日，男女双方互换，成为结婚仪式的一部分。通常男方送给女方的是鸡形馍，寓意为鸡鸣即起，勤于耕织；而女方送给男方的是虎形馍，希望丈夫虎虎生气。后者所称馄饨才是真正的馄饨。在渭北地带，凡男子到女家相亲时，必吃一顿馄饨，故在有的地方把“吃了馄饨没有”作为是否订婚的代用语。

色囚子。这是旧时对妇女极度鄙视的劣俗，流行于韩城、澄城一带。囚子，指媳妇，旧时视媳妇为囚犯，入门之后不得随意外出，即是娘家送亲离别

时，新娘送别亦不得超过水眼（即滴檐处）。因此称订婚为订囚子，娶妇为色囚子。

燎媳妇。旧时流行于富平、潼关、蒲城一带。新婚前夜，先由新郎同辈男青年在新房中嬉闹一夜，名曰烘房。次日新娘花轿到娘家时，又用火把在轿内外烘烤一遍。新娘坐轿到婆家时，先用石灰撒轿一周，继以火把、烧红的铁钎、鞭炮绕轿一周，而后在大门内置一火堆，由新娘从火上跳过方可入洞房。此习为歧视妇女陋俗，但也包含驱除病邪的愿望。

拉花童。旧时婚事仪式中的一种职事，由新郎之弟或亲戚中的男童担任。其职责是手持系有12条红布络的荆棘，于花轿进村前出村迎候并将其导引入新郎家门。流行于韩城、合阳一带。

戴头条。头条为镶嵌有九只银鸡或铜鸡的条形头饰，成亲时佩戴于新娘头上，以求吉利。旧时流行于澄城一带。

拍扫帚。以红头绳将两颗石榴系于一把新笤帚上，于新婚之夜由男傧相对坐在洞房炕头上的新郎新娘，边拍扫帚边念诵儿歌，大意为：“拍拍拍，掸掸掸，乡亲听我把歌念。红头绳，绿手帕，明年生个胖娃娃。扎扎角，红头绳，满院跑得噎噎噎。拍一拍，生一百；掸一掸，生一万。不拍咧，不掸咧，生了两个就算咧。”此俗至今仍流行于澄城一带。

送角子。“角子”是一种带馅的馍，为“脚止”的谐音。妇女临产前20日，由其母自娘家送去角子数十个，为劝止女儿走动，以保产前安全之意。此习流行于韩城、合阳一带。

转场。祝贺新生儿满月的一项喜庆活动，流行于华阴、潼关等地。于婴儿满月后次日，由祖父母抱往麦场转一圈，而后去学校转一圈再回家，意为带其见世面，长见识，以祈长大后事业有成。

扎牙馍。新生儿转场后母亲抱回娘家小住，返回时由外婆缚一串扎牙馍挂在婴儿脖子上，祝愿他早长牙齿。此种扎牙由动植物造型的小馍串成，下坠长命锁。

（2）饮食类

大刀面。渭南市食品以面食为主，故重视面条制作，不惜费时费力。大刀面指将揉好的硬面擀成薄片后，用重达10余公斤的大刀切成面条，故名。流行于华阴、潼关一带。

橡头馍。蒲城一带的传统食品，一说因揉制成形前须用橡（杠子）挤压八



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转席

吃汤水。蒲城农村“吃席”的代称。旧时当地举办宴会时，菜肴以汤为主，且用碗盛，故称席面为汤水，现已逐步改为以炒菜为主，但称呼仍沿用旧习。

老碗会。旧时因农民生活水平低，饮食少菜，每日三餐均将饭碗端至门外，冬晒太阳夏乘凉，众户聚食闲聊，故名老碗会。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后，渐废此习，改为围桌吃饭。



煮面

雷强民摄



辣子豆腐



潼关肉夹馍

(3) 其他

烘庄子。庄子即住宅。新居落成后，主人必设宴庆贺，并燃放鞭炮，谓之

烘庄子。流行于临渭区一带。

会和集。古代渭南市有集市专门从事贸易。明清时，庙会渐次演变为商业性集会，并由寺庙移至村镇。此后会与集并存：前者每年举行一次，规模大，交易物品多，是当代物资交流会的前身。后者规模小，从事专门经营，如粮食集、牲口集等，各镇每月固定数日为集。各地现通常将集、会混同，多数地方称赶集为上会，澄城称跟会，富平则称赶庙。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便捷，人员交流范围扩大，特别是以电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对百姓日常生活影响深入，学校推广普通话教学因素，都促进了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其特点是：文白异读逐渐被文读取代，特殊读音大量消失，甚至出现了小孩听不懂老人方音的情况。年轻人多外出讲普通话，回家讲方言，但这种方言是向“东府话”共性靠拢的语音。语音方面最突出的是逐渐放弃了某些常用字的旧读音，而向普通话靠拢。

在词语方面最突出的是逐渐抛弃了以声调区别人称指代单、复数的语言习惯，对复数加“们”。有这么一个笑话，反映出这种变化。

某村民甲之子由部队退伍，满口“醋溜”普通话，甲甚不悦。一日，路遇村民乙，于是有如下一段对话：

乙：老哥！听说咱娃打队伍上回来咧？

甲：可不是咧。

乙：可有长进？

甲：长进大的太！学会了三个“们”。

乙：哪三个门？

甲：（普通话声调）我们、你们、他们。

3. 习俗

渭南的文明史与中华民族同步，长期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自己特定的生活空间里，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民俗风尚，以及众多的民俗事象。风俗民情是渭南的性格、渭南的特殊标志。其内容泱泱，大致有礼仪、祭祀、民风、赛社行会等内容。

礼仪风俗集中体现在生儿育女、婚丧嫁娶及年复一年的四时八节。

农业文明时，人们把生育看得很神圣。那时，新媳妇刚怀娃，亲戚就会送来“棉花娃”“果子包”“抱肚酒”“面龙”“石子馍”等，媳妇抱着“棉花娃”，打开“果子包”，喝着“抱肚酒”，吃着“面龙”和娘家送来的“石子



花馍

馍”，遐想着娃的样子，幸福无比。娃满月时，亲戚一般要送插花馍、五彩衣、虎头帽、莲花灯、包袱、披风、花布等，做满月席的当天，外婆家女眷还要给娃挂长命锁，戴项圈。

亲戚邻居还要戏耍家中

长辈。此后，外婆家每年要给娃送曲莲，送红灯，送“嘴巴”馍，一直到娃12岁。娃12岁时，要给娃举行完灯礼，做席面，送老虎馍，把圆灯换成四方灯，有些县还送文房四宝或闺房女红。这些礼仪，寄托着人类为自身繁衍，为家族发展壮大的良好愿望。

婚丧嫁娶，在民间叫过红白事。旧时，婚礼丧礼的仪式都很烦琐。一般有议婚、订婚、迎娶等程序，大都沿袭古代“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等婚制。结婚男方叫迎亲、迎娶，俗称“娶媳妇”（澄城县称“色媳妇”，富平县称“撩媳妇”，华阴市称“过缘喜”），女方叫嫁女或出嫁，俗称“发落娃”或“打发娃”。民国以前，结婚年龄一般在十六七岁。因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等原因，富家多系婿小妇大，且早婚；家贫者多系婿大妇小，且迟婚。结婚前由男方择吉日良辰，邀当地有名望人士，将新媳妇上、下轿时辰和沿途忌讳、礼仪程序等书于红笺，交媒人送往女家。女家应允后，双方各自备办婚用。婚前数日，亲友给待出嫁女子送首饰、衣物，称为“添箱”；给男家送首饰、衣物，称为“行礼”。男家将所备办婚用之首饰、彩礼及其他物品托媒人送至女家，谓之“送礼”，有的婚前三天送，称为“下三天帖”。在华阴市，舅家、姨家等近亲还宴请新女婿，称为“洗花道”。在大荔县，新女婿结婚前一天要去外婆家吃“戴花面”（细长面条），外婆家给外甥赠“腔花”一对，以示吉利，也有百年和好的意思。有的地方婚男婚女要各自上坟祭祖，男方给女方送肉、酒、鞭炮、香表等。结婚日清晨，女方聘请女中尊长为新娘开脸（用瓷碗片除去额头和颈部汗毛）、上头（盘发）；男方在堂屋供奉祖先牌位后，按所择吉日，请傧相骑马引花轿偕媒人、鼓乐至女家迎亲。轿内坐十二三岁小孩一个，由新郎的小弟弟或兄弟姐妹的小孩充任，称之为“垂轿的”或“压轿的”。有的还有迎新娘子的（由“全命”姑嫂充任）。大荔、蒲城一带有的还

给轿内放鸡、书或宝剑，以图祛邪吉利，并用红纸书“一路福星”贴于轿帘。轿至女家，女方饭食招待后，新娘头顶红盖头，着凤冠霞帔，穿绣花红鞋，拜祖、拜双亲，由姑嫂搀扶上轿，按所择方向盘腿而坐。兄弟数人扶轿，吹鼓手奏乐于前，女家亲友送嫁妆者尾随，谓之“送女”。迎亲花轿须按来时路线返回。途中，有的地方村民还有索要“买路钱”之习俗。入村，韩城一带讲究遇井、碾子皆用红布遮盖。轿至男家门口，新郎披红插花，着礼帽长袍，大荔等地还胸挂铜镜，由傧相陪同，走向花轿施礼。在鞭炮、鼓乐声中，傧相向花轿撒“铜钱”，新郎揭开轿帘，新娘由女喜傧扶拽下轿，韩城一带由公婆抢抱，孕妇、寡妇及属相相克者回避。这时，有的县（白水等）由“全命人”手提烧红铧尖，用食醋浇注，冒白烟后，围花轿转三圈，俗称“打醋胎”；有的先以四个蒸馍在花轿四角轮番投掷，再举干草火把绕轿三周。随之，由一能说会道的热闹男子充任“相风的”，向新娘身上撒草料（麸、谷草秆、核桃、枣等），唱“撒草歌”，如“一撒金、二撒银、三撒媳妇进了门”等，同新郎、男女傧相引导新娘脚踏红毯直入洞房。进门时，新郎给新娘头上插筷子，意为“快生贵子”；用擀面杖挑去新娘盖头，拉手上炕，绕炕角转一圈，俗称“踏四角”；新娘按所择方向，盘坐于备好的酒曲（或醋曲）上，谓之“坐福”；新郎踢新娘三脚，嬉击三拳，以示“出嫁从夫”。出洞房时，年轻人争给新郎脸上抹黑，谓之“贺喜”。午时，宾客入席后，新郎新娘按男左女右，在“天地桌”前行三叩首礼，称为“拜天地”，再拜祖先牌位，然后夫妻互拜。席间，好热闹者给新郎母亲抹黑脸，叫“搭喜”。宴席间，有的地方还有新郎新娘抓饺子、馄饨，抓住饺子示生男，抓住馄饨示生女。宴毕，送走女方宾客，新娘给本家及亲友长者倒茶，长者赠送礼物，俗称“认亲”。至夕，新郎新娘吃合喜面，再饮交杯酒，称之“合卺”。新婚之夜，小伙、姑娘都来“闹房”，多以猜谜、磕头、打趣、偷房等方式取闹，俗称“耍媳妇”。习惯上有三日不空房，三日不熄灯，三日无大小之俗。

婚后次日，新郎新娘“拜巷院”，女家接女和女婿，叫作“请女婿”，亦称“回门”。返回后，新郎领新娘认坟祭祖。婚后第三天，新娘拜翁姑及宗族亲友，叫“分大小”。然后，下厨做饭，显示手艺。女方男方要人应邀到男方赴宴，称为“送饭”，有的叫“摄饭”。当晚，男女双方谢媒人，盛宴款待。婚后第四天，新娘回娘家“熬十”，一般只住3天，有的住12天，称“熬满月”。新娘被新郎接回时，邻里“搭金桥”“筑庙台”，让新娘从上面通过。有的还给兄弟脸上抹红，或将公婆打扮成丑陋相，骑牛逗趣。结婚之俗各地不尽相同，因贫富差异，亦有差距，富家往往讲究较多，贫家则往往从简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颁布了《婚姻法》，对男女结婚年龄有明确规定。男女青年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双方各持本单位或村委会介绍信，去男方所在地政府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择日起举行结婚仪式。婚前仍有“添箱”“行礼”之俗。男方要向女方送箱柜、棉花、衣物及聘礼。迎娶，初期用自行车，后来用“手扶拖拉机”或小四轮拖拉机。有的也用卡车、面包车或吉普车。婚礼仪式较旧时简单，一般由主婚人主持结婚仪程，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介绍人讲话，新郎新娘相互佩戴大红花，并向介绍人、双方家长及来宾致敬。礼毕设宴招待。当晚仍有闹洞房之俗，有的还有电影、自乐班助兴。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条件好转，操办婚事开始互相攀比，一般都讲究高级衣料、高档家具，并要大摆宴席。结婚花费，农村最少千元以上，城镇都在万元以上。

旧社会，人们对生老病死缺乏认知，认为人死后魂不死，希望去世的先人能享受到阴间的荣华富贵，因此不惜重金为死者扬幡鼓吹、盛殓厚葬，以示子孙恪守“丧尽礼、祭尽诚”的守孝之道，丧葬礼俗十分烦琐，治丧标准很高，迷信色彩相当浓厚。富裕者年过60便开始购置棺木和寿衣，请风水先生看“风脉”，择茔地，用砖石箍墓，在墓地植柏树。棺木以柏木为佳，也有用松木和桐木者。棺木有四页瓦、八大块、十合子、十二圆（用12块板）。棺木雕刻字画，内外漆好，储以待用。寿衣，也称“老衣”“殓衣”。男的为长袍短褂，女的为秀衣套裙。一般内外三至五套，单衣、夹衣、棉衣都有，但忌穿皮毛类。经济条件差者则不讲究，多为临时置备，一般是薄板枋、布衣衫，入土为安。有些特困家庭则芦席卷尸，挖土坑掩埋，或埋于“乱葬坟”了事。丧葬习俗较为烦琐。老年人将逝，儿女子孙要守护在旁，听候“遗嘱”。随之理发，净身，穿上寿衣。咽气后，多用白纸盖脸（城镇也有用黄纸、红纸的），点灯盏，抬置地上，男停正寝（中堂），女停内室，口放“衔钱”，手握一双筷子及包着馍的手绢，此曰“小殓”。待孝子（儿女子孙）到齐，在纸盆内烧纸，然后哭号，俗称“烧倒头纸”。并在大门口烧纸，挂幡，以示哀事。屋内书写引幡、“七单”、丧牌，设置灵堂。当日即告知亲朋，称为“报丧”。等逝者的外家（或娘家）及近亲到齐，将尸身入棺，此曰“大殓”，俗称“入殓”，或称“殓木人”。孝子亲友痛哭，绕棺一周而离。置灵棺于堂，头向内，足向外，停于正中。灵堂要围孝帘，立神位，挂魂幡，献饭菜，摆纸扎。孝子要在灵前守灵，焚香，燃烛，而且要昼夜不停，意在香火不断，后继有人。亲友闻讯，带纸箔钱物，前来吊唁。本家大小要穿白戴孝，给吊唁宾客按亲别“散孝”。停灵吊唁的时间长短，视逝者年龄大小、家境贫富而定，有放置3天、5天的，也有7天以上的。祭礼多送纸人、纸马、“金银山”等，至亲则为“全礼”——俗称

“送饭”。丧主一般用素席招待。

安葬亦有诸多讲究。先一日下午，由孝女3人，分别执扫帚，提水壶，拿簸箕，去坟地“扫墓”；由孝男3人，分别执魂幡，端饭盘，打灯笼，去坟地“送饭”。回来时，孝子列队出迎，俯首号哭，俗称“引魂”。到了晚上，孝子亲友到齐，开棺环视，告别遗体，然后封棺，点“棺罩”举行祭奠活动。次日晨或午时起灵。灵柩置孝轿——棺罩内或“龙杠”上。门外烧纸人、纸马，孝子于孝轿前相对而跪。起灵，铭旌前导，魂幡引路，鼓乐齐鸣，孝子尾随，外戚“扯纤”，孝女扶柩。长子或长孙顶“纸盆”，行至村巷口，跨越麦草火，将“纸盆”摔于火上。沿途痛哭，撒纸钱。至墓地，纸人、明器、铭旌随柩下墓，填土为坟。火化纸奠品，孝子谢拜帮葬的众人，花圈、孝棍插于坟上，继承人衣襟盛坟土一把而归。葬后3天内，每到黄昏，家人焚麦草于坟周，俗曰“打怕怕”。第三日，逝者近亲要去坟地培土圆坟。死者逝世之日开始，每7天为一斋，共有“七斋”。每斋哭丧烧纸，俗称过“七”。斋期如逢农历七、八日的，由孝女在坟顶插一白纸小伞，坟周围插些小旗。亡后百日、周年，也要烧纸祭祀。父母之丧，持服3年，3年之内，士不应试，官不理任。三周年时，为之“脱服”，视为喜事，换红挽联，动亲朋，请乐人，设宴席，脱孝服，在坟前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职人员过丧事，礼仪从简，一般佩戴黑纱，敬献花圈，开追悼会。20世纪70年代以后，遗体实行火化，一般在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农村仍然实行土葬，“入殓”“送葬”等仪式仍继续进行，“七”“百日”“三年”仍然要过。但守孝3年的习俗不像过去严格。后又普遍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提倡礼仪从简。

四时八节的习俗，渭南和关中其他地方有相同之处。如正月十五闹元宵、挂红灯，清明节祭祖过寒食，五月端阳插艾、送香包等。也有独特的地方，如流行在合阳等地的七月七扮巧娘，看豆芽，剪窗花，磨瓷瓦，说花花，尤为典雅古朴，特别能表现渭南人巧的一面。而流传在渭河两岸的十月初五大狩猎则最能表现渭南人勇猛的一面。初五当天，成千条猎狗聚于一处，大部分是细狗，狗的叫声此起彼伏，周围看热闹的人成千上万，狩猎开始前，细狗排成一排，狗主一撒狗绳，顿时狗撵兔跑，尘土飞扬好似古时部队出征，气势蔚为壮观。正月十三到十六的社火则各有特色。踩高跷的胆正气壮，“血故事”威猛雄奇，“抬神楼”彪悍狂放。最壮观的还要数韩城、合阳等地的百面锣鼓表演，120余人参加，老鼓居中，小鼓四面环列，40面大锣和40面铙钹分列左右，两人手持摇杆指挥，锣鼓敲起，气势磅礴，节奏分明，声传数十里，场面雄壮宏伟，群众编口诀称赞



“百面锣，随大鼓；铙钹隔，手锣补；看花哨，数小鼓；看气势，像猛虎”。特别能表现西部民风的阳刚正气和高亢激昂，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

祭祀活动除过家庭、家族自发地祭天地、拜祖宗的仪式外，多存在于庙会活动中，境内立庙祭神，极为普遍。由于人为的推崇，各地也依时令设立定期庙会，如富平农历二月十九日的疙瘩庙会，华州农历三月八日的下庙会，华阴农历三月十五日的华山庙会，韩城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和合阳农历八月初二的城隍庙会等。庙会期间，善男信女、优伶乐人、行商坐贾、赌博的、算卦的、卖艺的、讲道的三教九流云集，摆庙，唱戏，抬神楼，响三眼枪热闹非凡。新中国成立后，祭神之风基本消失。传统的庙会活动还有，比较大的有韩城群众自愿组织的拜谒司马迁祠的活动和法王庙会、白水仓颉庙会、华阴西岳庙会和朝山会、蒲城的娘娘庙会等，但集会内容已发生变化，多为农闲之际的物资交流，以及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

过去的一切礼仪、祭祀、庙会等活动，大都由自发而逐渐变为有组织的活动，赛社行会便应运而生。有慈善性质的“义仓会”“喜孝会”“寒衣会”“坟头会”“舍场会”，有娱乐性质的“乞巧会”“朝山会”，有进行伦理教育的“礼教会”等等。影响最大的当属在渭北具有政治组织特征的民间组织大刀会，也称刀客会。其成员通常携带一种临潼关山镇制造的“关山刀子”，刀长约3尺，宽不到2寸，制形特别，极为锋利，群众称佩刀之人为刀客。有一个类似首领的人物，大家都称之为某某哥，在他以下的人们都是兄弟，围绕着首领活动。刀客除做一些保运、贩运的普通营生外，还进行聚众赌博。每逢集市庙会，总是摆摊聚赌，自己赌，也让别人赌，但讲信义，输多少给多少，绝无输打赢要之事。刀客富有反抗精神，好抱打不平，常为蒙冤受屈的人撑腰，讲义气，不惜命，不要钱，完事后，事主仅供一顿茶饭而已。刀客曾参加陕西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刀客逐渐销声匿迹。现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旧的行会早已销声匿迹，古老的赛社行会，今天已经被赋予新的健康的内容，新的团体如“红白理事会”“禁赌会”“禁烟会”“扶贫基金会”等纷纷成立。

古史上称“东府民风士气，刚勇好胜，豪放仗义，尚学勋业，惜名节义，所以，将相笃生，项背相望”。这样的评议，如果再加上东府女性柔美、婉约、心灵手巧、富有创意的特点，就会更加符合渭南人的实际。

4. 饮食

1949年以前，渭南境内城镇人口很少，绝大部分为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中

多数衣食不足，平常主食小麦、玉米、糜谷、豆类，间食野菜。食用油较少，调料亦很简单，多为盐、醋、辣子三样，穷困时，唯有盐而已。山岭川谷区，以食土豆、玉米、豆类为主，贫苦佃户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若遇荒年，即以榆钱、荠荠菜等糊口充饥。普通人家平常吃饭，每日早、午两餐。早饭蒸馍、米汤，午饭主食面条。若有客人，早饭增加豆类，谓之“豆子饭”，午饭则改变花样，增加蔬菜，谓之“改样饭”。农忙时，一般加晚餐，俗称“喝汤”，有的还半早打点，谓之“喝的馍”。普通人家吃饭，男人多端饭碗聚于村道，边吃边闲谈，名曰“老碗会”。新媳妇一般不出灶房，给大人小孩舀完饭再吃。多数农家每年自己腌有酸菜，特别是山区更普遍。腌菜多用红萝卜叶、莲花白、散心白菜、青辣椒等，佐以粗盐。玉米稀饭就腌菜，省事可口，俗有“腌酸菜，胜海带”之说。另外，一般农户还用自产菜籽、棉籽榨制或换食油，用豆类换粉条和豆腐，用柿子做醋，自种蔬菜，自给自足。殷实之家，吃饭讲究高桌子低板凳，每餐四菜，主食副食搭配。官绅富商，则重于副食，顿顿不离酒、肉、蛋，来客过事，更是丰盛，荤席、全席，做十几个菜屡见不鲜。平常的饮料，富豪人家，喝茶讲究茶性，冬季熬砖茶，夏季喝青茶。普通人家，茶水仅用来招待客人，自己平时则只喝白开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的饮食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开始重视饮食卫生，吃饭注意定时定量，主食副食合理搭配。20世纪50年代，主食小麦，搭配谷类。60年代，由于天灾和人为的原因，有一段时间以杂粮为主，甚至“瓜菜代”。不少地方粗粮细做，玉米黄、金银卷、发糕成了新式食品。1978年以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民、居民常年吃白米细面，顿顿有“油泼辣子夹蒸馍”。逢年过节则花样多变，水饺、臊子面、煎饼、碗碗肉，应有尽有。汉中凉皮、兰州拉面、川味菜肴、德州扒鸡等也在渭南各地落户。老年人、小孩喝羊奶、吃鸡蛋者日渐增多，年轻人喝啤酒、饮料已较普遍。城镇人口一日三餐，工作紧张时，往往在饭馆吃饭。逢年过节，老人过寿，结婚办喜事，讲究在饭店包席，既省事，又有面子。来客招待，喝茶讲究卫生，用一次性纸杯。各地有特色的食品在当地基本上都能吃到。人们还把当地一些传统食品进行挖掘改造，重新经营，如蒲城的椽头蒸馍，大荔的带把肘子、月牙烧饼，韩城的羊肉饴饴、油酥饼，富平的太后饼，合阳的甑面等。

在一些正规的宴席上，有些老年人很讲究吃饭的规矩：入席，尊长亲朋坐上席，陪客坐两旁，其他人员依次入座。出席，讲究“一茶、二酒、三饭食”。酒菜质量量力而行，多少不等。喝茶时配以糖果、糕点，饮酒菜上双数不上单

数，吃饭菜上单数不上双数，素有“5碗、全席（9碗）、13花，外带一个猪尾巴”之说。开席，陪客或主人晚辈先给上座“看酒”，酒过一轮，待陪客或主人说“捉起”，方能动筷吃菜。席间，酒壶没酒了，不能说“完了”，要说“满了”。同辈人或朋友相聚，往往少不了猜拳，一般6杯酒，赢拳者不喝，输拳者喝酒。酒菜足兴后，上吃饭菜。主食讲究早上吃面，午席吃馍。退席，讲究上座离桌后，其他人才能离开，若有事需先走，应说“失陪”等客气话，拱手退出。

5. 艺术



华州黑陶

渭南的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既有气势浩大、参与人数众多的社火，又有行装简便、深受人们喜爱的皮影、木偶、武术、杂技，也有专事重大活动庆典的礼花、焰火，还有深得专家赞誉的面花、陶艺等。

渭南的社火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是由历代

劳动人民驱傩、猎祭、祈雨、迎春等活动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其形式融民间舞蹈、音乐、美术、说唱、戏曲、杂技、武术等为一体，以广场表演为主，分造型社火和表演社火两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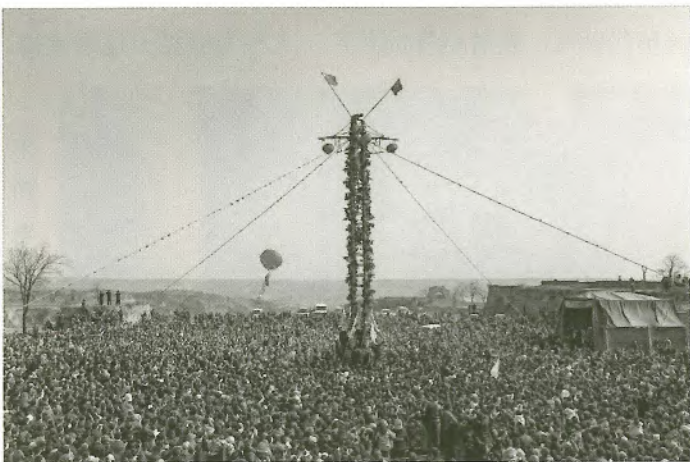
渭南的造型社火是将表演内容固定在桩架上的造型艺术，最具代表性的有芯子（抬芯子、背芯子等）和故事（车故事、马故事等）。



传统艺术——民间乐队

抬芯子的骨架用铁棍套接绑扎而成，分枝杈竖于底座（多为方形木桌），整体少则两层，多则数层，高约数米。一套芯子少则8台，多则10余台，每台芯子根据表现内容，少则2人，多则8人，还有数十人的，由年轻力壮的青年抬着行走，表演者属儿童少年被固定在铁骨架上，做出各种动作。华州小涨村的抬芯子颇有特色。背芯子又名背杆，由人背着芯子表演，其骨架属特制铁架，上有芯子杆承受孔与固定在艺人腰部的铁卡和在双肩钩挂的扁铁钩。表演者一般为儿童，被固定在铁架上，身穿表演服装，随着锣鼓节奏做出表演动作。韩城的背芯子在渭南最有名。从清朝到民国时期，芯子表演内容主要以传统历史剧为主，如《白蛇传》《三娘教子》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芯子表演的内容增加了《兄妹开荒》等新剧目。故事是表演有故事内容的造型节目，有车故事、马故事、床故事、血故事等，前三种分别为装置在车、马、床上的节目，其形式与芯子相似，内容以传统戏为主。血故事则是表演与血有关的故事，如《杨七郎带箭》《包公铡陈世美》《上刀山》等，全都以血淋淋的形象出现。血故事又分活故事和死故事两种，活故事用荞麦、猪肠、板油抹上血红颜色，根据内容装扮角色，现场表演；死故事则提前装好，直观外露，不做现场表演。血故事因表现内容形象恐怖，已很少表演。1988年，为拍摄民间艺术资料，华州的民间艺人做过血故事表演。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大型造型社火表演逐渐减少。

渭南的表演社火种类较多，有三眼炮、旗仗、锣鼓、高跷、挠杆、秧歌和各种民间舞蹈等，社火表演中的各种锣鼓队颇具特色，其中较为壮观的要数韩城的百面锣鼓、挎鼓子、挠杆和大荔的立杆等。百面锣鼓流传于韩城、合阳等地，往往



上刀山

排在社火队伍的前边，俗称响器。表演时，有120余人参加，老鼓居中，小鼓四面环列，40面大锣和40面铙钹分列左右，两人手持摇杆指挥，锣鼓敲起，气势磅礴，节奏分明，声传数十里，场面雄壮宏伟，群众编口诀称赞“百面锣，随大



鼓；铙钹隔，手锣补；看花哨，数小鼓；看气势，像猛虎”。挎鼓子是社火中的祀神乐器，相传元灭金后，为庆贺胜利，军民同乐，后人世代沿袭，作为祭祀法王的鼓乐。早期表演时，鼓手均头戴尖顶坡式红缨凉盔，身披黄马褂，腰束白色布裙，足蹬战靴，击鼓时仰面朝天，马步蹲裆式击鼓，有蒙古骑士风度。挎鼓子的乐器除鼓、锣、铙钹外，还有喻号（即海螺），带有古军乐痕迹，其乐谱有老虎磨牙、钉圪巴、肚子疼等。挠杆是为社火锣鼓队渲染气氛的彩色花杆，表演者女装打扮（早期为男扮女装，后改为装扮时髦的姑娘），手执4米长饰有彩绸花束和串串银铃的挠杆（有的还装有镜子或印花毛巾、被面等），浑身摆动，双腿上下有节奏地踩动，挠杆随锣鼓点、铙钹在空中翻飞，几十根挠杆上的五色花束在鼓手上空飞舞，场面十分动人。立杆是社火队中祭祀性的表演节目，其表演者为男青年，也着服化装，手执3米多长的竹竿，在社火队两旁活动，行进中做一些腾空翻身的动作。独杆轿是社火中的杂耍节目，表演时，由两个身强力壮的男青年着服化装，肩抬一根木杆，杆上有一身着滑稽服装的丑角，社火队行进中，在杆上不断做倒立、直立等动作，也有驱赶阻碍社火队前进人群的作用。装扮丑角的演员一般反应迅速，能言善辩，有即兴表演的才能。当两队社火对阵时，往往要对诗文，内容多是当地的真人真事，双方互相揭短，有的是对方村里的趣事怪事，也有指责坏人坏事和不孝子女的。1984年，辖区各县举办了民间社火表演比赛，中国艺术研究院、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对部分县的社火表演录了像。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大型表演社火逐渐减少。



同朝皮影

渭南的皮影分东路皮影和西路皮影，其中西路皮影以阿宫腔为主，分布在富平县境内；东路皮影指华阴、华州、大荔和临渭区一带的老腔皮影和碗碗腔皮影，有的皮影班社也唱秦腔或眉户。老腔皮影历史最长，起源于汉代，成熟普及于明代。清朝中叶，境内皮影班社发

展到50多个。这些皮影班社不仅在境内演出，也流动到外地演出。民国初期，渭南皮影艺人较有名气的有王复育（参苗子）、杜升初（一杆旗）、肖景文

(十四红)等,他们的演出活动南及四川,东到山西、山东等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中国唱片社将杜升初《三娘教子》《金碗钗》《十王庙》《白玉钿》《玉燕钗》中的唱段制成唱片,在各地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皮影艺术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扶持。1956年,在陕西省举办的第一届皮影木偶观摩演出大会上,渭南县(今临渭区)闫村乡皮影戏签手郭向荣表演的《跑马》引起轰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戏封箱停演,皮影戏也改编演出革命样板戏。1976年,富平县皮影剧团刻制成高达60厘米的大影人,并把演出光源由幻灯改成日光灯,使皮影不仅可在千人大剧场演出,而且从“亮子”上能看到蓝天白云、落日红霞、青山绿水、急流恶浪、云飞电闪、雨倾雪飘,影人的嘴巴张合、眼珠转动自如,增加了舞台效果。同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县皮影剧团上山下乡演出的实况。进入20世纪80年代,皮影戏的演出进一步活跃。皮影剧团除经常演出外,还进行国际交流。1986年,美国民间艺术考察团一行21人考察了渭南的民间艺术展览,并观赏了皮影戏演出。1996年7月,华县民间皮影艺术团应日本唐吉柯德剧团团长上田顺一邀请,赴日演出。9月,该团又赴德国巡回演出。在此前后,渭南的皮影艺人谢德龙在西安成立了德庆皮影社,坚持演出十余年,其中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演出数十次,广受赞誉。皮影戏演出剧目多为本声腔剧种的传统剧目,其中李芳桂的“十大本”是碗碗腔皮影的保留剧目,也有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如富平县阿宫腔皮影剧团移植的童话寓言剧《鹤与龟》就颇受少年儿童的喜爱。

渭南的木偶有提线木偶和杖头木偶(捋葫芦),其中提线木偶影响较大。提线木偶流传于合阳县境内,俗称线猴戏、小戏或傀儡戏。合阳提线木偶源于汉代,兴于唐代,经历了宋、元的发展,明代有了较大的改进,并有完整的剧本。明崇祯六年(1633),合阳县举人李灌潜心研究提线木偶,从人物造型、脸谱、服装设计、提线技巧,到唱腔、音乐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并编写了《黑山记》《白汗衫》等提线木偶剧本。经过改进的提线木偶提线技巧更加完善,艺人概括为“提、拔、勾、挑、扭、抡、闪、摇”八字法,表演时,通过这些动作,赋予木偶以艺术生命,使之栩栩如生。明朝末期,合阳提线木偶曾随商帮南下苏州、扬州等地演出。清朝中期,合阳提线木偶经过发展演变,也形成了专用声腔线胡腔,并有花柳派、将家派和冤仇派几大流派。“戏状元”杜进虎和王玉蕴为代表,将线偶戏唱腔由粗犷的声腔改为雍容典雅、热烈浓艳、斯文淡远、蕴藉轻俏宜演爱情剧目的声腔,故称花柳派,因其久居县东南乡,亦称南派。此后,以颜喜牢(红眼娃)为代表,演唱以热烈爽朗、豪放激越见长,多演锣鼓戏、武



戏，故称将家派，因其多居坊镇一带，亦称北派。清同治年间（1862~1874），合阳线偶戏班赴京城前门外演出。清光绪二十年（1894），王玉蕴的线偶戏班赴甘肃、河南、山西等地演出，使线偶戏也流传于河南灵宝、山西芮城一带。民国初期，线偶戏艺人王武汉（六八儿）吸收花柳派与将家派之长，演唱上善于表现压抑、愤懑、痛撕人心之剧情，观众称其为冤仇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阳提线木偶戏受到了政府的重视。1952年，合阳县晨光线剧社成立。1955年4月，合阳县晨光线剧社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木偶、皮影观摩演出，并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场演出了传统剧目《打金枝》《周仁回府》。1956年，晨光线剧社参加了陕西省戏曲观摩会演，演出的传统剧《白汗衫》获一等奖，艺人王化南获表演一等奖。1957年，合阳县新生剧团将提线木偶戏《金凤钗》搬上了大舞台。

“文化大革命”开始，传统剧目停演，提线木偶艺人多数下放回家。1973年，合阳县线腔木偶剧团成立，聘回了一些老艺人，又招收了新学员。剧团不断改进演出道具，除提线木偶外，增加了杖头木偶和布袋木偶，并改进了木偶头、手、脚造型，使其更显丰满逼真。在演出中，还增配了照明设备和幻灯、布景，采用了高台表演，增强了演出效果。1985年，合阳县线腔木偶剧团表演的《辕门斩子》片断“讲情”被陕西电视台录像。此后，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大型歌舞剧《丝路花雨》时，线腔木偶剧团为其做了仙女们的空中表演。1997年，提线木偶的舞台设计进一步改进，设计制作了活动舞台。整个舞台框架用铝合金钢管焊接而成，长、宽各4米，设前幕、二幕和边幕，灯光、扩音设备居右，乐队居左。1998年，提线木偶戏又远渡重洋，赴巴西演出。提线木偶以传统剧目居多，最具代表性的为“三箱（厢）”（《百宝箱》《囊哉装箱》《西厢记》）、“二楼”（《谪仙楼》《鸳鸯楼》）、“双钗”（《金珑钗》《双凤钗》）和《蝴蝶杯》《白汗衫》《梅花簪》等。

渭南的曲艺种类有东府曲子、劝善调、秧歌、石羊道情等，外地传入的数来宝、陕西快书、相声、快板也有创作和演出，较有特色的为东府曲子和劝善调。

东府曲子起源于华阴、华州一带，明朝就有演出，由民歌、小调发展而成。初期无弦索伴奏，演唱时只用一个瓷碟敲击伴奏。演出形式为坐唱，所以又称地摊子、小场子，也有人叫念曲子、唱曲子。东府曲子在发展过程中增加了三弦、梆子、碰铃、板胡、二胡等，有时还加进笛子、低胡，使音响更加丰富。演唱人员也有所增加，少则1人，怀抱三弦，自弹自唱，多则8人，每人手持一样乐器伴奏。清光绪三年（1877），华阴曲子艺人张辅君身背三弦，带着两个孩子，

到湖北老河口一带卖艺，把演唱曲子作为求生的技艺。在华阴当地，也有许多人学唱曲子自娱自乐。曲子艺人多了，便有人开始组织演唱班社。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华阴县周克英在南营村组织成立了曲子班社走马会。以后，又有同乐会、自乐班等班社成立。曲子最兴盛时，渭南的曲子演出班社有40多个。清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1901~1904），富平县的王慧泉编选了明清陕西民间曲子集《羽衣新谱》。民国时期，民生凋敝，曲子演唱减少，有白水县的艺人李庚尧常常即席编词说唱，演出的《张良卖布》，幽默生动，令观者捧腹，尚有一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曲子艺人仍然坚持演出。白水县的李庚尧在宣传《婚姻法》活动中，编写了《寡妇再嫁》，演出后受到观众喜爱，被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20世纪80年代初，白水县雷牙公社雷牙大队的盲艺人申炳勤，自制脚踏铃和木鱼，一人持三件乐器，自编自演，亦受好评。随着电视等现代娱乐形式不断丰富，东府曲子也逐步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渭南的劝善调作为曲艺品种，产生于清代。清光绪年间（1875~1908），合阳县人董常义创作了大量的唱词，并在家乡创立了“善道”，利用劝善调的曲调进行演唱，借以教化民众。他还多次徒步赴京，沿途边走边唱，将劝善调传播到山西、河南、河北等地。他编写的《陕西荒年歌》等60多篇唱词，被广泛传唱，并多次刻版印刷。以后，合阳、蒲城、华州、大荔等地的民众将他编写的劝善调用民歌形式传唱，流传了数十年。劝善调的唱腔曲调简单，没有形成唱腔曲牌，只分上下句，易学易唱，便于普及。演唱形式也方便灵活，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用任何乐器，一张桌、一条凳、一幅画布，即可演唱。劝善调因其形式和内容的局限性，经历了几十年的传唱，以后便自行消失。

渭南的杂技起源于民间，历史悠久，有马戏、杂技、魔术等类型，分布在各县，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表演团体。20世纪60年代，华县（今渭南华州区）赤水一带有家庭杂技演出班社，通过街头卖艺取得收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街头卖艺的杂技演出停止。70年代后期，大荔县两宜公社西大夫大队的青年农民自发组织了杂技业余演出队，初建时只有三四人，农忙参加生产，农闲时演出。以后，杂技演出队得到了大荔县文化馆和两宜文化站的支持，演员增加到8人。1979年，该演出队的节目参加了地区群众艺术调演，并被选入地区演出团，赴省演出获表演二等奖。1980年，该演出队被命名为曲艺魔术队，归大荔县文化馆主管，并增加了民间曲艺艺人。以后，曲艺魔术队又联合西安等地的魔术爱好者，成立了大荔县魔术团，演员增加到20人，表演的节目有《花瓶姑娘》《分身》《慢鼓》《炒花生》和杂耍《纸烟跳舞》《空中取酒》等。这个时期，澄城



县城关镇的王建军以个体联营的形式，成立了王建军杂技团，有演员21人，演出的节目有《空中飞人》《汽车过身》《杠杆》等，演出活动遍及省内外。华县赤水一带的杂技演出人员也组织了郭村大队杂技团，恢复了杂技演出。1983年，郭村大队杂技团由赤水文化站接管，改名为赤水红艺杂技马戏团，重新组织人员，招收了新学员。该团的各种表演技巧较为全面，马戏、杂技、魔术、气功等种类齐全。表演的杂技节目有《空中飞人》《弓折挂面》《开山取石》等，魔术节目有《百花齐放》《空中变鸽》《飞表还原》等，马术有《一马双跨》《一马三跨》《八弓赶逼》等，气功有《儿童上刀山》（4种）《气功破石》《足蹬大轮》等。

渭南的武术主要流行于富平县一带。清朝末期，高三（高占魁，三原人）创立了高家拳，收富平门徒8人，皆得高家拳精髓，其中魏金钟、杨杰的武艺超群。民国年间，杨杰在关中武林颇有名声。他踢腿贴耳不下，形一实二，飞腿神速，被武林誉为“金鸡独立”“云里显圣”“一代神腿”，声名远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作为体育比赛项目受到重视。

渭南的焰火有杆火（又称程子、架子花，属低空焰火）、地火（又名地摊子、盘子火，属高空焰火）、礼花、花筒、梨花等，主要分布在蒲城、富平、韩城、合阳等地，尤以蒲城、韩城的焰火最具特色。蒲城焰火起源于唐代，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杆火、礼火和地摊子三大类，有低空、中空和高空多层次的立体焰火艺术。杆火属绑在木架上燃放的焰火，分全杆、半杆和一角3种。全杆有96个杆，另加2个老杆，2盘筐蓝火，共100个。半杆共50个杆，一角有25个杆（24个杆、1个老杆）。清光绪七年（1881），蒲城县城放过一次全杆焰火。因全杆焰火费用过大，以后再未放过，放杆火多为半杆和一角。杆火又分文武两种程子，各程子内容不同。文火有“猴戏”“天女散花”“鱼龙变化”和各种戏文内容，武火有“花盆开花”“铁树开花”“文武火斗”“金蜂齐鸣”等。杆火中的筐蓝火是在空中绑一个筐蓝型的大木架，上下36层，每层一个故事（二十八宿、十八罗汉、十美女进膳等）。杆火燃放时，文武并重，用码子自动点火，按次序燃放。老杆焰火有故事、图案、标语，以点明晚会主题，杆高10米以上。地摊子有“百鸟朝凤”“火焰飞舞”“百花齐放”“莺歌燕舞”等，燃放时把由数十个星筒组成的盘子放在地面点燃，各种花型直射夜空，高达数十米。花筒也放在地面点燃，有“大梨花”“十面埋伏”“鳖壳窝”“火树银花”等。蒲城焰火中的“火船”“火马”独具特色。火船像跑旱船一样，演员撑船在场子跑，整个船身火花四射。火马类似火船，由多架绕场奔跑，马口、马尾和人的头顶一齐向

外喷射火星，一般在焰火燃放前表演。1959年国庆期间，蒲城焰火赴北京天安门广场燃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赞。进入20世纪80年代，蒲城焰火先后参加了《人生》《彭德怀在西线》《大刀王五》等电影的拍摄。1987年10月，甜水井礼花厂的李宏森、陈润巧等7名艺人应邀赴法国巴黎，参加了由法国总统密特朗主持的巴黎拉维勒特公园落成典礼焰火燃放。

韩城焰火有文火、武火之分。沟北焰火纤巧花哨，人称文火；赵庄焰火火场组织军事化，燃放时炮声震天，人称武火。清道光年间（1821~1850），赵庄进士强克捷从四川邛崃县引进了武火。武火火场场面宏大，全架火设老杆4柱，每柱辖300竿火桩，称为一角火。全火共1200桩，每桩平年为12筒火，闰年为13筒火，共计14400筒火。火杆之间用火码穿梭串连，一经发火，火码三上三下，自动引燃，历时约两小时，全部焰火放完。因全火场面过大，费用太高，赵庄武火从未放过全火，半架火也较少放，一般仅放一角火。民国三十二年（1943），沟北村艺人高秀山、高风旗从赵庄学回焰火技艺，并加以改造，形成了沟北文火。沟北文火重在焰火造型，其代表性节目有“猴子尿尿”“介子推抱柳”“彩莲灯”“顶台灯”等。1950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赵庄艺人在韩城县城放了一角武火。黄昏时分，上百支“起火”从火场蹿上天空，在空中爆响，叫“起火叫人”。天黑后，台上点火，火码飞速绕场一周，四周华灯齐放。火码飞上老杆，燃起一圈子火，老杆上筒火同时燃放。火场上数十个火轮飞转，“红莲花”“白莲花”盛开，“大梨花”“石榴花”争艳，“葡萄花”“落地桃”“牛吼金蝉”“火树银花”五光十色。火码二上老杆，二龙口对峙放火，“炮打襄阳”“流星四迸”“火烧樊城”，火阵齐鸣，硝烟漫天，炮火震撼。火码三上老杆，引燃“乱马桩”，数十火码齐飞，数十杆花火同时燃放，焰火进入高潮，东角“四季花开”，西角“孔雀开屏”；“炮伞”轰天，数十朵金伞自天而降；“炮群”震地，两头火龙在地面盘绕厮拼。观众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赵庄武火因强姓各家各执一技，门户之间互不泄密，无人掌握全部技艺。后退休教师高健自费钻研，继承了赵庄焰火，并用自己研制的配方和湖南浏阳花炮交流，制作出火、色、焰、光俱全的焰火，施放多次，效果较好，但与赵庄焰火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沟北文火也因老艺人相继去世而停演。

渭南面花俗称花馍，属面食加工之艺术品。面花在境内农村比较普及，种类也较多，有婚礼花馍、丧礼花馍、寿诞花馍、节日花馍，等等。面花制作技艺并不复杂，以普通面粉作芯，特等面粉作皮，借以刀、剪、针、梳等工具，靠捏、剪、修、缀而成。渭南农村妇女世代相传，制作出各种各样精美的面花，使



面花艺术渗透于婚丧嫁娶、寿诞庆贺、节日交往等民俗活动之中。华州面花中的“谷卷”和“高盘馍”（亦称箔子馍）在面花中独具特色。谷卷为虎头龙身鱼尾的大型组合面花，远观似虎，近看则变化无穷。虎头是飞鸟作眉，菊花作目，卧雀作鼻；龙身饰满各种小面花，有二龙戏珠、喜鹊闹梅、双鱼戏莲、龙凤呈祥、十二生肖等20余种；鱼尾造型有曲有直，有弯有卷，使整个作品或动或静，栩栩如生。高盘馍用七层或九层不同的小面花捆扎在箔子上而成，礼仪较高，多用于喜庆。其中一层“水担勾搭”馍形似水纹，两端卷起，健壮有力，意为百年良缘，坚若磐石；二层为蝙蝠造型；三层桃果，喻多寿多福；四层为游鱼造型；五层鱼戏莲花，喻夫妻恩爱；六层为凤凰造型；七层牡丹，喻吉祥如意；顶端多为莲子贵子馍或花瓶馍。整个高盘馍高三四米，重四五十公斤，形若雕柱，酷似华碑，为面花一绝。

渭南的陶艺流行于富平、澄城、白水、大荔等县，以澄城县、富平县的陶艺最有名气。白水县有雷公造碗的历史记载，且民间尊雷公为陶瓷祖师，修庙供奉。唐代，澄城县始有陶瓷制作技艺。明嘉靖年间（1522~1566），澄城县衙每年都从尧头镇黑瓷产品征税。明末，澄城尧头窑产的黑釉剔花双耳大气精致优美。清康熙年间（1662~1722），澄城尧头窑有碗窑、瓮窑、黑窑、砂窑4个行业，产品有碗、碟、壶、盏、瓮、盆、罐、盘和各种精巧的玩具与器皿，造型粗犷拙朴，纹饰洗练凝重，釉色以白、青、黑为主，其中黑釉最有特色，俗称黑珍珠。白水县西河坡一带，有窑场百余家。晚清和民国初期，澄城县尧头镇的陶瓷业处于兴盛期，最多时有40余家，最少时也有20余家。民国年间，白水县也办起了陶瓷专科学校，培养陶艺人才，为县城南部兴起的陶瓷加工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渭南的陶艺有了新的发展。1956年，白水县的个体陶瓷生产者分别组织了陶瓷生产专业合作社。1961年，白水县成立了八一陶瓷厂。在大荔县，泥陶传人胥凤堂制作的黄河泥陶，颇具特色。其作品石砚图案有龙凤、人物、狮、虎、牛、蝉、龟等，人物造型有东坡资石、达摩面壁等，还有古陶器作品祥瑞麒麟、汉唐六朝仕女、古代服饰等，其泥陶作品参加了中华百绝博览会。1998年，富平县陶艺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陶艺村聚集了一批陶艺工艺师，创作了许多较有影响的陶艺作品，如工艺师王碧云的作品莲花童子、猴登科、石榴娘娘等，具有浓郁的民风民俗色彩；工艺师杨晓光的作品秦腔票友、酒友、村童、祈雨、回娘家等，则是陕西乡土风情人物的真实写照。富平陶艺村还成功举办了“2016第五届国际陶艺杂志主编论坛”。

6. 宗教

渭南先后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传入，宗教活动历史悠久，宗教文化积淀深厚。被道教尊为祖师的老子，春秋时为关令尹喜传授《道德经》之地函谷关，就与潼关一脉相连。佛教自东汉传入境内，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达到鼎盛，境内现存佛寺古塔37座，多为唐、宋时期始建。道教自东汉末期形成，西晋时传入境内，唐代开始兴盛，历久不衰，特别是华山道教，至今仍为全国有名的道教圣地之一。伊斯兰教元代传入境内，明代随经堂教育的发展而兴盛，清同治年以后渐衰。天主教明代境内开始有传教活动。基督教清代开始有传教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将这一政策写进了《宪法》。1952年，全区在宗教界开展了以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1960年，在宗教界内部开展了废除教内压迫、剥削的教育活动，使宗教活动正常化。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市内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有的宗教活动场所被挤占或者拆除。1980年至今，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一些宗教界著名人士被选为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宗教活动又陆续恢复。

（1）道教

道教为中国本土产生之宗教，以春秋时的老子为祖师，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教义。老子传经西行就经过渭南。据史料记载，西汉时期，境内华山上信道者隐居。晋太安二年（303），衙县（治所今白水縣彭衙村）有道士修建道观传道。唐代李氏王朝尊老子为祖宗，唐武德八年（625）确定道教为国教，渭南属京畿之地，道教活动一时兴盛。唐睿宗李旦之女金仙公主出家后曾赴华山修道，唐玄宗李隆基亦赴华山修祠建观，使华山成为道教圣地。北宋陈抟修道于华山，著《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被宋太宗赵灵赐号希夷先生，使华山道教再次兴盛。南宋王重阳创立全真教，收徒七人，即有名的全真七子，使道教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全真七子之一的郝霖受王重阳赐号大通，后居华山，创立全真教之华山派。成吉思汗两次召见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并免除道士的一切税赋，丘处机的门人刘道宁主持华山云台观道务，境内道教再次兴盛。元代，高道贺志真隐居华山，在山上凿洞数十处。明代，



1935年的华山道士

富平县人邱长春初随张三丰修炼于武当山中，曾诏拜监察御史太常不受，后归隐于县西北的长春观中潜心修道。合阳县南伏蒙村人吴仙姑修道于县内明山之中，募资建殿，道成坐化。清朝雍正年间，合阳县姓高的全真道人为救身陷长安狱中的师傅，公庭前静坐七昼夜，感动狱官，使师傅获释，后隐居于县内莲花山中潜心修道。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各县的道教活动渐少，唯入华山修道者颇多，有的因生活贫困所迫，也有出于对道教信仰者，有的来自华山邻近的陕西、河南，也有的来自河北、甘肃、安徽、浙江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忙于生产活动和政治运动，信仰道教者人数稀少。华山的道人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栽植树木。1956年，华山道人办起了华山服务社，设有食堂6个，茶水站4个，小卖部1个，照相部1个，以山养道，自食其力，提高了道人的社会地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山上的道人被红卫兵全部赶下山，有的被送回原籍或迁往外地，有的在玉泉院接受劳动改造，山上的道观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使许多道观和文物受到损坏。1978年以后，地方政府落实了国家的宗教政策，将玉泉院、东道院、西道院、镇岳宫交还道教管理，并投资修复道观和登山道路。1984年，中共华阴市委统战部和华阴市民政局协助，成立了华山道教协会。

【全真教华山派】全真教产生于宋末，由王重阳创立。全真教融道、佛、儒思想为一体，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为“全真”，故称“全真教”。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离开关中，在山东收徒传道，得高徒7人，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世称“全真七子”。全真七子又遵从师命，自立门户，创立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嵒山、华山、清静七大流派，其中华山派为郝大通创立，该教留发出家，不再嫁娶。全真教华山派自创立后，经元、明、清各代，始终坚持活动，从未间断，影响广泛。华山派的道教活动颇为庄重，日设早坛、中坛和晚坛。三坛活动均由各道观道士在本观举行，上课、诵经、击鼓、敲打道具、奏道乐，祈求国泰民安，纪念诸神。早坛在日出举行，晚坛在日落举行，午坛在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日正午举行。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道教最为隆重的朝拜盛会，各地的善男信女携供物、钱款、香、鞭炮，纷纷来到华山，加上观光游客，高潮期日达10万人之众，各道观亦游客盈室，香烟缭绕，诵经之声不绝于耳，蔚为壮观。“开光”为华山道教最为隆重的法事之一。新塑造像时，仅留两眼不塑，选择吉日，请来各处道家名人，召集众道徒，当众点睛，有“开眼见光明”之意，即谓之“开光”，亦

称“开眼”。“开光”时，全国各地其他道教流派均派人前来恭贺。

(2) 佛教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时期的古印度，为释迦牟尼创立，汉代传入中国，东汉时期传入渭南境内。各县县志记载，北魏时期，境内有多处佛教活动。唐代，因武则天和唐宣宗李忱等帝王先后崇佛，佛事兴隆，境内佛教活动一时兴盛。境内现存的37座佛寺古塔，多数始建于唐代，也有部分为宋代以后修建。明、清时期，同州、华州设有僧正司，各县设有僧会司，专门管理佛教活动。民国时期，战乱频繁，各县佛教活动逐渐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忙于生产运动，大多数县的佛教活动基本停滞，只有华县等少数县仍有佛教活动。“文化大革命”中，佛教活动受到冲击，一些寺院改作他用。1978年以后，地方政府落实了国家的宗教政策，佛教的房产和土地按政策划归佛教管理，佛教中的代表人物有的还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渭南境内东汉已有僧人传经拜佛。北魏时期，富平县、白水县、朝邑县有僧尼十儿人。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菩提达摩偕弟子慧可到合阳梁山寺寻访般若多罗僧，居住合阳一年多，建有寺院佛塔。唐代，多个帝王崇佛，佛教活动兴盛，僧尼人数众多，仅韩城县就有500多名，较有名的有合阳县的本宝和尚、道远和尚等。宋代，佛教活动虽不及唐代兴隆，僧尼人数亦较多，较有名的有合阳县的福尽、富平县建明月山寺的赵姓老僧等。明代，州始设僧正司，县始设僧会司，专事管理僧人。明天启年间马朴纂《同州志》记载的佛寺数表明，同州直隶地和朝邑、合阳、澄城、白水、韩城5县有僧人240人以上。当时有名的僧人有合阳县的法浩、悟旻等。清代，较有名的僧人有富平县的胜光和尚等，而佛教高僧首推合阳县的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于清光绪四年（1878）出家，在普陀山法雨寺潜修20多年，悟佛颇深，著有《印光法师文钞》，曾风靡佛界，1940年逝世时，世界佛界曾公祭。民国时期，佛教活动虽已减少，大部分县仍有僧人奉佛，朝邑县的智甲和尚创立了念佛社，富平县的纪时若倡导成立了佛教会，渭南县成立了由西安卧龙寺分会领导的渭南佛教支会，全区有僧尼数十人，有佛教信徒540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县的佛教活动逐步消失，仅剩个别僧人，只有华县少华山还有部分僧人坚持奉佛。“文化大革命”期间，佛教活动停止，僧人接受劳动改造。1978年以后，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落实，僧人得到重视，有代表性的僧人还被选为政协委员。

东汉时期，冯翊郡（治所今大荔县）建有般若寺。晋朝，下邽县（治所今

临渭区故市镇故县村)建有慧照寺。南北朝时期,合阳县建有梁山寺,菩提达摩和慧可居住合阳期间建有光济寺和佛塔;蒲城县建有圣母寺(俗称敬母寺);梁天监年间(502~519),朝邑县建有饶益寺;北魏永平年间(508~511),白水县建有兴教寺;北魏正光五年(524),富平县坛山建有安众寺。隋朝,同州(治所今大荔县)建有金塔寺、大兴国寺、龙兴寺,潼关建有弥佛寺。唐朝,佛教兴盛,新建寺院较多,同州建有渭源寺、唐安寺,华州有潜龙寺、甘露寺、永庆寺,朝邑县建有金龙寺、安靖寺,合阳县建有寿圣寺、罗山寺,澄城县建有阿那寺,潼关建有金陵寺,富平县建有灵感寺(今名圣佛寺)、法源寺等20余座寺院,华阴县建有圣容寺、静居寺等6座寺院,蒲城县建有慧彻寺等5座寺院,韩城县也建有庆善寺等5座寺院,渭南县建有紫兰寺。宋代,新建佛寺亦不少,同州建有普救寺、大统寺、寿圣寺、法轮寺等,华州建有宁山寺、蕴空寺、禅修寺,富平县建有永庆寺、明月山寺,蒲城县建有崇寿寺、广济寺、龙泉寺、垂庆寺、善庆寺、云寂寺、福严禅院等,渭南县建有安庆寺,华阴县建有海乾寺,白水县会宾、长宁两乡共有14座寺。元代,同州建有普照寺等8座寺院,韩城县建有普照寺,渭南县建有永庆寺,合阳县建有光国寺。明代,境内寺院依然较多,州、县始设僧正司、僧会司管理。明天启年间马朴纂《同州志》记载,同州城乡除元代以前所建寺院外,又建有延寿寺等13座寺院,共有寺院30座;所辖5县中,朝邑县有寺院35座,合阳县有寺院109座,澄城县有寺院27座,白水县有寺院45座,韩城县有寺院6座。另外,华州建有卧龙寺等6座寺院,华阴县建有方山寺、报恩寺,蒲城县建有寿宁寺、大觉寺、精严寺、弘教院等,渭南县建有龙兴寺等9座寺院,境内有寺院276座。清代,境内的寺院数有所减少,合阳县有3座,潼关县有6座,富平县有5座,蒲城县3座,渭南县有15座。民国时期,佛教活动减少,佛教寺院有的自然损毁,有的改为学堂,境内仅有十几座寺院和一些念佛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重视对佛教历史建筑的保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境内未被损坏的37座佛寺古塔和一些寺院建筑先后被列入国家和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华州区柳枝镇上安村附近的永庆寺较有影响。共有大殿3间,过庭3间,东厢房2间,总面积2000多平方米。特别是院内的一棵千年黄杨,已长成树状,树干如盘龙,有碗口粗壮,冠如巨龟,昂头隆背,用手触摸,树身抖动,故又被称作“痒痒树”,为寺内一大景观。

(3) 天主教

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同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天主教亦称“公教”,

原意为“普世的”和“大公的”。天主教拉丁文名称为Ecclesia Catholica Romana,直译为“罗马公教”,音译为“加特立教”,意译为“罗马天主教”。16世纪传入中国时,因其信徒将所崇奉的神称为“天主”,故在中国称天主教。天主教信奉耶稣基督,并尊玛丽亚为圣母。天主教的宗教礼仪主要有七项,被称为“七件圣事”,即洗礼、圣体、坚振、神品、告解、婚配、终傅。明崇祯七年(1634),法籍传教士方德望赴陕传教,先后在渭河两岸发展信徒,天主教始传入渭南。初期的天主教活动主要在同州(治所今大荔县)和渭南县、富平县,在渭南县的马泉村、前张家、葛家沟和富平县的杨家堡等地均有天主教信徒,境内共有天主教信徒800余人。清康熙年间(1662~1722),罗马教廷挑起“礼仪之争”,不准中国的天主教徒敬孔祭祖,遭康熙皇帝禁教,天主教陷入低谷。晋、陕天主教第三任主教方启升隐居渭南县西塬葛家沟,于清乾隆六年(1741)逝世,葬于当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再次进入中国传教,使中国的天主教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意籍教士安乐华、德维屏、舒怀仁、穆可里、常志善、潘度义、法济尼等人先后进入渭南,以同州为主要据点,在华州和渭南县、富平县、韩城县、华阴县、潼关县、蒲城县、白水县传教收徒。民国二十一年(1932),渭南的天主教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陕西省教会在关中地区划分了5个教区,同州教区为其中之一,不久又改为大荔教区,总堂设在大荔县城屈家巷内。大荔教区管辖大荔县、蒲城县、白水县、韩城县、澄城县、合阳县、潼关县、平民县(后并入大荔县)、朝邑县(后并入大荔县)、华阴县、华县、渭南等12个县的天主教活动。教区神职人员中,穆继文为教区区长,德维屏为教区副区长,神父有仇秉谦、常志善等,教区天主教信徒有2000余人。1952年,张文彬代理主持天主教教务,在渭南县的南七、下吉、员曲等地修建天主教教堂17座,发展教徒2597人,神职人员中



慧照寺



唐圣佛寺塔

有外籍神父德维屏、舒怀仁和中国神父同益仁等。这些天主教信徒以下吉、员曲为主要据点，每逢星期日云集教堂，祈祷，礼拜，听神职人员讲道，诵读圣经，并开展大小“瞻礼”和“望弥撒”活动。1957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渭南的天主教逐步摆脱了罗马教廷的干扰，开始走“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道路。天主教神职人员积极投入到集体劳动之中，在集体食堂吃饭，按集体统一安排住宿。1965年，开展了整教运动，天主教活动受到限制，有的神职人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渭南有95%的天主教信徒被迫退教。“文化大革命”中，天主教在渭南基本上濒于消失。1978年以后，国家的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天主教大荔教区

的主教、神父相继恢复了名誉。张文彬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神职人员同宣化、葛兢维、郭多默等被选为县人大代表。1981年7月24日，张文彬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祝圣为大荔教区正权主教，为中国第一次祝圣的5个主教之一，也是西北5个省、区第一位由中国祝圣的主教。1982年，地方政府落实国家的宗教政策，退赔给下吉教产40000余元，建起了一座四檐六间圣堂和三间两层两座楼房作为主教府及修院。1983年，教区恢复了修院。1985年，政府又退赔给南白、南七教产76000元，退赔给韩家集教产12000元，退赔给良田坡教产12000元，并审批了几处修建教堂的土地。1988年9月18日，主教张文彬首次祝圣了6名青年修士晋升铎品。

(4) 基督教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巴勒斯坦地区。公元1054年，基督教东、西部教会发生分裂，形成西部的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东部的正教（东正教）。16世纪，马丁路德等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从罗马天主教里分离出一部分，产生了“新教”，中国习惯上称之为基督教。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断进入中国传教，基督教随之于清朝晚期传入渭南，

最初的传教组织主要是瑞典国教会“瑞华会”。“瑞华会”成立于1887年，管辖的传教地区是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东部，其最高组织称为“晋、秦、豫信义公会”。该公会下设4个总会，即晋南总会（会址在山西运城）、豫西总会（会址在河南洛阳）、陕南总会（会址在陕西大荔）、陕北总会（会址在陕西合阳），渭南境内设有两个总会。基督教外国传教士中，除卫国秀1人为挪威籍外，其余均为瑞士人，有胡林德、符凯励、山如仁、伯信诚、宋益廉、吴周泰等，其中胡林德主要活动于华州、渭南、同州、蒲城等地，山如仁主要活动于合阳、韩城一带。

经过这些传教士的多方活动，到20世纪初，渭南境内各县先后都有了教堂。除了信义公会的教堂外，境内还有属于漫礼宗的中华基督教会富平堂会、渭南堂会，属于基督教协同会的渭南崇凝堂会、老牛坡堂会，属于基督教自立会的蒲城东街礼拜堂，属于基督教安息日会的蒲城八福村教会等。各县的基督教信徒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辖区有五六千基督教信徒，分属6个基督教宗派（差会）。民国年间，虽屡经战乱，传教士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在有的地方还有新的发展。在蒲城县，胡林德传教活动十分活跃，每年冬季召开蒲城、白水、同州、朝邑、渭南、华州、华阴、潼关等地的基督教负责人会议，农历十一月至十二月举行查经活动，设立的课程有四福音大意、音乐、写信、体操、早晚礼拜等，由牧师胡德林、长老马志良、执事郭勋清等人担任讲师。基督教教会也举办了一些慈善活动，如蒲城教会办有崇正小学，合阳、韩城也办有教会小学，特别是民国十八年（1929），关中地区遭受饥荒，各县的教会都开展了办粥场救济灾民活动。在韩城县，民国二十七年（1938），基督教信徒已经达到1210人。1949年以前，在渭南的外籍传教士除年老去世的以外，均已离开渭南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耀宗等基督教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号召中国基督教会割断与外国差会的联系，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方针。渭南境内的基督教会纷纷响应，大荔县、白水县、合阳县、韩城县等先后成立了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1956年，基督教信义公会设在渭南的陕南、陕北两个总会改名为“信义公会陕东总会”。1958年，基督教各宗派联合礼拜，取消了原来的宗教名称，教牧人员有的改行，有的返回农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督教受到冲击，活动基本消失。1978年以后，地方政府落实了国家的宗教政策，基督教活动开始恢复。1987年3月，渭南地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在渭南成立，基督教活动进入有组织、有管理阶段。基督教的活动主要有每星期日的主日礼拜，每星期三的祷告

会，每年举办一次义工培训班，每年举行两次聚会（如春、秋聚会）等，其节日主要有“复活节”和“圣诞节”。

（5）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为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创立，唐代传入中国。宋、元时期，随着回族的形成而得到发展。在内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主要为回族人信仰而被称为回教。1956年6月，国务院通知，取消“回教”称谓，按国际惯例恢复“伊斯兰教”名称。渭南境内伊斯兰教活动在明代已较多。同州、华州和渭南属回族聚居区，也是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实施的重点地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设在清真寺内，以清真寺为据点形成了许多“坊”，由清真寺的阿訇任教师，经费由清真寺供给，来源于穆斯林信徒的献供。清朝初期，关中地区已有800余坊，同州、华州和渭南亦数量可观。民国时期，渭南、华县、华



西南京路清真寺

阴县、潼关县、朝邑县、大荔县、合阳县、韩城县、白水县等陆续有回族人迁入，伊斯兰教又逐渐恢复，其中渭南、华县、华阴县、潼关县、韩城县、大荔县、朝邑县均建有清真寺，境内有伊斯兰教清真寺8个，伊斯兰教信徒数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回族人数的增加，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亦不断发展。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伊斯兰教活动受到冲击，信教人数减少。1978年以后，国家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伊斯兰教活动又逐步恢复。1990年，渭南清真寺教长马骏英夫妇2人赴麦加朝觐，全区有伊斯兰教信徒5000余人。1992年，渭南地区伊斯兰教协会成立。1996年，临渭区政府拨款60万元，穆斯林自筹40万元，扩建了南京路清真寺，使建筑面积达1200平方米，为当时全市规模最大的清真寺。

七、人 物

渭南地灵人杰，自古至今，杰出人物层出不穷，蔚为大观。曾出过6位皇帝，80多位宰相，300多位将军，二十四史中记载的渭南人物有1200多位，其中立传、简介者360余人。渭南这块黄土地上的许多人，包括在渭南长期活动的人，尤其是本书记载的这些人，都是功勋卓著，彪炳青史，影响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有的甚至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1. 仓颉造字

仓颉，也作苍颉，复姓侯冈，名颉，号史皇氏，生于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世纪，古阳武（今白水县杨武村一带）人。仓颉所处的时代，是进入共主文明的黄帝时代。由于社会的生产文明和生活文明已初步形成，新生事物不断出现，传统的结绳记事和刻画符号记事法，极易混淆，诸多不便，无法适应复杂的事



白水县主要旅游景点仓颉庙

物。仓颉作为史官，面对诸多事物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及至河出图、洛出书，又实际仰观天体变化，俯察龟背、鸟羽、山川、指掌纹理，创造相应的纹（文）和字。

文字的产生，在当时的人类社会中，引起巨大震动。《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降粮食），夜鬼哭。”人们用这种想象的场景，表达对仓颉的巨大功绩的称颂、感激与崇拜。并且，给他用上神圣的称号“史皇”“颉皇”。

关于仓颉的葬地，《春秋纬·元命苞》中说，他“卒葬衙之利乡亭（衙即衙县，白水县的古称。利乡亭，今史官村）”。仓颉墓，在白水县城北约25公里的史官村的仓颉庙内。东汉延熹五年（162）所立仓颉冢碑，尚保存完好。庙占地17亩，内部楼阁竞耸。庙内有千年以上树龄的古柏四十余棵，其中“仓颉手植柏”树龄约五千年，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中国三大古柏群之一。

仓颉庙内碑石存量颇丰。其中“仓圣鸟迹书碑”，清乾隆十九年（1754）立，刻有“仓圣鸟迹”，即远古流传下来的《仓颉书》，全文28个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编印的《淳化秘阁法帖》收录了它。1990年9月13日《社会科学报》载刘志一《夏朝存在确有文字依据》一文，对《仓颉书》的含义重新破译，说：“它是用古彝文书写的一段祭祀经文，直译如下：一妖来始，界传鸦杈，祭神青脑，祸小马念，师五除扫，幡斋解果，过鼠还魂。意译则为：一群妖魔刚来到，树上乌鸦满天飞；割青宰羊祭山神，念经消灾骑马归；五位经师施法术，做斋完毕魂幡回；消灭鼠精魂归位……”“《仓颉书》的内容，就是祭祀活动的记录。由于黄帝出于西羌，彝族亦出于西羌，古彝文发祥西北地区，故传说‘仓颉造字’和这份《仓颉书》使用古彝文，也就不足为奇。其内容与《淮南子·本经训》所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夜鬼哭’的意思基本一致。”

仓颉造字，结束了人类结绳记事的历史，揭开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是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

2. 杜康造酒

杜康，字仲宁。黄帝时宰人（掌膳食品的人）。生于今白水县杜康镇康家卫村，卒葬于生前造酒的杜康沟。杜康善造酒，世人把杜康尊为造酒之始祖。自古及今，人们称杜康酿酒之处为杜康沟，酿酒用的泉水为杜康泉，酿造的酒为杜康酒。

杜康出生在白水县城西北7公里的康家卫村。康家卫左侧有一大沟，长约10

公里，最深处近百米，名曰杜康沟。沟底有一泉，水质清冽，冬夏不枯不结冰，名曰杜康泉。泉水涌出地面，沿沟流淌，形成一条小河，名曰杜康河。20世纪7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曾在杜康沟畔杜康造酒遗址处发现过类似砖瓦的断片，经研究确定为商、周时期以前的烧制品。杜康泉东陡崖下，有一直径五六米大的土冢，即是杜康墓。

杜康庙在杜康河沟底，杜康泉和杜康墓中间。明万历年间建。庙的原状是，靠崖挖出土窑两孔，一供杜康泥塑影像，一为和尚居住。庙前有大殿3间，画梁雕栋，非常壮观，于1950年拆毁。庙南紧挨杜康墓处，有一戏楼，也早已不存在。杜康像供于土窑之内，说明杜康当年是穴居生活，与当时社会存在基本吻合。记述杜康造酒的石碑，曾发现过5通，一在史官村仓颉庙内，一在白水旧县衙大门洞东侧镶嵌，一在白水史官乡贺苏街子，一在白水县冯雷镇冯雷村，一在杜康庙遗址内。

杜康生在白水，葬在白水，创造活动进行于白水。在陕西白水县，关于杜康的传说和民俗事象也相当丰富。每年正月二十一，人们赶赴杜康庙，敬献祭品，演戏娱神。

3. 伊尹辅商

伊尹，名挚，尹是官名，商初大臣，商代大政治家。生于公元前18世纪末至公元前17世纪初，夏末有莘国（今合阳县洽川自然风景名胜区一带）人。伊尹出身低微，原为有莘之君的奴仆，在城外耕田，常常研究尧舜的治国之道，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伊尹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他身为庖人（厨师），与汤接触多，便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要他“伐夏救民”。据《韩非子·难言》载，伊尹对汤“七十说而不受”。伊尹不气馁，锲而不舍，汤十分赏识，任以国政。

伊尹辅政后，纵观天下大事，剖析夏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商汤制定了灭夏之策。伊尹频繁往来于夏、商两地之间，并潜入夏王朝内部以“间夏”。商的活动遭夏怀疑，夏将汤一度扣押。汤在押期间，伊尹等人又大费周折，给桀送去大批珍宝，使汤得以获释。

伊尹辅佐商汤利用有缙氏公开反叛夏朝的机会，发兵吊民伐罪。陆续灭掉葛、韦、顾、昆吾等方国，剪除桀的羽翼，成为当时强国。汤欲灭夏，不明对方实力。伊尹建议他采取抗贡（不给桀送贡品）的手段，探测桀有多大的军力和号召力。汤采纳了，第一年不给桀进贡，桀怒，调九夷（部族）之兵伐汤。伊尹

说，桀还有号召力，不宜与桀作战，赶快赔礼道歉，补送更加优厚的贡品，以息桀怒。次年汤又抗贡，桀更怒，又调九夷之兵。但诸夷因连年用兵，师劳财尽，不听调动，桀只征集到三夷之兵伐汤。于是伊尹献策说，桀的号召力很小了，三夷之兵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我们可以对桀作战了。汤就联合诸侯军队，在鸣条（今河南封丘县东，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县东北）打败夏军（史称“鸣条之役”）。最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伊尹被商汤尊为“阿衡”（相当于宰相）。汤去世后，他又历佐汤子外丙、中壬两王。两王任期，伊尹改革耕作制度，到田间引导百姓耕种，发展农业生产，商王朝国力逐渐增强。

中壬后，汤之孙太甲（汤长子太丁之子，太丁未继位即夭折）继位。太甲不遵守商汤的法典，败坏汤的法制德行。伊尹侍奉太甲，率领诸侯百官祭祀先王商汤，宣讲商汤的大功大德，告诫太甲重视天命，当好国君，遵守先王法典，太甲不闻不理。伊尹对群臣说，嗣王这样就是不义，决不允许他的习惯随生性养成。于是，伊尹将太甲放逐，囚禁于桐（商汤的墓地），使其为祖父汤守陵反省，自摄行政当国。

太甲居桐三年期间，伊尹多次赴桐予以开导，循循善诱，陈述先王之明和人君必须具备的美德。太甲知迷能反，悔过自新，伊尹将他迎回亳都，还其国政。伊尹退后回到私邑，太甲感其恩德，封他的儿子伊陟为宰相。太甲死后，伊尹认为太甲能以失足为鉴，早朝晏罢，勤政惜民，遵循汤制，治国有方，商朝逐渐繁荣，不失为一代明君，因此尊太甲为“中宗”。据说伊尹活了一百余岁，卒于太甲之子沃丁八年，死时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还作了一篇文献《沃丁》赞颂伊尹的功德。

历经五朝、辅政三代四朝的伊尹，对商王朝的建立、巩固和繁荣，立下不朽功勋。他死后，太戊等几代商王都任用他的儿子伊陟为相，伊陟之弟伊奋亦官居要职。史载伊尹葬于都城亳。伊尹故里——陕西合阳县县城有伊尹庙，莘村南有伊尹墓和庙，旧有墓田数十顷，墓前有御道，相传为前代命官省察道。在商代伊尹就受到诸王的隆重祭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不少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功德之重。伊尹被后人尊为商代元圣。

4. 王翦父子助秦统一六国

王翦，战国时秦国频阳东乡（今富平县美原镇千口村）人，少而好兵，精通阵法，深得秦王政信任，用为大将军。秦王政十一年（前236），王翦率军攻打赵国，一举拿下阝与（今山西和顺县）、橐阳（今山西左权县）、邺（今河北

临漳县西南邺镇)和安阳等9个城邑。其后,秦、赵之间多次交战,互有胜负。赵用威震匈奴的李牧为将,数败秦军,杀秦将桓。秦王政十八年(前229),秦加大了攻赵的兵力。王翦率上党兵直下井陘(今河北井陘县西北),杨端和率河内兵进围邯郸,羌瘃领兵助战。秦兵合计达数十万人。赵派李牧、司马尚迎战秦军。王翦对李牧的威名早有所闻,知道硬攻不行,只能智取。王翦派人给赵王迁的宠臣郭开送去许多黄金,买通了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离间说:“李牧、司马尚想和秦联合反赵,以便多取得秦国的封赏。”赵王迁对他们二人产生了怀疑,就派赵葱、颜聚为将,以取代他们。李牧不接受,遂被杀,司马尚被废黜。于是,王翦率秦军向赵发起猛烈进攻,大败赵军,杀其将赵葱。随后,又打败赵将颜聚,攻克赵都邯郸,俘虏了赵王迁。赵公子嘉率数百人逃奔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境),自立为代王,与燕军联合,屯兵于上谷郡(治所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王翦则兵临易水,驻军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形成攻燕之势。

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发生了有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燕太子丹为阻止秦军攻燕,派壮士荆轲以献图为名行刺秦王。行刺未遂,荆轲被杀。秦王十分恼怒,派王翦、辛胜向燕国发动进攻。燕军和代军联合起来抗击秦军,在易水的西岸被王翦的军队彻底打败。次年,秦王给王翦派去了更多的士兵,王翦率军乘胜进击,大败燕太子军,攻克燕都蓟城(今北京城西南),迫使燕王杀太子丹献于秦。燕王则退守辽东以自保。这时,王翦之子王贲在南部攻楚也捷报频传,连下楚十余城。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国同时开辟了两个战场。在东部战场,秦以王贲为统帅,东进伐魏。王贲率秦军围困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挖大沟引黄河之水灌大梁城。战争历时3个月,魏大梁城被水泡塌,魏王假献城投降,魏国灭亡。由于南征伐楚之战是主战场,秦王选帅特别慎重。他初步确定了两个候选将领,一个是青年将领李信,一个是老将王翦。秦王先问李信:“我想攻取楚国,你估计要多少人马够用?”李信很自信地回答:“不超过20万人。”秦王又问王翦。王翦回答:“非60万人不可。”这时,秦王准备的兵力尚不够数,便说:“王将军老了,怎么这么胆怯?”于是,选李信为帅,领兵20万伐楚。王翦因秦王不用其言,便称病还乡,回频阳老家去了。李信的20万大军开始还比较顺利,先后攻克了楚国的平舆(今河南平舆县西北)、寝(今安徽临泉县)、鄢郢(今湖北宜城市南)和城父(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城父集)诸城。随着战线的扩大,兵力明显不足。加之楚军名将项燕指挥得当,采取了迂回运动、诱敌深入的战术,紧随秦军三天三夜,乘其不备,奇袭秦军,连斩7员秦将,大败李信。

秦王闻讯大怒，深感自己用人不当，立即从都城赶往频阳，当面向王翦致歉：“寡人没有听将军的话，任用李信，果然使秦军遭受耻辱。现在楚军正在向秦国逼近，将军虽然身体欠安，难道能忍心见死不救吗？”王翦坚辞不就：“老臣身体不行，请大王另请贤将吧！”秦王再次道歉说：“罢了，将军不要再推辞了。”王翦便说：“大王一定要用臣，非得给60万人不可。”秦王满口答应：“就按你说的办。”随后，秦王尽征国内士兵60万，交给王翦指挥，并亲自到灞上送王翦大军出征。临行时，王翦请求秦王给他许多良田和宅园。王翦率军东行，在临出关之时，又五次派人回去，向秦王求赏。有人问王翦说：“将军你要的东西恐怕太多了吧！”王翦说：“你错了。秦王本身多疑，现在又把秦国几乎全部的军队都交给了我指挥，他肯定不放心。我再三再四地向他请赐田宅池苑，使他知道我只想要财物，别无他图，便不会对我产生疑心。”

王翦大军进入楚国境内，楚将项燕也动员了楚国全部军队全力抵抗。王翦汲取了李信失败的教训，采取坚壁疲敌的战术，在平舆一线就地为营，坚壁而守。楚王不识兵机，多次遣人逼迫项燕出战。项燕无奈，率楚军进至秦军阵前。两军对峙，楚军多次挑战，秦军毫不理睬。王翦让士兵整天饱食善养，并亲自与士兵同食习武。过了一段时间，王翦派人到士兵中去了解练习得怎样，派去的人回来说：“士兵投石已经能投出很远了。”王翦高兴地说：“我的战士可以杀敌了。”项燕派人多次挑战，见秦军按兵不动，时间一长就有些疲惫松懈，便引兵向东撤退。王翦抓住战机，率领秦军趁势穷追猛打，在蕲（今安徽宿县东南蕲县集）大败楚军，楚将项燕自杀，楚军溃不成军。王翦率秦军一鼓作气横扫楚国许多城邑，于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攻下楚国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后又深入江南征服越君，使楚国彻底灭亡。

在王翦灭楚的同时，其子王贲指挥的北方战场也是战果辉煌。王贲在灭魏之后，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率军远征辽东，彻底消灭了燕国的残余力量，俘虏了燕王喜，使燕国从此灭亡。在回师途中，王贲又顺势攻灭了赵国仅存的代郡，俘虏了自称代王的赵公子嘉，使赵国不复存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王贲又受命向六国中仅存的齐国进军。当年春，经过周密的准备，王贲率秦军从燕南攻入齐境，齐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他不久就攻进了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齐王建率领一部分人守卫王宫，王贲派人去引诱齐王建，答应封给他500里土地。齐王建便率人投降了。秦国终结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形成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王翦父子助秦王平定天下，统一六国，立下赫赫战功。秦王称帝后，破例

封王翦为武城侯，封王贲为通武侯。

5. 司马迁著《史记》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左冯翊夏阳高门原（今韩城市嵬东乡高门村）人。祖先在周朝曾做过几代史官，父亲司马谈为武帝初太史令，学识渊博，其学术思想及著史志向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

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10岁就能诵读古文著作。他少年时期在家乡一边读书，一边放牧、耕种，有时候也随父亲司马谈去黄河、渭水一带搜集史料。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司马迁结识了因避罪来到夏阳的游侠郭解，并仗义帮郭解把母亲和家室安置在夏阳。后来，郭解经临晋（今大荔县朝邑镇东南）过黄河去太原，不久被捕杀害。因此事司马迁在家乡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于是，他离开家乡，来到京师父亲的官邸。曾向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元朔三年（前126），20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他江南考察的行程。他的双脚踏遍了长江、淮河流域，曾登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探寻了大禹去过的洞穴；考察了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南），寻找埋葬舜的遗迹；泛舟于沅江、湘江之间，体察屈原被放逐后的境遇。他向北渡过了汶水、泗水（今山东境内），在齐都（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和鲁都（今山东曲阜市）研讨学术，考察孔夫子教化的遗风流俗，在孟子的故乡邹（今山东邹城市）的峰山上参加了当地举行的乡射礼仪活动。这次约两年时间的考察活动，对他思想的成熟和后来纵横自如作《太史公书》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回到长安以后，司马迁参加了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秀而被任为郎中，做了汉武帝身边的侍从，平时掌守宫门，武帝出行则充当车骑手随行，并多次随汉武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的五畤祠祭祀。元鼎四年（前113）十月，武帝东巡经过司马迁的故乡夏阳，司马迁和父亲奉命为武帝在夏阳建造了一座行宫“挟荔宫”，后随武帝到汾阴（治所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庙前村北古城），立后土祠，礼毕南经洛阳回到长安。第二年，又随武帝西巡至崆峒（今宁夏隆德县东），祀泰畤于甘泉。元鼎六年（前111），西南夷且兰（治所在今贵州凯里县西北）君杀汉使，率其众反汉。汉武帝升司马迁为郎中，并将作为特使，随郭昌、卫广的军队征讨巴、蜀以南。汉军很快平定了西南夷，诛灭了且兰君、邛（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君和笮（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侯，在且兰置群柯郡，邛都置越嶲郡，笮都置沈黎郡，使汉的疆域扩展到昆明（今云南西部洱海一带）。第二年，



司马迁才结束了他的西南之行，回到长安。

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开始到泰山封禅，把年号由“元鼎”改为“元封”。此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参与了封禅活动的准备工作，当封禅仪式将要举行时，汉武帝却没有让他参加这一重大活动。司马谈心中十分烦闷忧郁，病倒在周南（今河南洛阳一带）。司马迁正好从西南夷赶回，来到父亲身边。司马谈抓住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司马家的祖先在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官的事务，曾在周朝的时候做过太史。后来虽然有所间断，难道现在要断绝在我手里吗？如果你能做太史，就能够继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皇上继承千年的传统封祭泰山，而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运啊！我去世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要编写的著作。况且，孝最初的含义是对待双亲，后来引申到对待君主，而最终还是要使自己在社会上能够立身，能够扬名于后世，使父母得到显耀，这才是最大的孝。天下的人称赞周公说他能够总结推广周文王、周武王的仁德，发扬光大周公、召公的风气，实现周太王、王季的理想以及公刘的主张，从而使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周厉王以后，治国之道亏缺，礼乐教化衰微，孔子重新修复治国之道和礼乐教化，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有知识的人仍然以此作为法则。从鲁哀公猎获麒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诸侯互相兼并，国史的记载中断了。如今汉朝建立。天下统一，君主圣明，臣子忠贤，志士为节义而献身。我作为太史而不能去论述记载，使国家的历史文献中断，我感到非常担忧害怕。你要时刻想着这件事情啊！”父亲临终时的这一席话，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低下头，流着眼泪向父亲保证：“儿虽然不聪敏，也一定要把父亲所搜集编排的文史资料全部整理出来，决不敢有丝毫缺漏。”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接替他的父亲司马谈被任命为太史令，职掌天时星历，管理皇家图籍。在任太史令前后几年时间里，司马迁随汉武帝又巡游了全国许多地方，西至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北到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东及辽西（治所在今辽宁义县西）、琅邪（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市西南夏河城），南达寻阳（治所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枞阳（今安徽枞阳县），既饱览了祖国名山大川，也参加了庄严肃穆的祭祀泰山活动，并亲自背柴，参加了堵塞瓠子河（今河南濮阳南）决口的抗洪活动。他一面巡游全国，一面搜集整理资料，并利用任太史令的机会，阅读了汉朝宫廷所收藏的大量典籍和文献，为著述史书做准备。

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公孙卿、壶遂共同建议并主持制定了《太初

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这种历法采用邓平的“八十一分律历”，也就是计算出一月之日为29又81分日之43，它在运算上精密准确，使其与日月相合。它的另一贡献是把过去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又沿用19年7闰法，使历书与农时季节相适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昌顺。同年，司马迁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了他著述《太史公书》的宏大工程。

初始，司马迁一面著述，一面随汉武帝到各地巡游，一切倒还顺利。天汉二年（前99），司马迁意外地受到了李陵事件的牵连。当时，汉匈边界战事频繁，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今甘肃酒泉）出发进攻匈奴。同时又派李陵率步兵五千从居延（治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哈拉和图）向北进击匈奴，以减轻贰师将军的压力。结果李陵的步兵遇到匈奴八万骑兵的包围，虽经奋勇拼杀，终因寡不敌众，最终被俘投降。汉武帝闻讯大怒，许多大臣也随声指责李陵。然司马迁却认为李陵平时孝敬父母，对待朋友真诚可信，常常为国家利益而奋不顾身；这次带五千步兵深入匈奴，遇到数万敌兵的包围，箭尽粮绝，救兵不至，但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虽然被俘投降，肯定是事出无奈，迫不得已，将来有机会一定会报效朝廷的。汉武帝以为司马迁在有意贬低他的爱妃李氏的长兄贰师将军，而为李陵游说开脱罪责，便把他打入狱中。不久有传言说李陵在为匈奴练兵，汉武帝信以为真，将李陵全家处以死刑。司马迁也被定了死罪，按规定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种是以50万钱赎罪，另一种是代之以腐刑。司马迁家境贫寒，哪有钱赎罪？但如果死去又难以完成父亲的遗愿。在这生不能生，死又不甘的艰难时刻，司马迁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骀脚，《兵法》修列”这些典型事例激励自己，负辱选择了腐刑。司马迁受刑之后被赦出狱，当了中书令，发愤著述，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完成了《太史公书》。因《太史公书》叙事记人均直言不讳，在当时并未公之于世。直到几十年后，司马迁的外孙杨惲才上书汉宣帝，将《太史公书》公布于世。后人称之为《史记》。

《史记》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卷，52万多字。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300多年间的历史。本纪是以一个朝代或以一个帝王为中心的大事记；表是按年或月排列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书是记述典章制度、天文历象、经济生活，等等；世家主要记述诸侯国的历史；列传是重要人物的传记和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古代史书的范例，从《汉书》到《明史》23部史书，在体

例上皆因袭仿效，概莫能外。司马迁写作《史记》，态度严肃认真，“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在历史观上，他不与圣人同是非，有褒有贬，爱憎分明，并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在人物的刻画上，以一事而见性格，形象生动，惟妙惟肖。总之，《史记》不但是部伟大的史学名著，而且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杰作。司马迁自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则称赞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除《史记》外，司马迁作赋八篇，均已散佚，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征《悲士不遇赋》片段。又撰《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修史的抱负。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不仅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甚至横及世界许多国家，不少国家将他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中国读者将他尊为史圣。

6. 杨震设馆兴教、清廉拒金

杨震（？～124），字伯起，东汉弘农郡华阴（今华阴市、潼关县）人。官至太尉，是古代著名的廉吏。

杨震的八世祖杨喜，是汉高祖刘邦的将军，先后任郎中骑、骑将。到杨震的父亲杨宝时，家境衰落。杨宝一生虽然不曾为官，却为人善良，学识渊博，名重一时，深得人们尊敬。杨震幼年丧父，家境贫苦。他与母亲、弟弟三人相依为命，借租种土地，度日糊口。杨震对母亲侍奉照料，体贴入微，乡里称孝，远近闻名。贫寒的生活并没有使杨震丧失志气。他胸怀大志，在以农耕维持生活的同时，刻苦学习，涉猎的知识面非常广。他曾拜当时有名的经学大师桓郁为师，研读今文经学，学习《欧阳尚书》。

杨震胸怀振兴国家、有功于世的志向，承袭了父亲杨宝“隐居教授”的做法，为国家培养人才。大约从二十岁起，他便设塾授徒，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教育生涯。牛心峪位于华山脚下，此峪树木茂密，山清水秀，是读书的好地方。早年，杨震的父亲杨宝曾在这里设馆授徒。杨震成年后，父亲虽已去世多年，而其学馆尚在，还可以利用。杨震采用孔子的有教无类，把许多贫苦人家的子弟也收为弟子。四方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学生多达2000人。学馆如市，书声琅琅，规模可观。因牛心峪槐树很多，故时人称为“杨震槐市”。他常说：“为人师者以德。”他教书育人以清白正直为要，又教风端正，讲学认真。他严格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师德情操，被人们誉为“槐市遗风”。杨震在牛心峪设馆授徒时，一边从事教育，一边奉养母亲。母亲去世后，杨震在华岳庙东边古驿道旁的双泉村建立了新的学馆。



杨震博物馆

双泉学馆，在今华阴市础峪乡东泉店村，因其地有双泉汇流而得名。杨震在《书堂铭》一文中描绘其地环境为：“两泉交流，双桥结彩，晚霞永照，文辉万载。”馆前是通往西都长安和关外的驿道，交通方便。当地人习惯上常将双泉学馆称为“杨震讲学处”。杨震在这里讲学将近十年，弟子多达千人。在当时，人们就美称杨震为“关西孔子杨伯起”，后人也称他为“关西夫子”。离开双泉学馆之后，杨震又到三鳢堂设馆授徒。三鳢堂，又名“校书堂”或“三鳢书堂”，故址在今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杨家村委员会泉里村西边的高地上。这里有杨震的故宅、藏书窟等，他在这里设教约在三年以上。

从牛心峪设馆授徒开始，到50岁出仕以前，杨震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弟子总数超过了3000人，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名宦虞放（汉桓帝时司空）、陈翼等人，就出自杨震门下。

永初二年（108），杨震应大将军邓骘之召，到邓骘幕府任职，后担任过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令、荊州（治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刺史、东莱太守、太仆、太常、司徒、太尉，出仕时间共16年之久。他为官十多年，始终以清白吏严格要求自己，立有“不受私谒”的规定。

永初六年（112），杨震由荊州刺史改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过昌邑县（治所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南）。昌邑县令王密闻知，即前去拜谒。王密是荊州人，杨震在荊州刺史任上，曾举荐他为茂才。王密以此为起点步入仕途，从而出



任昌邑县令。他为了报答杨震的举荐之恩，便于拜谒的当天晚上，怀揣十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却不为所动，断然拒收，并且严肃地问王密：“我了解你王密，你却不了解我杨震，这是为什么呢？”王密婉言道：“夜深了，无人知道此事。”杨震一脸认真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你）知，何谓无知！”王密满脸惭色，只好告辞。后人因此而称杨震为“四知先生”或“杨四知”。各地有关杨震的风物，也多以“四知”命名。昌邑县的老百姓为了纪念杨震拒金的廉行，后来特地在他辞金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四知庙”，此庙又称作“四知台”或“辞金台”。

杨震为官十几年，没有给自己购置产业，更没有修建豪华宅第。他的子孙也经常以蔬菜为食，徒步往来，不得乘马坐车。亲戚故旧劝杨震为子孙考虑，购置产业，发家致富。杨震回答说：“让后人称我的子孙为清白吏的子孙，以此来馈赠他们，不也是非常丰厚的礼品吗？”

杨震为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任人唯贤，对那些无德无能的平庸之辈，不论是由谁举荐，杨震都坚决抵制，概不任用。延光二年（123）杨震任太尉时，汉安帝的舅父、大鸿胪耿宝，向杨震举荐宦官中常侍李闰的哥哥，想让人入朝做官。杨震知道那人的德才不值得征辟，就予以拒绝。后来耿宝又亲自前往杨震住所，对杨震说：“李常侍受朝廷器重和宠幸，想让你提携和重用他的兄长，我不过是在转达皇帝的意思罢了。”杨震立即针锋相对地说：“如果朝廷想让三公征辟中常侍的哥哥，按理就应该有尚书的文书。”耿宝无言以对，只得怀恨而去。

建光元年（121），临朝执政的邓太后病故，宦官李闰、樊丰和汉安帝的乳母王圣等肆意妄为起来。王圣的女儿伯荣也出入宫掖，公开为非作歹。杨震便向汉安帝上疏，揭露奸佞，指陈时弊，说：“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汉安帝接到杨震的奏疏后，不但没有纳谏改错，反而将它交给王圣等人传阅。于是王圣等人更加有恃无恐，伯荣骄淫尤甚，先与故朝阳侯的从兄刘瑰私通，随后与刘瑰结婚。王圣又使汉安帝封刘瑰为朝阳侯，加官侍中。杨震对此胡乱封侯封官之事更为恼火痛恨，再次上疏，说：“今瑰无它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时之间，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旧制，不合经义……”而汉安帝仍是执迷不悟，不加理睬。

延光二年（123），汉安帝不顾杨震的多次谏诤，下诏遣使臣给王圣大规模地建造豪华宅第。再加上佞臣中常侍樊丰等人的煽动，使朝廷上下都为此事活动起来。杨震对如此不顾国库空虚、百姓贫困，却大兴土木、肆意挥霍的行为极为

愤怒，立即向汉安帝上疏说：“臣伏念方今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虏钞掠……”汉安帝对这次上疏，依旧置之不理。樊丰等于是更加无所顾忌，竟伪作诏书，调发国库钱粮物资，竞相为自己建造家舍、园池和楼观，挥霍的钱财难以计数。

延光二年（123）十二月，洛阳地震，杨震借此上疏诤谏说：“……而亲近幸臣……盛修第舍，卖弄威福……地动之变，近在城郭，殆为此发。”杨震将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朝廷奸人盛修舍第联系起来，说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是奸佞破坏阴阳和谐所致。这在谶纬迷信盛行的当时，攻击力是很强的。但汉安帝昏庸，终未采纳。

杨震不断向汉安帝进谏，揭露奸佞内宠的罪恶，引起他们的无比嫉恨，但由于杨震名高位显，他们未敢加害。延光三年（124）春，汉安帝东巡泰山。朝廷中的樊丰等佞臣乘机竞修第宅，动用国库，并且伪下诏书，聚敛财物。杨震派人去查证落实，发现了樊丰等人伪下的诏书。调查清楚后，杨震又一次写好了奏章，准备等汉安帝东巡归朝后奏闻，进而处置樊丰等佞臣。

樊丰等人得知消息，便首先下手，借太史令说“星变逆行”，有异常现象，向汉安帝谗害杨震，说：“自从赵腾（河间平民，向安帝上书指陈朝政之失）被陛下处死后，杨震满腔怨怒。杨震是邓鹭的故吏，所以一直对陛下深怀怨恨。”汉安帝轻信了谗言，东巡回京暂住洛阳太学待吉日回宫时，即连夜派遣使臣收回了杨震的太尉印绶，罢免了他的太尉职务。樊丰等并不罢休，唆使大将军耿宝上奏汉安帝，说杨震罢官后满腹怨恨，触犯了大臣不服罪，应该进一步处置。汉安帝即下诏，将杨震遣归弘农郡老家。

杨震率家人及门客，离开洛阳，踏上返乡行程。当行至洛阳城西的夕阳亭时，悲愤至极，对几个儿子和诸门人说：“死是人所难免的。我受皇恩，官居高位，痛恨奸臣狡猾而不能诛，厌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有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子盖住形体就行了，不要归葬祖坟，不要设祭祠。”说毕，饮毒酒而死。

杨震的儿子和门人将他的灵柩向故乡华阴运送，而樊丰等人并不就此罢休，又指使弘农郡守移良拦丧。移良即派人在陕县（今河南省陕县）拦住杨震灵车，不准西行，并将灵柩露放在大道旁边。一年以后，汉少帝刘懿即位，惩处了汉安帝时那些奸佞嬖幸。樊丰等下狱死，耿宝自杀，王圣被贬徙雁门。永建元年（126）十一月，汉顺帝刘保即位，颁布诏令，为杨震昭雪，封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并赐钱以礼改葬杨震于华阴潼亭（今潼关县高桥乡庭东村西北）。

7. 杨坚建立隋朝

杨坚（541～604），小名那罗延。隋弘农华阴（今华阴市）人。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出生于冯翊（今大荔县）般若寺，是隋朝的开国皇帝。

杨坚之父杨忠，曾随北周太祖宇文泰在关西起兵，是西魏、北周开国功臣。北周天和元年（566），杨忠去世，杨坚承袭其父爵位，为随国公。建德二年（573）九月，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将杨坚的长女杨丽华纳为皇太子宇文赟（yūn）的妃子。宣政元年（578），周武帝病故，太子宇文赟登位，即北周宣帝。当年六月，立杨丽华为天元皇后，任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次年初，杨坚又转大后丞、右司武，随即升大前疑（丞相）。

宣帝生活奢侈，有五位皇后，杨丽华年长色衰，逐渐失宠。宣帝由对她不满，发展到要将她赐死、逼她自杀，加之，杨坚上身高，下身短；脸上较瘦，额头宽大，额上有青筋突出，直通头顶。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五柱入顶”，是“龙颜”“反相”。宣帝对他非常疑忌，派人窥伺他的言行，稍微不慎，便有杀头之祸。在这险恶的境况中，杨坚韬光晦迹，不露锋芒；同时广交深结，以求保全。大象二年（580）五月初，杨坚为了免祸，请友人郑译（内史上大夫）向朝廷进言，让他去扬州任总管，远离京都。正当他即将离京赴任的时候，已成太上皇的宇文赟卧床不起。杨坚见事有转机，决定暂时不去扬州赴任，留在京中观察局势的发展。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章，说自己突然患了脚疾，将赴扬州的日期推迟。宇文赟病入膏肓，复元无望，新皇帝静帝宇文衍才是八岁孩童，须有一名权重名高的大臣辅政。静帝虽然不是杨坚的女儿杨皇后所生，但生母朱皇后原先是宫女，家世低微，亲族中没有辅政人选。杨坚在辈分上，总算是静帝的外公；加之杨坚善于结交朝臣，朋友众多。皇帝身边的重臣多为杨坚好友。在他们的拥戴下，杨坚于大象二年（580）五月十一日入宫侍疾辅政。五月二十五日，太上皇宇文赟死，刘昉、郑译等人假造诏书，命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不久，又以静帝的名义下诏，命杨坚为假黄钺（代皇帝行使职权）、左大丞相，总揽国政。

杨坚揽政以后，采用了各种办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周宣帝的堂弟宇文贤，对杨坚威胁最大，杨坚将他杀死。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总管尉迟迥、郢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互相呼应，起兵讨伐杨坚。杨坚发兵镇压，集中力量首先消灭威胁最大的尉迟迥，使其兵败自杀。不久，王谦亦被部下杀死，司马消难也被打败，率残部逃入陈朝。在揽政期

间，杨坚还多方招纳贤才，得到高颎、苏威、李德林等，这些人后来对杨坚的帝业起了很大作用。杨坚控制了朝野，觉得势力已经雄厚，就策划禅代。大象二年（580）十二月十三日，周静帝下诏，授杨坚随王爵。次年（581）二月十四日，在随王宫门外，举行“禅代”大典，周静帝宣读了“祇顺天命，禅位于随”的诏书。从此，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因杨坚是随王，朝代名拟称“随”；“随”字带“辶”，“辶”的训意为“走”，不吉利，遂决定采用“隋”字。

杨坚建立隋朝以后，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对西魏、北周以后的行政体制和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废除六官制度，在中央行政机构中实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废除郡级机构，改为州县两级制。在官吏选举制度方面，杨坚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代各级地方官的属官全由朝廷委任，同时初步实行开科举人的科举制。法律方面，杨坚称帝后，在多次修改律条的基础上，制定了《开皇律》。规定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废除梟首、车裂等酷刑；灭族只用于大逆谋反以上重罪。开皇十六年（596），杨坚下诏：“决死罪者，三奏然后行。”把批准死罪的权力控制在皇帝手中，以减少杀人数量。在军事制度方面，杨坚对西魏、北周的府兵制进行了改革。杨坚把军人的户籍重新归入州县民籍，改变了兵民分理的旧制，结束了兵农分离的现象，实现了兵农合一。杨坚登上帝位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重新颁布了均田法，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增加赋税。杨坚很重视兴修水利，小工程有决杜阳水灌溉三畴原（今陕西三原县一带）、引灋水灌溉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扩修寿州（今安徽寿县）的芍陂等。最大的工程是开凿广通渠和疏浚山阳渎（邗沟）。

隋朝建立的时候，南北朝形成的分裂局面仍然如故。在长江以南，还有后梁和陈这两个政权。杨坚在国力强盛之后，于开皇七年（587）九月，征后梁主萧琮入朝，并令他带二百余名臣下带着。萧琮刚离开江陵，杨坚令武乡公崔弘度率大军朝江陵开去，占领了后梁国都。萧琮入朝后，杨坚宣布废除梁国，授萧琮为柱国，封为莒国公，存在了33年的后梁傀儡政权灭亡了。开皇八年（588）三月，杨坚发出灭陈诏书。十月，杨坚在首都长安的太庙中举行了隆重的出师大礼。随后派出八路大军，从长江的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陈朝进攻。九年正月，隋军攻入建康，俘获躲在井中的陈后主（陈叔宝），陈朝灭亡。

杨坚称帝后，勤于政事，崇尚节俭，从自身做起，所有车辆物品，都是修补着用。日常膳食，不过一肉。相州刺史豆卢通向朝廷进贡名贵华丽的綾文布，杨坚命在朝堂烧毁，对朝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坚患痢疾，御医配制药物需用



胡粉（化妆品），宫中竟找不到。西宁州（治所越嶲，在今四川西昌市）刺史梁毗（pí）拒绝接收少数民族酋长赠送的黄金。杨坚得知后非常赞赏，将他调至朝廷任大理卿。太子杨勇把铠甲装饰得很漂亮，杨坚一见不高兴，告诫他说：“自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是太子，应以俭约为先，才能奉承宗庙。”杨坚的三儿子秦王杨俊，奢侈铺张，好炫耀华丽排场，超越制度，把宫室建得异常壮丽，杨坚将他免职。一些大臣建议杨坚到泰山去封禅（祭天地），这是盛大的祭祀活动，要动用很多人力物力，杨坚下诏书说：“言及封禅，宜即禁绝！”建隋之初，原陈朝散骑常侍王仪，献给杨坚两名美女。杨坚把他的丑行公布于众，并将他流放到边远荒凉之地。

杨坚崇尚节俭，这本来是好事，但他对节俭的理解和执行过于严酷。杨勇于冬至日在自己的东宫摆设筵席，与官员们欢度（古代冬至也是节日），这本来也没有违背朝廷礼仪。杨坚却担心太子侵犯自己的权力，把朝臣的拥戴吸引过去，形成对自己不利的势力，就发出正式诏书，予以严厉批评，明令禁止。

杨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使亲信宇文述买通朝廷重臣杨素的弟弟杨约，通过杨约说通杨素，让杨素向独孤氏进言，使她下决心并劝杨坚废杨勇。独孤氏的态度，对杨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坚本来心性多疑，在这几方面谗言的联合进攻下，也就疑心杨勇要谋害自己，减弱东宫的卫戍，加强自己的防卫，夜寝不安，心中惶惶。杨勇心性仁厚，在这一些围攻诬陷面前，没有任何越轨行动和对父母的怨词。而杨广指使杨素不达目的决不甘休，把杨勇宫中的生活用品也诬指为造反罪证。

杨坚偏听偏信，终于在开皇二十年（600）十月九日，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宣布废黜杨勇的太子地位，并杀戮了杨勇的亲信官员。随后，立晋王杨广为太子。杨坚在仁寿宫卧病，发现杨广行为不端，并不是合格的太子人选，才后悔废了杨勇，说：“枉废我儿！”“独孤误我！”打算复立杨勇。可这时杨广已经控制了朝政，杨坚的意图无法实施，随即去世。杨广合理合法地继承了皇位。杨广当上皇帝之后奢侈的欲望恶性膨胀，好大喜功超越了民力，遂使杨坚建立的王朝短命而亡。

8. 杨广倡修大运河

杨广（569～618），隋弘农华阴（今华阴市）人，隋文帝杨坚的次子，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天资聪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开皇元年（581），杨广13岁，父亲杨坚当上皇帝，封他为晋王，同时授他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

市)总管。在伐陈的战争中,杨广任行军元帅,统领51.8万大军进攻江南。开皇九年(589)春,攻下陈朝的国都建康(今南京市),灭亡陈朝。不久,隋文帝命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开皇二十年(600)夏,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隋文帝命杨广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名将分道抗击,大获全胜。这时他32岁,已经出将入相,屡建功勋,名声甚高;他的哥哥太子杨勇、弟弟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都不能与他相比。随着他的地位日高,声望日隆,杨广就谋划着夺取太子的位置。

杨广比杨勇有心计得多。尽管杨广非常奢侈,妃子众多,但他很会掩饰自己。在父母面前,装得俭朴忠诚,讨取欢心。一次打猎遇雨,侍从给他披上雨衣。杨广一脸认真地说:“大家都在淋雨,怎么能只让我一个人披雨衣!”说着,伸手取掉。每当知道父母要来他府中的消息,杨广就把众多的嫔妃宫女藏起来,只让几名老而丑的女人服侍自己;又让他的妻子萧氏穿得非常朴素;室中的器物用具摆设得很一般;还故意摆上好久不用的琴,把弦扯断,不让拂去上面的尘土,好像他对音乐根本不感兴趣的样子。

杨广在任扬州总管的时候,每当他离京赴扬州任所之前,在向独孤皇后辞行的时候,总是装得话少泪多,情深难舍的样子,使母亲觉得他非常仁孝。杨广在感动独孤氏之后,给了他的亲信宇文述许多金银财宝,让他进京买通大臣杨素的弟弟杨约,通过杨约说服杨素,让杨素向杨坚进言,劝他废杨勇,立杨广。杨广还指使自己的亲信段达,买通了东宫的幸臣姬威,让他在杨坚面前诬蔑杨勇:

“圣上不让太子奢侈,太子坚决不改,还扬言若有谏者,就要杀头……太子还曾经叫人卜算陛下的寿命,过后说圣上只能活到开皇十八年,快到期限了。”杨坚一听,大为恼怒。开皇二十年(600)十月,杨坚下诏废除杨勇的太子地位。同年十一月,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仁寿四年(604)七月,杨坚在仁寿宫去世,杨广矫诏赐杨勇死,不几天,登上皇帝宝座。

隋炀帝即位之初,就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在营建东都之前,他令调发男丁数十万,自龙门(今陕西韩城市东北)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黄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属河南),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挖了一条长达两千里的弧形壕沟,沿沟设置关防,作为保护长安、洛阳地区的重要防线。大业元年(605)春天,杨广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京大监,于洛阳城西18里处另建新城,名为“东都”。新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洛水横贯城中,周长有73里多。每月征发民夫200万人,星夜赶修,10个月就建成了。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那里居住,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虽然不是国

都，却已成了全国政治、经济中心。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发男丁百万筑长城，西至榆林（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两岸），东至紫河（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二旬告成。第二年，又发男丁20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至榆林郡治。

隋炀帝喜欢读书，重视整理书籍、收藏书籍，又善写文章。大业十一年（615）春，炀帝给秘书省增加官员120名，全部都是学士。他命修撰的书籍内容有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佛、道等等，无所不具，共成书31部，17000余卷。对西京嘉则殿原有的37万卷书，炀帝命秘书监加以整理编次，除其重复猥杂的内容，得书37000余卷，保存在京都修文殿；又命抄了50套副本，分为三品（等），分别保存在西京和东都的宫、省、官府中。那些正本都装帧精美高雅，宝轴锦套。隋炀帝也很重视教育事业。他在即位之初的大业元年（605），就诏令恢复了被隋文帝撤销的国子监（最高学府），依旧置国子祭酒（长官），并加置司业一人。同时把被隋文帝撤销的四门学（小学）和州学、县学也恢复了。

随着南北经济特别是江淮、河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南北物资的交流成为迫切的需要；同时在军事上为加强对东南和东北地区的控制，也需要一条贯通南北的运输线。隋炀帝遂下诏，开凿大运河。此项工程分4段。第一段是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进行开挖。从洛阳的西苑（谷、洛二水相会处）引谷（即涧水）、洛水入黄河，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市高村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入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引汴水以达淮河，至于山阳（今江苏淮安）。这段河道主要是就旧有的浪荡渠（又名鸿沟，在成皋附近）及其下游的汴河加以疏浚而成。第二段是山阳渎。从山阳起，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故道，在隋文帝时疏浚的基础上，再加以疏浚扩大，引淮水至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入长江。全渠广40步，两旁均筑御道，种柳树。第三段是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又发河北军100余万人开挖，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通卫河北通涿郡（治所在蓟，今北京西南郊）。由于丁男不足，征妇女服役。第四段是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开始挖掘，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800余里，广10余丈。

在6年时间里，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至余杭，长达4800多里的大运河开通了，解决了南北航运问题，对繁荣经济、军事运输都有巨大作用。同时，隋炀帝发河北10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另外，还是在太行山，开直道90里，便利了山区交通。但庞大的工程也耗尽民力，大量的民役因为

修大运河身体长期泡在水中，而肌肤溃烂，不治而亡。人民日夜劳作，不堪重负，甚至出现了为避免服劳役而自断手脚的惨剧。隋炀帝生活奢侈，残暴拒谏，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他残暴不仁的统治也失尽民心。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路人马纷纷举起反隋大旗，隋炀帝已无力镇压。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宇文化及趁机发动江都兵变，缢杀炀帝，后葬于江都雷塘。

9. 郭子仪三造唐室

郭子仪（697～781），唐华州郑县（今华州区）人，幼读兵书，苦练武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武举高第，官授左卫长史。他一生经历了七位皇帝，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为将相，前后共六十余年。其中有二十多年系天下安危于一身，为唐朝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智退吐蕃回纥的战斗中有勇有谋，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居功不傲，宽厚待人，处事严谨，是一位由武举起家逐步成长起来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著名诗人杜甫在《洗兵马》诗中称赞郭子仪：“郭相谋深古来少”“独任朔方无限功”。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发所部兵卒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15万众，号20万，长驱南下，陷洛阳，攻潼关。郭子仪被唐玄宗任为卫尉卿、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统兵东讨叛军。他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向叛军后方出击，切断其前后方之间的联系，使叛军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被动局面。十二月，郭子仪率朔方军出单于府（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沿黄河东进，首先收复了静边军（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斩叛将周万顷，将其头颅挂于城墙之上。继而击败了进犯河套地区的叛军大同军使高秀岩部，收复了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东进东陲关（今山西代县东北胡峪山上）。因出兵旗开得胜，玄宗晋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

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唐玄宗命郭子仪回朔方，招兵买马，准备收复洛阳。郭子仪推荐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玄宗允准。李光弼与史思明争夺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激战40余日，无法取胜。于是，郭子仪与李光弼合兵10万出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北井陉山上），一连收复7座县城，直指常山郡。郭子仪从后面包抄，把史思明的两万余名精锐部队团团围住，然后兵分四路，从四门杀进常山城，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常山。史思明率军逃窜，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在沙河（今河北新乐、行唐县河段）追



击，大获全胜，史思明退守恒阳（今河北曲阳县）。不久，史思明退出恒阳城，李光弼率军进入恒阳城内，叛军又杀了回来，反将李光弼围困城中。李光弼请求郭子仪火速援救，郭子仪急率轻骑一万星夜驰来，与李光弼内外夹击，打得史思明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狼狈逃往范阳。郭子仪遂与李光弼屯驻恒阳，深沟高垒，严阵以待。

安禄山听说史思明战败，恼羞成怒，当即选拔了两万精锐骑兵前来迎战。两军交锋十几个回合，唐军愈战愈勇，叛军毫无还手之力。郭子仪、李光弼领兵退守恒阳，一面依托深沟高垒，据险坚守；一面采取“敌来则守，敌去则追，白昼扬兵，夜袭其营”的作战方法，不给叛军喘息机会。几天以后，叛军果然疲劳不堪，士气尽丧。这年六月，郭子仪、李光弼率领仆固怀恩、浑瑊之等将领分左右两翼向嘉山（今河北曲阳县东）叛军冲杀。叛军丢盔弃甲，四散逃窜，唐军大获全胜，杀死叛军4万余人，俘虏5000人，缴获战马5000匹。溃逃中史思明中箭受伤，披头散发，光着脚片，逃回博陵。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河北各郡百姓，几十个州县纷纷杀死叛军守将，迎接唐军。郭子仪、李光弼正待乘势挥师北上，直捣叛军老巢范阳时，传来了哥舒翰兵败丢失潼关的消息，形势急转直下。

唐玄宗出逃四川，长安陷落。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唐肃宗为了收复长安，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八月，郭子仪、李光弼率领5万步、骑兵来到灵武。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十一月，郭子仪与叛军阿史那从礼的军队在榆林境内的黄河北岸交战，歼敌3万人，俘虏1万人，保卫了灵武的安全。

至德二年（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二月，郭子仪率军从洛交（治所在今陕西富县）直取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运城市）。四月，郭子仪被任命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尚书左仆射。九月，郭子仪与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俶率军15万人，又向回纥借来骑兵5000人，由凤翔出发，分三路日夜兼程急进，到达长安香积寺附近。连营为阵，横亘30多里。与10万叛军南北对垒。叛军守将安守忠、李归仁自恃据险设防，兵精将勇，出城挑战。唐军奋勇迎战，回纥兵出其不意从敌后杀出，叛军腹背受击，此战共杀叛军6万多人，生擒2万余人。唐军攻入长安城。京城收复后，郭子仪率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克了潼关，马不停蹄，又向洛阳进军。在新店与叛军相遇。叛军依山扎营，居高临下，对唐军十分不利。郭子仪化劣势为优势，选拔英勇善战的2000名骑兵向敌营冲杀，又派1000多名弓箭手埋伏山下，再命回纥军从叛军背后登山偷袭，他自己则率领主力与叛军正面交锋。在唐军与回纥兵的全力攻击下，叛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安庆绪被迫

放弃洛阳，退守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洛阳收复后，郭子仪因战功加封司徒，并封代国公。随后，郭子仪入朝，唐肃宗带领仪仗队迎至灞上（今西安市东），动情地对郭子仪说：“国家再造，全靠卿的力量啊！”十二月，郭子仪返回洛阳，奉命策划北上讨敌之策。

乾元元年（758）七月，唐肃宗任命郭子仪为中书令。命郭子仪率步骑20万人为主攻部队，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率部为助攻部队，继续讨伐安庆绪。但诸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十月，郭子仪从杏园（今河南汲县东南）渡过黄河，在获嘉（今河南获嘉）歼灭叛军4000余人，围攻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安庆绪倾巢而出，率相州兵7万，分三路救援卫州。战前，郭子仪挑选了3000名神射手藏于墙后，告诉他们：“与敌对阵时，我会佯装败退，贼兵必然追击，到时候战鼓齐鸣，你们即登营垒，万箭齐发，杀退敌兵。”然后，率部分兵将与安庆绪交战。叛军果然中计，被打得四处逃散，郭子仪遂率军追杀，活捉了伪郑王安庆和，收复卫州并进逼邺镇（今河南临漳县西南）。后遇敌于愁思冈（今河南安阳市西南），再战，又大获全胜。唐军前后共歼灭叛军3万余人。安庆绪被九节度使兵将包围在邺城。由于唐军各部不相统属，宦官鱼朝恩又处处掣肘，从冬到春，竟未破城。郭子仪下令凿渠引漳河水，灌入城中。城内成了汪洋，数十日以后，柴尽粮绝。眼看邺城就要被攻破之际，史思明率领5万精兵前来救援安庆绪。九个节度使各自为战，结果唐军战败。郭子仪率军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退保洛阳。其他八个节度使退回本镇驻地。鱼朝恩屡进谗言，诽谤郭子仪，把邺城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郭子仪身上。乾元二年（759）七月，唐肃宗召回郭子仪，免去朔方节度使、诸道行营元帅职务。

郭子仪走后，史思明复占洛阳，朝廷十分恐惧。乾元三年（760）正月，任命郭子仪为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州市）、鄜坊（今陕西洛川）两镇节度使，仍留京城。宝应元年（762）二月，太原、绛州（今山西新绛）两地驻军骚动。四月，代宗即位，任命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诸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这时，郭子仪虽已66岁，仍毅然从命。一到绛州，便果断地擒杀了乱兵王元振等数十人，稳定了局势。八月，郭子仪入朝，宦官程元振疑老将难以驾驭，在代宗面前数次诋毁郭子仪。郭子仪知道代宗受程元振控制，便上书请求解除职务。他说：“臣的功德像蝉翼一样薄，命比鸿毛还轻。臣为唐朝的强大披星戴月，南征北战。东西十年，前后百战。天寒剑折，溅血沾衣。野宿魂

惊，饮冰伤骨。跋涉难阻，出没死生。请陛下相信臣对唐朝的一片忠心。”由于史朝义还盘踞在洛阳，代宗便任命雍王李适为统兵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讨伐史朝义。雍王和郭子仪向回纥借兵10万，同唐军一起打进洛阳。宝应二年（763）正月，史朝义逃往莫州（今河北任丘北郑州），自杀身亡，部将也纷纷投降。安史之乱终于平定。

宝应元年（762），唐将梁崇义自襄州、仆固怀恩于汾州起兵反唐，引来吐蕃、回纥之兵进犯河西（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河西、陇右（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被吐蕃占领。次年十月，吐蕃军攻陷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刺史高晖投降。邠州以北十多个州县的土地被吐蕃军占领。不久，吐蕃军又攻占了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直逼长安。形势严峻，朝廷震惊。唐代宗急任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郭子仪的旧部已交给李光弼指挥，身边仅有20余名人马随行。紧急征兵后，以1万多人面对吐蕃20万步骑。郭子仪请求程元振拨兵增援，可程元振不予理睬。待他急急赶到咸阳，吐蕃军已绕道过了渭河，沿终南山东进，很快就打到长安城下，吓得代宗逃往陕州（今河南陕县）。郭子仪听说后痛哭不已，从咸阳赶回长安。不几天，长安沦陷，禁军多逃往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洛市）。郭子仪只好率3000名骑兵南下商州，收拢逃散的禁军将士。禁军将士听说郭子仪来了，欢呼不止，愿意听从调遣。不过数日，便召集到4000多人。战将张知节在洛南（今陕西洛南县）迎接郭子仪。随后，郭子仪开始大阅兵，驻屯商州，威震关中。此时，代宗担心吐蕃兵出潼关，召郭子仪到陕州护驾。郭子仪对使者说，这次不能奉诏了，不夺得京师，无颜去见陛下。使者回复后，代宗方才心安。

面对强敌，郭子仪运筹帷幄，日夜谋划克敌制胜的策略。他根据敌我双方的兵力、驻防形势，决定采用声东击西、虚张声势的疑兵之计，出奇制胜。郭子仪先派段秀实前去劝说邠宁节度使白孝德，请他出兵助战；再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带领200轻骑前往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县城北面，白天擂鼓呐喊，夜晚点燃火把，牵制吐蕃兵力。然后，郭子仪佯装向蓝田城东进军，但却率领主力奔向蓝田城西。吐蕃军果然中计，直向蓝田城东冲杀。这时，郭子仪快速集中兵力，奋勇出击，在当地老百姓的大力协助下，打得吐蕃军措手不及。加之，屯驻在韩公堆一带的张知节和长孙全绪的一万兵卒，按郭子仪的将令，四处插满旗帜，战鼓此起彼伏，满山遍布篝火，扰得吐蕃兵非常惶恐。在此同时，潜入长安城中的禁军旧将王甫，带人在朱雀街上齐声擂鼓，四处高呼：“郭令公率大军来啦！”喊声震天，吐蕃兵惊骇不已，便不战而退。唐军顺利地进入长安。郭子仪

任京城留守。

长安收复后，程元振劝代宗建都洛阳。郭子仪向代宗上书说：“长安地势险要，前有终南山作屏障，后有泾、渭二水，右连陇、蜀，左接崤、函，可以雄视四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长安经过几朝的建设，宫殿华丽，市场繁荣，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经济富足。长安是创立帝业的基地，秦汉两朝占据长安而称帝，隋炀帝放弃长安而灭亡。而洛阳地贫民饥，人烟稀少，千里萧条，亭舍不烟，残垣断壁，不易防守。请陛下慎重考虑。”代宗看完奏章，便对左右官员说：“郭子仪所言，都是从朝廷的安危出发呀！我西去长安意已决！”广德二年（764）十二月，代宗从陕州回到长安。郭子仪伏地请罪，代宗命令停住车驾，安慰他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于是，赐郭子仪免死铁券，并在凌烟阁悬挂郭子仪画像。

郭子仪的部将仆固怀恩，曾在安史之乱中立过战功。因不满朝廷对他的待遇，在汾州叛变。广德二年（764）正月，代宗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兵马副元帅兼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节度使，镇抚仆固怀恩。不久，仆固怀恩带领300轻骑逃往灵州，利用谎言向吐蕃、回纥借兵10万，从灵州进发，一直攻到奉天。代宗命郭子仪率领10万大军征讨。郭子仪率兵来到奉天，命令全体将士坚守阵地，以逸待劳，坚壁清野。仆固怀恩见郭子仪军队严阵以待，自己后方给养又供应不上，便不战而退。

永泰元年（765）五月，代宗任命郭子仪都统领河南道节度行营，出镇河中。八月，仆固怀恩再次勾结吐蕃、回纥、党项、吐谷浑、羌兵30万众南下，进犯长安。行军途中，仆固怀恩得暴病死于鸣沙（治所在今宁夏青铜峡市西南黄河东岸）。吐蕃、回纥叛军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长安北边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长安受到严重威胁。于是代宗亲征，诏李忠臣屯兵渭桥，李抱玉屯兵凤翔，郭子仪自河中移师泾阳，而郭子仪所有兵力仅万余人。来到泾阳，敌人已成合围之势。郭子仪一面吩咐将士构筑防御工事，不准跟叛军交锋；一面派探子侦察敌情动态。当得知吐蕃、回纥两军开始分营扎寨，争权夺势的情况后，郭子仪决定采用分化敌人的办法。派牙将李光瓚去见回纥都督药葛罗，表示愿和回纥共同打击吐蕃。

回纥的将领，过去跟郭子仪一起打过安史叛军，为唐朝立过大功，对郭子仪很是敬重。当天晚上，李光瓚偷偷地来到回纥大营，药葛罗听说郭子仪还活着，今在泾阳，十分惊奇，半信半疑，便对李光瓚说：“如果郭令公真还活着，能让我看看他吗？”李光瓚回来把这番话告诉郭子仪。郭子仪为了劝退回纥，决



定一个人去回纥大营。他对将士们说：“回纥兵多，我们兵少，很难用武力战胜。过去唐朝和回纥曾订过互不侵犯盟约。我亲自去说服他们，共同打吐蕃。”将士们都觉得这是好办法，但又认为太危险，提议派500名精锐的骑兵保护他。郭子仪坚决不同意，说：“不行！带这么多的兵去，反而会坏事。只要几个人陪我去就可以了。”说着，就命士兵牵过马来。刚要动身时，他的儿子郭晞跑来拦住他的马说：“父亲是元帅，怎么能这样到虎口去冒险呢？”郭子仪果断地说：“现在敌人兵多，我们兵少，要是真的打起来，不但我们父子两人生命难保，朝廷和百姓也要遭难。我去，如果谈判成功，则国家幸甚。如果我捐躯报国，还有你们在嘛！”说着，扬鞭抽打儿子拉马缰的手，喝令他：“走开！”便和十几个随从兵士，骑马冲出了军营。随从兵士一边奔走，一边叫喊：“郭令公来了！”“郭令公来了！”回纥士兵远远望见有几个人骑马过来，又隐约听见骑马兵士的吆喝声，连忙报告都督药葛罗。药葛罗和其他将领大吃一惊，命令士兵摆开阵势，拈弓搭箭，准备迎战。郭子仪及其随从来到回纥军营门前，翻身下马，摘掉头盔，脱去铠甲，放下刀枪，沉着地向回纥营中走去。药葛罗和将领们望着来人真是郭令公，便一齐翻身下马，放下武器，下拜参见。郭子仪上前握住药葛罗的手说：“你们回纥曾经为唐朝立过大功，唐朝待你们也不错，为什么要帮助仆固怀恩叛乱呢？今天我单身到这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你们敢把我杀死，唐军会跟你们拼命的。”药葛罗抱歉地说：“令公别这样说，我们受了仆固怀恩的骗，以为皇帝和令公都已亡故，中原没有主人，才跟着他来到这里。现在知道令公健在，哪会同你打仗呢？”郭子仪问道：“我们决心回击吐蕃，你们能帮助我们吗？”药葛罗连连点头答道：“我们一定出力，将功补过。”接着，郭子仪叫药葛罗派人拿来酒，先端起一杯，把酒洒在地上，起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谁若违背誓言，就叫他死在阵前！”药葛罗也跟着起了誓，洒了酒。双方订立了联合抗击吐蕃的盟约后，郭子仪便带领随从返回营地。吐蕃营听到郭子仪单骑访回纥营的消息，连夜带着兵卒逃走了。郭子仪派朔方兵马使白元光与回纥军联合追击，自己率大军紧随其后，在灵武附近西原破吐蕃军10万余众；斩首5万，生擒1万余人，收缴其掠走的百姓4000人及绵延数百里的牛羊驼马。郭子仪犒劳了回纥将士，回纥军随之撤回。

郭子仪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非常时期，统领大军南征北战，东荡西讨。凡遇危难，欣然受命，锐身赴任，亲解其纷。郭子仪治军向来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身正气，恩威并重，因此受到官兵的拥护与爱戴。每当郭子仪奉命调动，部下总是力求挽留。郭子仪唯恐部下生事，每每都要再三叮嘱，部下也都注意维

护他的统帅地位和崇高威望。郭子仪之子郭晞镇守邠州时，部下自恃功高，胡作非为，被都虞侯段秀实斩首。兵众要求郭晞带兵攻打段秀实，危难之时，段秀实单枪匹马来到郭晞大营，对郭晞言道：“郭老令公一世英名，不要被这几个散兵给败坏了。”郭晞深怪自己不明利害，险些酿成大错，毁坏了父亲一世英名，从此严格管教部下。大历三年（768）二月，郭子仪发布命令：禁止官兵无事时在营中骑马奔驰。郭子仪夫人的乳娘之子犯禁，都虞侯用乱棍将其打死。诸子不服，向郭子仪哭诉，遭到痛斥。郭子仪说：“你们只知道袒护自己家里的人，却不尊重将士，不维护军队的纪律。”儿子们受了训，谁也不敢再吭声。

正当郭子仪在平叛前线作战之际，鱼朝恩派人挖了郭家祖坟。郭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忧其为变。不料郭子仪在满朝文武面前边哭边说：“臣久在外打仗，不能禁暴，手下兵士常挖别人的祖坟。如今有人挖了臣的祖坟，此天谴，非人患。”纷争遂解，朝廷乃安。大历二年（767）二月，郭子仪过70大寿，家中大小都来贺寿，唯独郭暖之妻升平公主未到，小两口为此争吵。郭暖随口说出：“你依仗你父是皇上。老实告诉你，我父不稀罕当皇上。”升平公主气极，立即回宫禀告父皇。代宗安慰女儿说：“郭暖说的是实话。假如你公公真的想当皇上，天下岂是咱李家的？”劝慰后，送公主回去。郭子仪听说此事，立即绑郭暖进宫，请求定罪。代宗说：“俗话说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闺房之言，怎么能当真呢？”郭子仪回来，杖郭暖数十棒。

大历十四年（779），唐代宗病逝，遗诏郭子仪在三天治丧期间代理朝政。唐德宗即位后，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建中二年（781）六月十四日，郭子仪在长安长乐坊家中去世，终年85岁。唐德宗为此废朝五日。赠太师，特许其陪葬肃宗陵，坟头比同等官职者加高1丈。

郭子仪为朝廷屡建奇功，赢得朝野人士的尊重，甚至连皇帝也不直呼其名。安史旧将田承嗣占据魏州，欺压百姓，郭子仪派部将前去见他。田承嗣一见来将，西望而拜说：“此膝不拜于人已有多年了，今要向郭公下跪。”李灵曜盘踞汴州（今河南开封）时，不管公物私物，只要经过汴州，一律扣留；唯对郭子仪的粮草一路放行，还派遣卫兵护送出境。北宋嘉祐六年（1061），华州于少华郭子仪祠内，刻勒题为《唐尚父汾阳王郭忠武王碑》石碑一通。元大德五年（1301）修建的韩城北周原村大禹庙内，供奉着郭子仪夫妇塑像，与大禹一起祭祀。1995年4月，华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南大门广场建成四柱三门式牌楼，居中镌刻“敕建汾阳王祠”，右侧镌刻“功盖天下”，左侧镌刻“再造唐室”，并嵌有《重修郭子仪牌楼铭记》碑，供人们瞻仰。

10. 杜甫与渭南

杜甫（712~770），字子美。他和李白同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在文学史上，把他们合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就下苦功夫读书作诗，7岁时就写过颂凤凰诗。从20岁起，开始漫游生活，足迹遍及吴、越、齐、赵、梁、宋。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天宝五年（746），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来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受到这样挫折的杜甫，闲居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豪华奢侈的生活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便用诗歌控诉这种政治黑暗和社会不平现象。

杜甫和渭南的关系主要有两层：一是杜甫在华州任过职；二是杜甫的舅父先于他任白水县尉，他常去看望舅父。杜甫在渭南活动期间，正值安史之乱爆发，山河破碎，黎民涂炭，他满腔悲愤，写下大量诗篇。其代表作多数是在渭南写下的。

天宝十四年（755）秋，杜甫从长安去奉先（今蒲城县）、白水，把家属安置在奉先。此间，写下了《沙苑行》《白水明舅宅喜雨》《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桥陵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等诗。后返回长安，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尉，他不去，改任为左卫率府胄曹参军。这年冬天，他又去奉先，将沿途见闻、自己经历和家庭遭遇联系起来，写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一诗。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名句。

天宝十五年（756），杜甫来往于白水、奉先、鄜州一带，把家眷移到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南）。这年夏天，杜甫从奉先到白水，依附舅父崔十九。在这里写下《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一诗，记述舅父的高斋清宴。六月，安禄山率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逃到四川。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只身往投肃宗，途中被叛军捉住，送到沦陷后的长安。至德二年（757）夏，唐肃宗到了凤翔。杜甫逃出长安到凤翔，穿着一双麻鞋和露着两肘的衣裳，拜见肃宗，肃宗授他左拾遗。这年秋，杜甫去鄜州羌村探家，路过白水，写下《彭衙行》一诗，追述上年去鄜州路过白水的景况：“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一句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野果充糒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冬季，唐军收复长安，肃宗返京，杜甫便带着家属来到长安。

乾元元年（758）秋，杜甫为在咸阳陈陶斜打了败仗的宰相房琯上疏说情。

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掌管官员、考课、祭祀、礼乐、学校、选举、表疏医筮、丧葬等事。时值安史之乱，尽管个人遭遇不幸，却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到华州任所后，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华州区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解难。相继写下了《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瘦马行》等诗，抒发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谏的感叹和愤懑。还写下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减轻百姓负担献策。当讨伐叛军的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下了《观安西兵过关中待命二首》诗，表达其爱国的激情。

这年晚冬，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探亲。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大战邠城，唐军溃败。唐王朝为补充兵力，便在洛阳以西至潼关一带，强行抓人当兵，百姓苦不堪言。这时，杜甫正由洛阳经过潼关，返回华州任所，耳闻目睹了这次官军惨败后人民罹难的痛苦惨状，经过艺术提炼，写成组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在《无家别》一诗中，他写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贼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这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遭受饥饿威胁，写下了《夏日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立秋后，他怀着“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的心境，抛弃官职，全家迁移，在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同谷一带几经淹留，又在荒山寒峡之间，经过千辛万苦的跋涉，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造了一座草堂，过着隐居生活。后经剑南节度使严武推荐，杜甫被朝廷任命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杜甫又带着全家向东流亡。大历五年（770）冬，杜甫病死在湖南耒阳的小船上。

11. 诗坛圣杰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醉吟先生”，又称“香山居士”，唐华州下邽县（今渭南市临渭区北部）人。白居易的曾祖父白温在长安任检校都官郎中时，将家从韩城迁至下邽县下邽里（今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西关村一带）。唐大历七年（772）正月二十日，白居易生于其父白季庚为官的郑州新郑县（今河南省新郑县）东郭宅。白居易少年时受家庭影响，五六岁便学



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几岁便写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贞元十五年（799）秋，白居易在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县）试作《射中正鹄赋》《窗中列远岫诗》，为宣歙观察使、宣州刺史崔衍所贡，往长安应进士试。次年中进士，时称青年才子。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三十二岁，参加了“拔萃科”的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入第四等。但因出言太直，不得为谏官，而授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元和二年（807）秋天，白居易调任京兆府考官，试毕，任命为集贤院校理。十一月四日，翰林院派人带来五道制诰的题目，让白居易撰写制书。白居易写成的制书，符合宪宗旨意，第二天授翰林学士。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遗任满应当改官。因在任上直言上书，言辞激烈，宪宗多有不悦。白居易迫不得已上《陈情状》，以“臣母多病，臣家素贫”为名请求改授京兆府判司，结果授京兆府户曹参军。元和六年（811）四月三日，白居易的母亲陈氏病逝于长安宣平里第，时年五十七岁。白居易遵礼丁忧，率家人扶灵柩回到下邳故里。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忧期满，宪宗诏他再度入朝，授左赞善大夫职务。第二年，平卢（治所今山东东平县西北）节度使李师道密派中岳寺僧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白居易即刻上疏请捕杀刺客。但朝廷一些权贵借口白居易不是谏官，越位上书与法制不合。宪宗听信了这些话，便任白居易为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刺史。王涯复上疏言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作《赏花》《新井》诗，有伤名教，不宜治郡，宪宗就贬他为江州司马。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转升忠州（治所今四川省忠县）刺史。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卒，穆宗即位。夏，白居易自忠州诏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接着又升为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夏，白居易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这时，河北一带兵祸复起，白居易屡上书论事，都遭到穆宗的驳回。白居易的政治策略得不到采纳，便决定离开长安，上书请求外任。

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长庆四年（824），白居易任期已满，诏为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元年（825）三月四日，白居易受诏改任苏州刺史。二年九月，白居易眼病久治不愈，免郡事休官。大和元年（827）春天，回到洛阳。三月征任秘书监，赐金紫，复居长安新昌里宅。冬，奉使洛阳。次年春，白居易从洛阳返回长安，任刑部侍郎。

大和三年（829）春，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五年（831）被诏为河

南尹。七年（833），白居易任太子少傅。会昌元年（841）春，罢太子少傅。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给半俸。六年（846），白居易身体每况愈下，卧病不起。八月，去世，时年七十五岁。朝廷赠他右仆射衔。十一月，葬于洛阳龙门东边的香山上。

白居易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目的，广泛的内容、明确的主题、清新的风格、质朴的语言以及客观的描绘与警语式的说理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乃是白居易诗歌创作极为鲜明的一个特征。他的诗歌在当时影响深远，在两都、六宫、八方乃至海外近邻各国无不传唱，士庶、僧徒、孀妇、处女无不咏歌，乡校、佛寺、旅驿、行舟无不传抄。特别是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两首长诗流传得就更为普遍了，故当时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吊白居易》）的诗句。这两首长诗不但在当时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就是对后来的文学也有显著的影响。如元曲中的《梧桐雨》《青衫泪》，清代戏曲中的《长生殿》等等都是在《长恨歌》《琵琶行》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白居易的作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通俗派的一面鲜明的旗帜”。白居易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诗集《白香山集》，以及采经传百家言之精英，以类分门所编的《六帖》，后来均被收入《四库全书》。

白居易一生与下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故乡有所作为的是任校书郎后至江州司马前的十二年，特别是为其母丁忧守孝的三四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白居易绿化环境，种树植桑；扶犁下田，从事农作；深入百姓，察看社情；安葬先辈遗骨，建立白氏陵园；勤于笔耕，作了大量诗文。虽时间不长，但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白居易一生的作品共编撰为75卷，其中诗作3840首。他在下邳的诗赋文作，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据考，白居易在下邳和怀念下邳的诗文共264篇，其中在下邳所作共141篇（诗132首，赋1篇，文8篇）。他在下邳作的《纳粟》《采地黄者》《村居苦寒》等诗篇，思想性、人民性都很高。而《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特别是《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则都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境界。

会昌四年（844），已经七十三岁的白居易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件善事。他晚年客居的洛阳龙门潭的南面，有一段水路，叫作“八节滩”“九峭石”，是一个天然的石滩，阻碍舟楫上下的去路，往来的船只经过这里，常常触石遇险。在大寒之日，舟人也要赤足下水去推拉渡筏，因此，常常“饥冻有声，闻于终夜”



（《开龙门八节滩诗二首并序》）。白居易听到这种声音，总是很难过。于是他倾自己多年积蓄，开凿了龙门石滩。完工时白居易作了《开龙门八节石滩二首并序》题刻于石上。其二云：“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在洛阳龙门香山修有白园，以供人们瞻仰。

12. 寇准澶渊退敌

寇准（962～1023），字平仲，北宋华州下邽县（今渭南市临渭区北部）人。他为官40年，清廉正直，不拘节微而善谋大事，政绩卓著，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及彪炳青史的一代名相。

北宋王朝北部边疆与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辽国接壤。宋太祖年间，辽国即累犯边境。宋太宗即位后，与辽国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长期成对峙状态。真宗在位，辽军对边境骚扰频繁不断。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兵南犯定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并俘虏了大将王继忠。景德元年（1004）八月，辽放纵游骑在涂县、祁县一带攻略城池，边关军情吃紧。真宗闻报后，坐殿问计于大臣，时任宰相寇准奏道：“这是贪图大宋国土的劫掠行为，意图是试探朝廷动向，请圣上立即传旨操练军卒，选拔将领，守住要塞，防备敌人进攻。”九月，边境军情连连告急。此时，宋朝重兵多在河北，调往边关很费时间，寇准与毕士安商议奏请真宗御驾亲征，以振军威。寇准还请真宗驾临澶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越快越好。不久，辽兵大举入侵，劫掠威虏、顺安、北平，侵犯保州（治所在今河北保定市）。前线军情一天五次送往汴京。寇准知道后却一言不发。真宗大惊而问及寇准，寇准却说：“陛下欲了此事，五日以后你便知晓。”真宗便将原属枢密院职权的军旅大事交于寇准和毕士安二人处置，并当面叮嘱说：“卿当详细闻知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而有所隐也。”此时，参知政事王钦若、签知枢密院事陈尧叟等惧怕契丹兵势凶猛，秘密奏请真宗将京城迁往金陵（今南京）或成都。真宗主意未定，问寇准当如何对待。当着二人的面，寇准斥责说：“谁为陛下出此主意，罪在当斩。现在，朝廷国力昌盛，将相协和，若陛下亲征抗敌，契丹必败。即使坚守城池，以逸待劳，挫其锐气，也是胜券在握，何以抛弃祖宗社稷而远走楚、蜀之地。如果南迁京师，则人心崩溃，贼兵乘势深入，天下则难保平安。”一席话使真宗御敌主意已决，一面调兵遣将，指派杨延昭、杨嗣等分兵把守边城，监视辽兵；一面秣马厉兵，备战亲征。

十月，辽兵沿葫芦河向东侵犯，并抵瀛州、祁州等地，宋军守将奋力抵抗，杀退辽兵。月末，真宗下诏随驾军士先赴澶州。十一月，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统大将萧达揽领兵20万侵犯贝（治所在今河北省清和县）、魏（今河北省大名一带）等地，真宗起驾北上，寇准随驾而行。行至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辽师兵势正兴，随驾朝臣中原来主张迁京城于金陵的再次奏告真宗迁都，致使真宗北上信心动摇。真宗召寇准询问，寇准启奏说：“群臣怯懦，与乡村老人、妇女一样无知。眼下敌人骑兵迫近，河北军民日夜盼望陛下御驾到来，若稍有退意，敌人将乘势进攻，金陵亦不可保！”真宗听后仍犹豫不决。适逢殿前都指挥使、太尉高琼在驾前伺候，寇准悄悄问他：“太尉深受国恩，今日怎样报国呢？”高琼立即说道：“高琼为一武夫，愿以死报国。”寇准便与高琼二人晋见真宗，寇准大声说：“陛下不以臣的话为是，请问太尉。”高琼立即奏道：“寇准的话确为良策。眼下敌师锋芒受挫，我军士气正旺，况且随驾军卒父母妻儿都在京师，必然不肯弃之而去。愿陛下从速驾幸澶州，臣等愿效死疆场，契丹不难破也！”寇准也趁势奏说：“机不可失，宜速进兵。”真宗身边另一武将王应昌也说：“陛下奉天命讨贼，所向必克，如逗留不进，恐敌势更加猖狂。”这才坚定了真宗北进的决心。不日，兵至韦南县，诏令澶州北寨将帅及知州不得擅离职守迎驾。澶州城分南北两城，中间有一小河相隔。到了澶州南城，真宗以驿舍为行宫，兵不过河。寇准奏道：“陛下车不过河，人心不安，敌兵锐气不减，何以取胜？眼下王超已领兵扼守中山，李继雄、石保吉两位大将扼其左右两肘，各方援兵也即将到达，何以不再前进呢？”高琼命军士保护真宗车辇过河后，登上北城门楼。城下各路宋兵望见城上御盖麾旗，士气为之大振，欢呼声闻数十里，辽军闻之丧胆。几日之后，辽兵数千骑兵进攻北城，真宗下诏迎头痛击，各路宋兵斩获辽兵大半，其余狼狈逃窜。至此，真宗已将一切军务大权悉数委任寇准执掌。寇准成竹在胸，处险不乱，在两军对垒时，还与翰林学士杨亿饮酒下棋，谈笑自如。真宗皇帝知晓后，暗自说道：“寇准如此坦然，吾又何忧也！”

两军相持十余日，辽统军萧达揽恃其勇而以轻骑视察地形，被宋军威虎军头领寿光、张瑰所设的弓箭手射中头部而死。辽军士气再次受挫。至十二月，辽国萧太后派使者韩杞密请真宗议和，并提出领土和金帛要求。开始，寇准不许，致辽国使臣多次来澶州请求。真宗也产生了厌战情绪，他对寇准说：“所言得地，事极无名，若必强求，朕当决战；若以每年金帛济其不足，亦无伤国体。”寇准对送金帛之事不同意，想让辽国称臣。但真宗却以不忍生灵重陷战事而准予议和。加之，一些贪生怕死的朝臣，纷纷在真宗面前进言说寇准主战，是为了借



机提高自己的身价。在无奈的情况下，寇准同意与辽国议和。真宗派亲信曹利用出使辽国，并授意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每年向辽赠送百万金银绢匹。寇准在曹出使前，将他召至帐前说：“虽然皇上许你百万付辽，但若超过30万，回来我要杀你的头。”曹利用到辽国后，果然以每年赠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而议成约。至此，辽国引兵退去，真宗也班师回京。当时，朝廷有人议论说每年给辽人30万过多，毕士安却说：“不如此，则议和之事恐不能久也。”“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边境安定了百年之久。

13. 瑞泉先生南大吉

南大吉（？～1541），字元善，号瑞泉，明代渭南田市里（今渭南市临渭区官道乡）南家村人，武宗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授户部主事，先后担任员外郎、郎中职。幼时颖敏知学，稍长治《礼》，兼通《易》，然有豪旷，不拘小节。

嘉靖二年（1523年），南大吉以部郎出任绍兴知府。当时同为知府的靳塘在任已久，十分熟悉郡中利弊。南大吉刚到任时，每每有事前去向他咨询，但靳认为他是一介书生，对他比较轻视。南大吉却韬光养晦，私下详细考察，表面上装作对郡中利弊毫不知情。三个月后，他亲自登堂为政，“饬教条、颁属邑，惩奸除暴，不挠贵势”，剖析事情明决果断，令人慑服。由于他亲力亲为，致力于铲除奸佞、扶兴正气，属下官吏有被人诬陷的，定能明察秋毫，还其清白。无论为官为民，凡有作奸犯科的，必会将其绳之以法。其时有一个名叫俞孜的诸生，父亲早年流徙充军的时候，被毒致死，而杀人者徐铎却逃之夭夭。俞孜从外地运回父亲的尸体，悉心安葬后，发誓要为父报仇雪恨，然而“踪迹数十郡不可得”。后来得悉徐铎已偷偷返回乡里，于是结交大力士十数人，佯装卖鱼，往来侦伺，查看动静，同时乞助于知府。南大吉对其忠义之举十分感慨，经过一番缜密部署，他派遣了几名健卒与俞孜一同前往。半夜时分，俞孜突然率人进入杨氏（徐铎夫人）家里，与差卒一起将徐铎捆绑起来送交官府，依法给予惩办。郡中石天禄、戴显八等巨豪窝藏盗贼，往届官府都对其毫无办法，南大吉却不畏权势，将他们逮捕归案，历数其昔日作奸犯科种种罪状，依法处置，大快人心。凡“因不决者”，一经南大吉审讯，立即就能明悉情状，办理结案。他每次惩办重囚，“必朱衣象简，秉烛焚香，大开重门，令众见之，望见者以为神人不可犯”。有学士侵吞王羲之、谢灵运的故地，南大吉经过实地调查后，将这些故地全部判归原来的主人。

运河附近的府河跨山、会两县界，纵横贯穿于城中，皆通舟楫，因被势家豪族侵占多年，日渐淤塞壅窄。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令民众疏浚河道，恢复交通，并下令拆毁两旁六尺左右的庐舍，以加宽河道。与此同时，又派人疏通挖深开上灶溪等，筑坡塘以备旱涝，首尾相通二百余里。又在其边上兴建碑亭、禹庙，立大禹陵碑，亲书“大禹陵”三字刻于其上，笔力遒劲，气势不凡，至今仍矗立在大禹陵前。由于他的辛苦努力，当时虽旱涝相继，而收获、运输却如往常，极大改善了百姓的经济生活。

嘉靖五年（1526）八月左右，南大吉力兴建稽山书院，创建尊经阁，布召所辖地区的才俊讲读其中，有时自己也身亲讲习。当时王阳明在城中讲学传道，南大吉前往听其讲学，开始犹未信，久而久之才领略到心学的深奥义理，于是亲自备上厚礼拜会王阳明，这就有了著名的三次问教王阳明的故事。后将其与王阳明论学的书信整理成《传习录》，使其刊行于世，一时间文人士大夫争相传阅，后来竟在社会上蔚然成风。王阳明讲学于越，四方学子云集景从，都依赖于南大吉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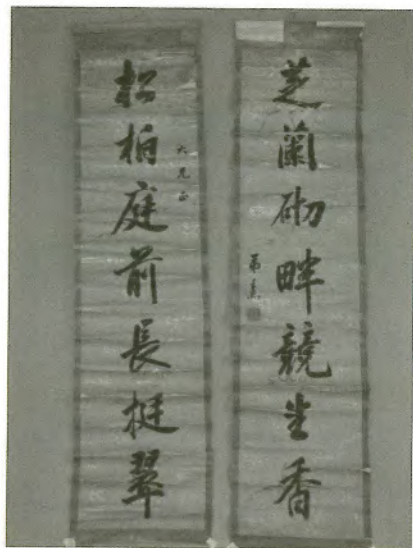
南大吉为政严猛，喜欢任事，不避嫌疑，遭到权贵豪强的嫉妒。史载“执政者方恶文成之学，因文成以及先生也”。他不断遭到打击报复，甚至在京师，到处都是对他肆意诽谤、大加指责的言语。他仍致书王阳明，“惟以不得闻道为恨，无一语及于得丧荣辱之间”。王阳明也感叹“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不能也。”终因迫不得已，于是奏请罢官而归，以避其烦。然其在任期间“锄奸兴利，郡民德之”的一系列正义之举和浩然正气，却赢得了百姓的赞誉。至今，在江浙一带民间仍流传着一些关于南大吉治郡、修庙、题碑的故事。

同年，南大吉回到渭南家乡筑建酒西草堂，宣讲阳明之学，以教四方来学之士。南大吉的父亲南金，曾花费三年时间，编撰《渭南志》，未成而卒。他临死的时候，流着泪将未竟之业托付给长子南大吉，但南大吉当时担任绍兴知府，无暇顾及。嘉靖二十年（1541），应渭南知县辛万均之请，南大吉决定续撰《渭南志》。他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和弟子们一起“旁搜博考，包罗兼括”“分类校勘”，历时三月，终于在当年秋撰成。河南按察使李宗枢为之作序，称其为“实录”，赞誉南大吉“有良史之才”。

此外，南大吉还著有《瑞泉集》《绍兴志》等书。

14. 王杰经国处世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园，别号畏堂，清韩城县（今韩城



王杰书法

市)城郊庙后村人,出身贫寒农家。乾隆九年(1744),在县考、府考中均名列第一。历佐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皆得到器重。

乾隆二十五年(1760),王杰在乡试中夺得解元。次年,中第十名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前两人都是南方人。乾隆亲阅考卷,又询知人品,对王杰特别赏识。殿试时,乾隆出一上联:“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谁为摘星手?”要求三名考生应对下联。王杰从容不迫地答道:“春芍药,夏牡丹,秋菊冬梅,我乃探花郎。”乾隆十分高兴,将王杰拔置第一,即授为翰林院编

修。陕人自清初以来一百多年无大魁,时值西陲戡定,适得奇才,乾隆亲自作诗以纪其事:“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当时有个山东举人不服,当面出联:“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章出东鲁”,要王杰配对。王杰脱口而出对道:“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在西秦”,那人一听,甘拜下风。

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1774~1782),王杰历任工、刑、礼、吏部右侍郎,左都御史等职。四十九年(1784)授兵部尚书。五十一年(1786)任上书房总师傅、军机大臣。五十二年(1787)正月授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事务。五十三年和五十四年,清政府分别平定台湾和廓尔喀,王杰因策划有功,两次绘像紫光阁。

王杰任上书房总师傅时,太子颙琰(后来的嘉庆皇帝)时常背不过书,他严加教训,还罚跪罚站。一天,乾隆察看书房,适逢太子被罚跪。他立即叫儿子站起,还非常生气地对王杰说:“教也是天子,不教也是天子,你这样处罚,是臣对君应有的态度吗?”王杰大声说:“受教的成尧舜,不受教的成桀纣,师傅的作用就是这样啊!”皇帝一听,大为震惊,马上叫太子继续跪下,并且对王杰安慰勉励了一番。与王杰同朝的和珅是乾隆的宠臣,以御前侍卫晋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官领侍卫内大臣兼理藩院尚书事,又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管理户部,权势煊赫,贪污大量钱财,且事多擅自决断,同僚多隐忍不言,有的巴结奉迎。每天上朝,文武大员都要夹道迎送,形成“人墙”。而王杰向来不迎送,且遇不可之事,据理力争,议政结束,常默然独坐。一次,和珅拉住王杰的手戏言

道：“状元宰相，果然好手！”王杰回答：“杰手虽好，但不会聚敛耳。”和珅无趣，怏怏而退。皇帝深知王杰耿直廉洁，使和珅虽心怀嫉恨而不能加害于他。

嘉庆元年（1796），王杰以病请求退去上书房、南书房、军机处及兼管礼部各职，得旨，允其所请，专在内阁看章疏。四年（1799）正月，乾隆病逝，王杰总理丧仪。给事中王念孙首劾和珅不法情状，嘉庆下旨将和珅革职拿问，委派王杰为首席裁判，查核和珅种种罪行。升堂审讯时，和珅走上堂来，昂首阔步，威风不减，一见主审官是王杰，马上软瘫下去，直呼“祈求大人恕命”。王杰主持定下和珅20条大罪，皇帝将和珅赐死。二月，充实录馆总裁。五年（1800），76岁高龄的王杰以病乞休，嘉庆下诏挽留，并特许拄杖入朝。六年，充会典馆正总裁。七年，两次以病请求退休，嘉庆方允其所请，加太子太傅衔，在籍食俸。

王杰为官，性喜简淡，生活俭朴，他私事出门，不坐官轿，只一骑一仆，穿戴与百姓无异。待人接物，和蔼友善，见老人鞠躬，见友人作揖，见一般人点头。他说：“我虽宰辅，亦常人也。”他没有公差，不赴官宴，在家粗茶便饭，绝少鱼肉。住宅只有两进，没有花园，且是自己出钱所盖。他的门生见他非常清贫，便以礼馈赠，他正色道：“今若受馈，何为官？”他常告诉家人：“吾先人严谨节约，予伊等以不饥，足矣！且吾亦无长物以貽子孙，若不自检制，吾不能斤斤为豢养计，亦非吾所能庇也。”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王杰欲归故里。他为官四十余年，所有之物，仅几十箱书而已。起程之期，嘉庆帝赋诗二首，并亲书条幅，以宠其行。诗中说：“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标直节永贞坚。”“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这是对他一生的恰当概括。归韩城后，王杰每有陈奏，嘉庆帝总是亲自批答，语言和婉，有如家人。

嘉庆九年（1804）十月，王杰与夫人程氏80双寿，皇帝命陕西巡抚方维甸带礼品上门拜贺。十一月，王杰赴京谢恩。次年正月初十，病逝于京邸。嘉庆帝评谕他：“先朝耆旧，久直内庭，忠清劲直，老成端谨。”随即晋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号“文端”。祠联是：“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直道一身，敢斥邪恶。”

15. 王鼎尸荐林则徐

王鼎（1768～1842），字定九，号省厓、省厓居士，又号威实。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初三，生于蒲城县城内西街之当铺巷（今达仁巷）一个书香之家。王鼎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累迁至内阁学士。王鼎性情耿直，不好与同僚交往，更不去巴结重臣。《清史稿》本传称：“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十六日，黄河在祥符（今河南开封市）附近决口，淹及5府23州县。七月四日，王鼎奉命偕兵部侍郎慧成前往筹办，并以林则徐富有治河经验，且曾为东河河道总督，熟悉情况，荐留林则徐襄办河工，幸得允准。十二日，自京出发，不时冒雨而行，约在月底前后抵达。初到祥符，大水茫茫，城墙危急。他亲自率兵卒日夜巡护，始保无恙。一些官吏不思治河，借口水势太大，建议迁祥符府治，“以避其冲”。王鼎上疏，分析水情，陈述利害，说“自古无任黄水横流南趋之理”，以74岁高龄立下治河军令状：“期以冬春之交，集事不效，愿执其咎。”

水患当前，而河署人员却生活奢侈，进食仍有燕窝。王鼎生气地说：“食以充腹，吃这干什么！”却之不用，并且告诫河督巡抚，要彻底戒除奢侈，杜绝浪费。到了隆冬季节，河署人员穿着紫貂猢猻，犹畏严寒，不愿到工地。王鼎年逾七十，却穿着羊皮，每天天不明就来到工地，晚上才回来，饥饿时就购买民夫的食物充饥。随员们劝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这样刻苦自己呢？”王鼎叹口气说：“这么大的工程，这些下苦的差役，整天光着脚奔波于风雪水土之中，才是真正出力下苦的人啊，而他们的衣食怎能比得上我们。当今西方各国正在伺机侵犯边疆，皇帝在宫中睡不安，战士在海上日夜警戒，大臣们怎能贪图安逸呢！”王鼎这些以身作则的言行传到民工中，民工个个受到感动，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工效成倍提高。大堤合龙的日期快到了，但决口水深十数丈，引河高于决口，水不能泄。有人主张改期合龙，王鼎不同意，说：“不合龙，水口就是我的死所！”并移坐水口日夜督工，星宿露餐，八个昼夜没有回自己的寓所，以至积劳成疾。上下同心，众志成城，翌年二月初八大堤按期合龙，“引河亦通畅东注，全黄悉归故道”。数十年后，“豫皖之民，至今德之”。工期仅用了6个月，省银600万两，其“财用之节，成功之速，前此未有也”。王鼎因在工实心实力，经理得宜，赏加太子太师衔。

从道光十一年（1831）起，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把大量鸦片运入中国，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并使白银源源外流。道光十八年（1838）文武官员为是否禁烟开展大争论，湖广总督林则徐数次上奏，驳斥弛禁谬论，申明严禁主张。王鼎力主禁烟反击外来侵略，在禁烟运动中是一位居于特殊地位，有着特殊贡献的重要人物。是年九月初八，王鼎同各大学士拟定了禁烟章程。十一月初十，林则徐抵京。十一日至十八日，道光皇帝八次召见林则徐，

商讨禁烟方略，并授钦差大臣，奉命赴广州查禁鸦片。行前，王鼎专门设晚宴饯行，勉励他为国除弊。林则徐“同时两荃臣，悲歌向苍旻”的诗句，表达了两人的深厚友情和忧国忧民的心情。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在内外压力下转变禁烟立场。九月，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由钦差大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王鼎力保林则徐，“至以死生就争之，卒为忌者所持，不能得”，还遭到排挤、疏远。翌年四五月，邓廷桢、林则徐相继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琦善一心议和，撤除海防工事，解散壮勇，致使英军占领香港、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战死。琦善被革职解交刑部，王鼎参与审理，以“守备不设，失陷城塞”罪，判处斩监候，待秋审后处决。此时，恰逢黄河在祥符决口。王鼎保举林则徐与自己同治水患，以便其治水立功，被重新启用。因此，在奏报河工进度时，特意另奏：“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治河工程告竣，王鼎料朝廷会论功行赏，林则徐的“罪行”可借此大事化小。在庆贺工程竣工的宴会上，王鼎高兴地请林则徐居首座，一起放怀痛饮。忽传谕旨到，谕曰：“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对此，林则徐似乎有精神准备，而王鼎却甚感意外，气愤难平，决心返京后，继续抗争。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中旬，当林则徐离河工登上戍途时，王鼎挥泪送别。林则徐也感慨万千，赋诗二首相赠，一面劝慰“元老忧时鬓已霜”，“休为羈臣怅荷戈”；同时对前途也寄予期望：“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涕滂沱”，“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

王鼎回朝后，正值清军屡次被英军所败，投降派在朝廷占了上风。正月底，朝廷派耆英、伊里布赴浙江求和。四月九日，英军攻陷乍浦，清廷即派伊里布，随后又派耆英与英军议和。王鼎不顾年老体弱多病，放弃休假，坚持上朝议事，力主抗英，反对议和，每当“语及议和，公垂泪操秦音争之强”。他强调一味对敌主和，迁就让步，只能助长其侵略气焰；如果订立割地赔款条约，不仅国家损失惨重，且有失天朝大国尊严；如果恶例轻开，其他各国纷纷效尤，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多次向皇帝“力荐林则徐之贤”，强调林则徐人才难得，应得到重用。同时，王鼎还主张严惩投降派的罪魁祸首穆彰阿和琦善。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均系满人，亦是道光帝亲信。他们把持朝政，力主妥协议和。琦善在广州时，“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被革职问罪，穆彰阿百般庇护，为其开脱罪责。王鼎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和穆彰阿面对面地进行斗争，上朝时一见面，就正义凛然，痛斥其诬陷林则徐，包庇琦善，是非不分，功过不明，处理不公，岂是堂堂首辅所为。



又大量揭露其破坏禁烟，一味主张妥协让步，不思抵抗，欺上瞒下，误国害民的罪行。有时，王鼎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和忌讳，在道光 and 众大臣面前，对穆彰阿“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盛气诘责”，“斥为秦桧、严嵩”。对王鼎义正词严的无情揭露和怒骂，“穆相笑而避之”，“默然不与辩”，好像确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不搭腔，不应战，消极对抗。有时，道光帝不得不出面调解，借口“卿醉矣”，命太监将王鼎强行搀扶下去。退朝后，王鼎还常“抚案不食，断断辩府中，愤发大骂，同列不悦，上亦稍稍厌之”。这时的道光帝已完全倒向投降派一边，不仅对王鼎的忠谏听不进去，甚至一些重大决策，也“不必令王鼎知之”。对此，王鼎别无他方，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苦谏。

四月二十九日最后一次上朝，王鼎仍力保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道光帝有意把话岔开，说王鼎病体未愈，可多调养数日，何必如此着急。王鼎仍不顾一切，继续申述自己的意见。道光帝生气，起立欲去。王鼎着急，牵住皇帝的龙袍大声说：“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道光帝恼怒，拂衣而去。

第二天上朝时，皇帝不再召见王鼎。王鼎欲与穆彰阿继续辩论，但久等无果。回寓后，深感木已成舟，无力回天，气愤难平，遂决定效法春秋卫灵公时史鱼尸谏的做法，以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抗争。四月三十日晚，他写好遗疏，大意是：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先开，穆不可用，林不可弃。将遗疏揣于怀中，自缢于圆明园寓邸。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王鼎慷慨献身，以警示世人，欲挽狂澜于既倒，丹心昭昭，堪为千古诤臣。次日，侍者发现王鼎自缢，正在惊慌失措时，军机章京陈孚恩来到寓邸。陈系穆彰阿死党，因未见王鼎上朝，心知有异，前来探视，并发现遗疏，知“尸谏”对己不利，遂违反规定，在未“奏闻得旨”的情况下，私自将尸体解下。这时王沆也从城内赶来，陈孚恩恐吓王沆说：“上方怒，甚不愿再闻此言。若奏之，则尊公恤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王沆被迫同意陈孚恩将遗疏偷换成一般的谢恩折，以王鼎病故搪塞过去。五月一日，王鼎被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皇帝派成郡王载锐前往祭奠，赏银1500两经理丧事。初六，灵柩入城，皇帝派军机大臣、左都御史何汝霖代为赐奠，并谥号“文恪”。后道光帝又谕赐恤文、祭文、碑文，其中对王鼎病故之说也有疑问：“何期数日之间，竟作千秋之诀。”但他未深究，只隆重祭奠，优厚抚恤，并将王鼎之大学士位空缺，长达三年，以示笃念之意。

林则徐自祥符与王鼎分别，起程西行，当年四五月间到达西安，因安置家眷、治疗疟疾等原因，在西安停留两月有余。其间得知王鼎噩耗，十分震惊和悲

痛，作有悼诗、挽联，以寄托哀思。他“伤心知己千行泪”，并赞扬王鼎“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泪难禁”；他以史鱼尸谏、晋卿祈死与王鼎之死相提并论：“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对王鼎的尸谏壮举深信不疑，并给予高度评价。其时，魏源（1794~1857）的悼念诗则更加直言不讳：“身后被谁焚谏草”，“尸谏谁闻古荅臣”。王鼎尸谏一事，“清史不书，墓志不述”。对此，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为王鼎的墓志碑石书丹的山西寿阳人祁寯藻愤然写道：“史传不能载，孤愤盈万口。直哉史鱼节，纯臣心可剖。”

16. 阎敬铭修河坝设义仓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清末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一带）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户部主事、湖北按察使、山东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

阎敬铭不仅忧国忧民，尽职尽责操劳国事，而且还为本乡本县办过不少好事。如办义塾、置义田；捐款给华原、西河两书院；创行“鱼鳞比片”，把朝邑全县耕地分成六等编造“鱼鳞册”，按地的好坏纳粮，合理负担。有两件事至今仍为人们熟知和称道。其一是倡修“丰图义仓”。光绪三年（1877）关中大旱，同州、朝邑一带饿死者不计其数，特别是沙苑地区几至路断人绝。阎敬铭闻知，急回朝邑调查，他目睹惨象，忧心如焚。一方面迅速奏报朝廷立即拨款调粮实施救济；另一方面反复思考防旱备荒的长远办法，终于想出了修仓储粮、逢灾救民的妙招。随即亲自察看构图，选定朝邑县城西边南寨子高坡上为建仓地址。他匆匆回京，详写奏章，得到朝廷批准，令陕西官员抓紧施工。对于粮仓建设，阎敬铭多次写信做出详细筹划。主张“逐年积钱，逐年修廩。贱谷之年买以储之，以12年之力为之，期予有备无患也”，“修仓款项，必令交代清楚。不清者，即禀官查之”。省内有人提议，可借此机会把仓城与朝邑县城连接起来，阎又致函陕西中丞鹿传霖及王力斋等：“仓窑工程，无不赞拜诸兄实心实力，精勤备至。接连县城，工浩费巨，诚如来示，诸不易为。先就南寨修墉，就地为垛可乎？”他还就买粮的时间提出具体建议：“新谷早买必霉，晒干上市，总须至十一月买之，方可久存。到十一月，若谷价十分便宜，可多出钱买谷。”不久粮仓建成投用，在当地赈灾救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阎敬铭逝世后，当地人民感念其功德，在近仓处修建了“阎公祠”，慈禧亲书“龙虎”二字，刻于祠门两边的斜壁上。

其二是倡修河坝救赵渡。阎敬铭家居朝邑赵渡镇东街，黄河、洛河从赵渡



东西两面流过，于镇南面交汇。时两河不断侵蚀，使赵渡东、西南三面被水包围，只有北面剩余很窄的陆地通道，似“金线吊葫芦”之势。阎在北京闻知此讯，即致函陕西省宪：“赵渡已三面临河，如北面黄、洛两河再归并一起，必被全部淹没。”“请托省宪立即设法在赵渡镇北两河岸边分别筑起拦水坝，绝不能让黄、洛河汇并，酿成惨祸。”省宪接函后，即拨巨额资金，委派道员宫尔铎速为督办。从中条山采运石料，于镇北田子村黄河西岸修拦水坝五处，镇西北洛河东岸急流处修拦水坝两处。两边坝内十余米都竖立许多木桩，用石灰砂浆灌死夯实，使两河再不能肆虐侵蚀。这些拦河坝不仅救了当时赵渡危难，且保障以后黄、洛两河流向固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阎敬铭上疏反对慈禧续修颐和园被治罪，光绪特别加恩，将阎敬铭“革职留任”。十三年十二月，开复革职留任处分。自十月至十四年三月，因病屡请开缺，皇帝赏假三次。七月再提出奏请，遂准其开缺。十五年，上疏请求返回原籍，得到允许，遂返回朝邑故乡。十八年（1892）卒，谥号“文介”。

17. 李仪祉关中兴水利

李仪祉（1882～1938），原名协，字宜之，蒲城县马湖乡（今属洛滨镇）富源村人，是现代著名水利学家。他创办学校，编写教材，培养了大批水利人才；大步推进了全国的治黄理论和方略，并参与长江、淮河、扬子江等全国的水利建设与河流治理，写出专著、专论200余部（篇），充实和发展了水利工程理论，为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李仪祉是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1年至1938年历届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顾问、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为振兴中华的水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李仪祉的父亲李桐轩、伯父李仲特都是秀才。父亲李桐轩偏重于文史科学，曾任省咨议局副议长、省修史局总纂、易俗社社长，伯父李仲特则喜欢数学、天文、地理等。两人都淡于功名，志在学以致用，拥护三民主义竭诚拥护，同为同盟会员。1896年，李仪祉开始接触西方科技图书，对《九数通考》《西学大成》《梅氏丛书》等译本爱不释手。1890年，李仪祉赴同州赶考，名列榜首。1899年，李仪祉远离家乡到泾阳崇实书院读书。1901年，李仪祉考入宏道高等学堂，结识了于右任。1904年，李仪祉考入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前身）师范馆及预科德文班学习，先后攻读了德文、物理、化学、定量分析、地质、矿物、几

何、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等功课。1908年，李仪祉毕业，获得举人衔。

1909年春，李仪祉受西潼铁路筹备处派遣，前往德国深造。1912年初，李仪祉回国。1913年，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赴欧洲考察，李仪祉陪同前往，随后留在德国进入丹泽工科大学攻读水利专业。经过两年的学习，学院特别授予他“特许工程师”称号。

1915年初，李仪祉第二次从德国留学回来。国内一片混乱，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李仪祉有感于国家水利建设人才的匮乏，离陕赴宁，参与张謇主持的河专建校工作，并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1917~1922年，李仪祉在河专的七年中，辛勤治学，任劳任怨，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水利人才。有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全国工程建设中的中流砥柱。1922年夏，李仪祉从南京回到陕西，主持陕西省水利事业。这时陕西连年兵火，旱兆已成，陕西的一些有识之士在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等的支持下，在三原县设立了渭北水利工程局，策划引泾事宜，聘李仪祉为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他一上任，一面抓紧处理水利局各项事务，一面抓紧时间查阅泾河流域的各种资料。他经常和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扛着测量标杆，背着仪器翻山越岭去视察河道。从1922年秋至1923年冬，他曾数次跋山涉水，反复勘测泾河河道。每到一处，都亲自测量水位，几次落入水中，却毫不在意。1924年春，他再次组织泾河探险队，深入泾谷，在数百里无人烟的穷乡僻壤，往返测量达俩月之久。他就测绘结果，并拟订了切实可行的引泾计划。这时西北兵荒马乱，加上当局不重视水利，引泾费用没有着落。1930年，李仪祉兼任省建设厅厅长，在杨虎城（省政府主席）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下，陕西省政府为发展水利拨款四十万元，李仪祉筹划多年的引泾工程终于破土动工了。泾惠渠西起泾阳县西，引泾水东流，注入洛水，这正是古代著名的郑白渠遗址。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渭北水利工程委员会。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泾惠渠第一期工程于1932年竣工，二期工程也于1935年完工。灌溉面积由一期工程的50万亩扩大到70余万亩。当地农民称颂道：“李先生真是开天辟地的真活佛，是我们农民的福星！”

1932年泾惠渠第一期工程竣工不久，李仪祉就开始了渭惠渠、洛惠渠以及关中地区其他水利工程的设计、筹备工作。他为关中地区筹划了“八惠”：泾惠、渭惠、洛惠、梅惠、黑惠、涝惠、沔惠和汭惠渠。1933年，渭洛工程继起，八惠各渠依次萌动。陕南、陕北各渠也纷纷开始兴工。由于疲劳过度，他终于病倒了。重病之际，仍念念不忘渠事，对各渠工程的进度、农民灌溉的情况殷殷垂询，并继续派员勘测洛河。当资料送到他手中时，他连坐在床上都很吃力，只好

躺下听取汇报，并口述自己的意见。被水利界的同人们誉为“枕上方略”。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仪祉的病情稍有起色，便又开始工作。得杨虎城的再次鼎力相助，洛惠渠开始动工。1934年，在努力推进泾洛二惠渠的同时，他又开始组织测量渭河河道，亲自督导每一步骤，使工作进展神速，测量、设计工作于当年12月完成。1935年春，渭惠渠破土动工。这年夏天，阴雨连绵，渭河暴涨，拦河大坝被洪水冲毁。正在病中的李仪祉拒不接受亲人的劝阻，冒雨前往工地，亲自指挥大坝的修复工程。在他的感召下，大家齐心协力，昼夜奋战，一座拦河大坝又巍然屹立在滔滔渭水之中。到1936年12月，渭惠渠一期工程完工。一年后，二期工程也告落成。

在陕南，李仪祉几经勘测，亲自拟订了汉惠、褒惠、涇惠、冷惠四条渠的工程计划。在陕北，他设计了织女渠、定惠渠工程。织女渠可灌溉榆林、米脂、绥德三县土地近万亩，堪称陕北水利之前驱。

李仪祉生命不息，治水不止，惠遍三秦，为陕西人民造了福，为中华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

18. 杨虎城主政陕西

杨虎城（1893～1949），原名彪（音忠），号虎城，1929年后，以号行。陕西蒲城县人。16岁时，村民自发组织中秋会，以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为宗旨，杨虎城为首领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领中秋会一部分人参加了秦陇复汉军，1914年授编为蒲城东乡民团，同年秋，杨虎城杀死恶霸李桢，从此在当地名声大震。1915年杨虎城率部参加了靖国军，移驻临潼栌阳镇。1922年靖国军失利后，杨虎城率部到达延安，与井岳秀联系，杨部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杨虎城暂时脱离部队，住在榆林。在榆林期间，杨虎城认识了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通过杜斌丞结识了魏野畴。1924年1月，杨虎城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4月，杨虎城受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所请，率所部5000人移驻西安。同年5月至11月末，镇嵩军刘镇华率部围困西安城达8个月之久，军民牺牲巨大，史称“二虎守长安”。

1927年2月，杨虎城在西安就任国民军第十路总司令，不久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随冯玉祥出潼关东征。1929年，杨虎城脱离冯玉祥，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接受蒋介石的指挥。1930年11月，杨虎城率部复入西安，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主持陕政重视教育和水利事业，政绩显著。在抓教育方面，主要做了五件事。一是实

行教育经费独立。当时民穷财困，省财政收入每年最多1200万元。他压缩军费，拨出专款作为教育基金，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专款专用。使教育工作者的生活得到保障，改变了辛亥以后20年教职员工工资七折八扣长期拖欠的情况。二是扩充省立各中等学校学生名额，任用进步青年中的知识分子担任校长，把过去教育界的一批人有计划地安排到行政部门，以避免新旧力量的矛盾或发生学潮。三是提倡学术自由。让各种学术（包括马克思、列宁的学说）都可以公开讲授。四是资助进步青年出国留学。在日本的有王炳南、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健、刘佛吾，在德国的有郭则沉、江隆基、韩鲁，在法国的有潘自力，在英国的有原政庭、蒲克敏、亢心裁等。有些人如王炳南、江隆基、潘自力等，他明知是共产党员，但仍信任不疑。五是创办尧山中学。1933年他被蒋介石撤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无权过问地方教育以后，自己出资在故乡蒲城县创办了尧山中学。尧山中学历时70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杨虎城任用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建设厅长。当时李仪祉任导淮委员，兼工务处处长，还兼任浙江省建设厅顾问。杨虎城多方争取，李才就任新职。随后即着手起草泾惠渠工程计划。工程资金除由省政府拨出水利建设专款以外，并请当时的华洋义赈会合作解决。整个工程历时两年，建成后可灌田50万亩，后经扩充，达到70万亩。接着，又建成了洛惠渠工程，可灌田50余万亩。另外，还有渭惠渠等6项工程，有的建成受益，有的进行了设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策动兵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通报全国。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后，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同年11月底被骗回国，从此与世隔绝，历时12年之久，于1949年9月17日晚11时被害，时年56岁。

19. 杨钟健创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笔名强健、健、铁弹子等。出生于华县（今华州区）龙潭堡（今少华乡）一个农家。父亲杨松轩，是咸林中学创办人。杨钟健1910年毕业于华州教育会附设高等小学堂，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后转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1917年赴北京求学，先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1919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1923年夏，杨钟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接受老师李四光的建议，同年10月赴德国留学。次年正式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随布罗利



(Brolli) 和施洛塞 (Schosser) 专攻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 杨钟健获哲学博士学位 (当时西欧学自然科学得博士学位, 授哲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发表后, 立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誉, 被认为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诞生的标志。

1928年春, 杨钟健回到北平, 在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任技师。同年夏, 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 并主持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他早期的工作, 主要是研究华北的新生代地质。这时期发表以关于周口店各地点及华北新第三纪的哺乳动物群, 主要是啮齿类、兽形类等小哺乳动物化石, 偶蹄类及大量有关新生代地层、地质发育史的论著, 成为中国这方面研究的经典著作。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 工作重点逐渐转到爬行动物化石和中生代地层方面。较早的重要工作是关于山西武乡和中瑞考察队采集的新疆、内蒙古的二齿兽类和白垩纪恐龙的研究。从1929年到1934年, 杨钟健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古哺乳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方面, 成为中国哺乳类化石和新生代 (特别是第四纪) 地质研究的奠基人。从1934年起, 他研究的重点, 逐步转向爬行动物。1936年和1937年杨钟健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的两任理事长, 并获葛氏 (葛利普, 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 纪念金质奖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和北平沦陷后, 杨钟健得知日本侵略者要“聘请”他去东京“讲学”的消息, 即抛妻别子, 南下长沙, 辗转至昆明, 任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 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名誉教授。在昆明的几年中, 他开始了云南禄丰蜥龙动物群的发掘和研究。经过他的深入研究, 把卞氏兽从哺乳类划分到了爬行类, 使爬行类化石研究真正成为他的主要活动。这一研究成果, 使禄丰动物群成为世界上研究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脊椎动物和古地理的一个经典与标准的化石地点。1940年夏, 杨钟健被聘为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脊椎古生物组主任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同年10月, 他随昆明办事处迁到重庆, 兼任重庆大学名誉教授。1944年4月杨钟健赴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一些国家考察, 走访了许多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中心, 特别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观察标本, 与沃森 (Watson)、格雷戈里 (Gregory)、罗默 (Romer)、辛普森 (Simpson)、科尔伯特 (Colbert) 等许多专家共同探讨, 并完成和开始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著作。从而使他成为当代国际上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一位古脊椎动物学者。

1946年3月, 杨钟健回国, 继续在地质调查所工作, 同年冬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 次年春, 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48年秋, 杨钟健出任西北大学

校长，抵制了胡宗南将学校迁至成都的图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等职。195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以更激奋的心情和更旺盛的精力，投入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从山东莱阳恐龙化石——青岛龙，到中国的假鳄类——山西鳄，包括基型爬行类（Stemreptiles）与各种统治爬行类和形迹学（Ichnogy）方面，他都做了大量工作。这个时期，他对中国二迭纪到早第三纪爬行动物的形态、分布和系统发育方面的发现、修改和补充，对动物地理、系统发育、动物群及层位对比上的填补、充实、修订和整理概括，使人们对中国以至全世界这些方面问题的认识产生了重大的改变。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杨钟健平生著学术论文六百多篇（册），其中有《中国三迭纪水生爬行动物》《中国北部啮齿动物化石》《古代的生物》等二十多部专著。

八、美丽渭南

1949年6月，渭南全境解放，步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迅速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广播等各项事业相继步入正轨，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7年，全市生产总值按可比价计算，比1949年增长了90.24%。1978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渭南经济步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1991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34.24%、35.86%、29.9%，第二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占比提高，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市各项改革持续深入，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渭南经济由总量扩张向规模、质量与效益并重型转变，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2017年生产总值现价达到1656.62亿元，比上年增长8.3%。生产总值增速加快，近年来逐步达到和超过全省、全国平均增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2017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0260元，较1978年增长8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808元，较1978年增长74倍。

1. 农产品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渭南粮食面积占陕西省的16%左右，商品率16%~22%。随着农业技术条件的不断改善，特别是交口抽渭及薛峰、石堡川、沈河水库等一批重要水利工程的建成投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稳定提高。20世纪60~70年代，渭南成为陕西省占首位的



石堡川水库

农产品生产大区和商品粮主要产区。1978年，合阳、大荔、华阴3县被确定为全国商品渔业基地县。大荔、渭南、蒲城、富平4县先后确定为国家优质棉商品基地县。

20世纪80年代，农业规模迅速增长，内部结构调整逐步展开，种植业以粮为主的局面逐步改变，经济作物比重增加，林、牧、渔业快速发展，渭南成为陕西省商品粮、油、肉、蛋和水产品生产基地。粮、棉、油、肉总产分别达到171.9万吨、5.7万吨、7.6万吨和4.1万吨，均比1978年增长了47%以上，其中肉增长一倍以上。“七五”和



百万头生猪大县——养猪场一角

“八五”计划期间，国家投资1970万元在渭南开展商品粮基地建设，蒲城、富平、韩城、渭南、合阳、大荔、澄城7县（市）确定为国家商品粮基地。陕西省政府再次确定渭南、华县、华阴、大荔、合阳、澄城、蒲城、富平、白水9县（市）为省粮食基地县。渭南市（今临渭区）成为全国30个商品粮大县之一。20世纪90年代，开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生产逐步走向产业化。种植业追求“高产、优质、高效”，大面积推行塑棚、地膜等设施农业，畜牧业推行规模化和集约化养殖。林业推行农田林网化，成效显著，被林业部评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地区”。连续五年，两千多名科技人员下乡推广实用技术，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农产品科技含量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进入21世纪后，农业发展亮点纷呈。农业技术进步成效显著，农业产业结构、区域布局和产品质量不断优化。2002年5月，科技部正式批准设立“陕西渭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此后，以农业新技术引进推广为主的现代农业园区在全市迅速发展起来。2017年新增市级园区10个，市级园区达61个，新建园区面积3933.33公顷，园区面积6.13公顷。近年来，伴随着西部现代农业先行区建设的加快推进，粮食、果菜、奶畜等特色农业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2000年至2017年，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总产量增加到211.54万吨，增长12.92%；优质专用小麦、地膜小麦和地膜玉米种植快速发展，被确定为国家优质小麦生产基地。蔬菜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增长3.22倍和5.92倍，设施蔬菜面积占55.81%。持续推



韩城醉美椒林

进优果工程，水果总面积25.7万公顷，建成全省最大的绿色果品生产基地、最大的果品冷藏基地，全国最大的果汁加工出口基地。被国家有关方面命名为“中国苹果之乡”“中国酥梨之乡”“中国枣乡”“中国柿乡”“中国果业品牌建设突出贡献奖”“中国优质果品示范

基地”。持续开展现代畜牧业示范县、镇、村创建活动，实施生猪、奶牛、肉鸡、肉鸭、奶山羊五大产业示范区和陕西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建设，引进和培育雨润、正大、新希望、石羊等一批畜禽养殖加工龙头企业，推进畜牧业规模化、标准化，全力打造西部乃至全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成养殖小区284个，规模养殖场（小区）1750个，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户2万户。2017年全市存栏生猪、牛、羊、家禽分别达348万头、42万头、150万只、2520万只。以核桃、柿子、红枣、花椒为主的经济林快速发展，被中国经济林协会命名为“中国花椒之乡”“中国核桃之乡”。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和层次不断提高，成为农民增收的重



正大饲料

要渠道。基本形成以华州区、大荔县为主的瓜菜产业带，以白水县、澄城县为主的特色果业产业带，以富平县、澄城县、临渭区为主的特色养殖产业带；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65个，其中省级企业88个，国家级企业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初期的大荔县振强果业专业合作社1家发展到6253家。

2. 能源原材料工业大市

1949年，渭南境内工业非常弱小，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5.44%；以日用工业（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另有少量煤炭采掘和建材生产，轻、重工业产值比为7.3：2.7。20世纪50年代，各县普遍兴办农机具修造企业，恢复了一些小煤窑，新建了一批面粉、食品加工企业，工业增长速度加快，1949年至1957年8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50年代后期，国家决定兴修三门峡水库，将渭南的朝邑、潼关、大荔、华阴四个县335米高程以下列入淹没区。全国156项重点工程，在陕西布局24项，处于陕西东大门的渭南，受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影响，没有布局工业建设项目，仍然以农业为主。工业生产处于小规模、低水平的发展状态，1957年至1965年8年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了68.64%；结构更趋轻型化，1965年轻、重工业产值之比为7.9：2.1。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对三门峡水库运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国家和陕西省在陇海铁路沿线和渭北煤田布局了以民用机械、煤炭、电力、冶金为主的建设项目，地方也投资建设了轻纺、建材、化工、食品等工业企业，逐步形成了渭南工业的雏形。这一时期相继建成投用的重要工业项目有渭北三大煤田，秦岭山区的钼矿、金矿，韩城电厂和秦岭电厂，黄河工程机械厂、渭南印刷机器厂、渭南纺织机械厂、西北林业机械厂、陕西压延设备厂、光华棉纺织厂、陕西省化肥厂等。这些项目的建成，极大地提高了渭南的经济实力，工业获得快速增长。1965年至1978年13年间，工业产值增长了6.55倍。这时期工业门类增多，产品增加，部分机电产品和钼精粉开始出口。1974年重工业产值首次超过轻工业产值。1978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

20世纪80年代初，国营工商企业简政放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被冲破。连续十年辖区工业产值以11%以上的速度增长。80年代末，渭南被列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组成部分，继续兴建了一批电力、煤炭和化工企业。1990年，辖区工业产值为528601万元，与1978年比较，增长了1.37倍。轻、重工业产值之比为3.5：6.5。基本形成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工业产品达到3000多种；其中发电量91亿度、煤炭1089.4万吨、黄金1573.1公



斤、钼精粉1.09万吨、小型拖拉机5842台、合成氨9.3万吨、棉纱1.8万吨、坯布7673万米。1980年起，在国家开展优质工业产品确认的10年中，渭南境内先后有“西岳牌”阿斯匹林等6个产品获国家银质奖，480汽油发动机等26个产品获部优产品，AJS402型塑料薄膜四色凹印机等186个产品获省优产品。优质产品群体的出现，成为渭南工业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渭南工、交和商贸企业普遍推行产权制度改革，采取多种方式对部分经营困难的制造企业开展产权置换和重组。制定多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发展中外合资或独资企业，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对传统、落后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地、县（市）、乡镇及个人投资兴办了一批纺织、造纸、家具、食品、服装、卷烟和工艺品等制造企业，提高了农产品的加工深度。200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93.25亿元，其中，轻、重工业比值以及能源、原材料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值十多年来基本稳定。

进入21世纪后，中共渭南市委、市政府着力推进工业强市战略，走以新型工业化促现代化的振兴之路。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实际利用市外资金由2000年的2.1亿元提高到2017年的738亿元。引进帝亚一维、美联桥汽车、中国酵素城核心区、牧原、碧桂园、恒大地产、洽川二期、陕化节能技改、中联重科工程机械、拓日太阳城、68万吨烯烃、黄河矿业等一批大项目，中国海外投资集团等一批央企在渭南投资。把发展工业园区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拥有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个国家级开发区和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1个省级开发区，设立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等11个重点县域工业园，入园企业905户。“关小上大”，优化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污染治理与节能减排，2017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减煤141万吨，散煤消减202万吨，万元GDP能耗较上年下降5.65%，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通过股份制改造、出售拍卖、兼并、破产、承包、租赁等形式对482户国企进行改制，占全市国企总数98.4%。2006年开始，国企改制重组步伐加快，相继对渭南市金矿、陕西红岭机械厂等27户国企依法实施破产。12年来，工业规模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17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达到2113.6亿元，较上年同期提高19.2个百分点。累计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00.04亿元，增长9.7%，较上年同期提高3.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增长1.5个百分点；产值过亿元的企业超过100个，龙钢集团成为全市第一个产值过百亿元企业。五大支柱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3.04%；其中冶金工业占38.11%，能源工业占32.65%，食品工业占9.38%，化学工业占7.04%，装备制造业占5.86%。能源、原材料工业强势发展，占比超过

75%，产品有50多个种类。主要产品产值增长迅速，2017年，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冶金、非金属工业产值分别为670.06亿元，282.20亿元，240.30亿元，401.14亿元，129.22亿元，分别较2016年增长17.1%、25.3%、54.7%、40.4%、10.6%，成为陕西省重要的能源基地，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黄金产量居全国第三，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华夏金城”；钼生产能力亚洲第一，被中国矿业协会命名为“中国钼业之都”。

3. 密集便捷的交通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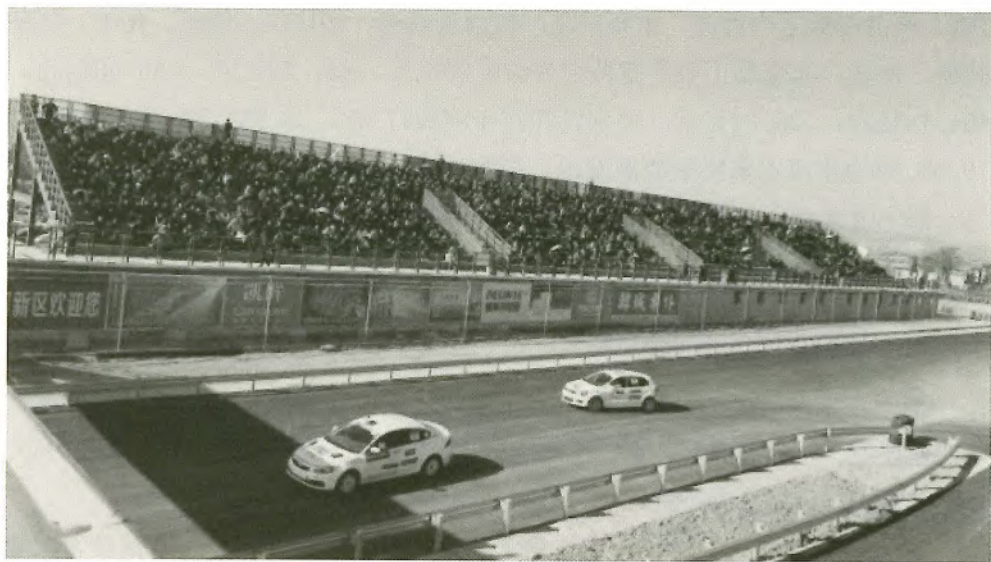
渭南市承东启西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境域的重要交通地位，这里，自古就有“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之誉。至渭南全境解放时，有公路6条，通车里程796公里；铁路2条，总长160公里。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对公路干线进行整修取直，部分公路铺设为煤渣路面或混结石路面。1970年，210国道铺设沥青路面，为渭南沥青路面的发端。1978年，境内铁路增至4条，公路通车里程3504.6公里，其中沥青路面940公里。基本实现乡乡通公路，县县通铁路，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大规模开展沥青路面铺设。1995年，公路总里程4769公里，其中沥青路面达到2320公里，县（市、区）通往243个乡镇的公路全部实现油路化；98.6%的建制村通上了公路。

90年代中期开始，坚持改建升级与以农村公路为主的新建并重的公路建设方针，建设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99年，历时5年的“二级公路网化工程”全



高速公路



2018 中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

面完成，共将5条主骨架公路新建改建为二级公路，总里程469.6公里，完成投资8.5亿元，实现二级公路的网络化。此后，公路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2005年，全部乡镇通行客运班车。“十一五”计划期间，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完成投资162亿元，是“十五”时期的8.77倍。西禹高速公路、西潼高速公路改扩建、渭蒲高速公路及郑西高速客运专线铁路相继竣工通车，干线公路改造后通行能力全面增强。新增农村公路1.17万公里，相当于“九五”和“十五”总和的3.8倍；全部建制村、70%以上的自然村通上水泥路或沥青路。2011年至2012年又有潼关县城至华阴段二级公路等一批项目建成通车，韦罗高速公路、108国道渭南至大荔一级公路改造、沿黄公路（S211）等一批重要公路工程开工建设。建制村通班车率达到98%以上。2017年，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1.94万公里，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149公里；平均万人拥有公路36公里，公路网密度148.648公里/百平方公里，居中国西部地区之首。有陇海、侯西、西延、宁西4条干线铁路，咸铜、南同蒲、梅七、下桑4条支线铁路和郑西高速客运专线铁路过境，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有铁路5.2公里，是全国平均数的5倍多。另有专线铁路40多条。全市以渭南城区为中心，以8条铁路和3条高速公路、3条国道、6条省道为骨架，以县、乡、村公路和专线铁路为脉络，基本形成四通八达、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密集便捷的交通网络，成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有力保障。

4. 生态文明

造林绿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有计划的造林绿化活动，持续开展60多年，其形式不断创新，规模越来越大，成为渭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50年代，随着各级林业机构的逐步健全，境内植树造林活动得以普遍开展起来，年平均整片造林5187公顷；同时，“四旁”植树作为川原地区造林的主要方式得到大力推广。60年代开始，各地兴办了一批集体林场，推动了山塬地区的植树造林活动。1970年，各县开展山、水、田、林、路、电综合治理，川原地区社队开始建设农田防护林网状林带，推进了平原绿化。1977年，地、县以农田林网建设为主，实行农林间作、小片丰产林和“四旁”植树相结合模式，积极开展“平原绿化县”创建活动。1979年，渭北6县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平原区各县加快经济林、水果基地建设。1990年，辖区整片造林保存面积11.2万公顷，平原绿化达到国家林业部标准。森林覆盖率14.5%。11个县（市）全部获“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此后，渭南地区先后3次获“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90年代中期，先后启动黄河中游防护林建设、荒山造林和“三北”防护林三期等重要造林工程。1998年，全市推行“五荒”地和渠路绿化使用权拍卖、承包和租赁到户，大力发展个体造林。至年底，全市有林地面积24.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24.63%。1999年，实施省重点防护林和“山川秀美”两项造林绿化工程；开始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当年完成退耕还林（草）18160公顷。2001年，实施天然林保护、日元贷款造林、“三北”防护林三项造林工程，于2002年完成阶段性任务。2005年，确定以花椒、红枣、柿子、核桃为主的经济林作为全市林业产业化的优势产业加快发展。2007年，以“庭院绿化、村庄绿化、路渠绿化、一村营造一片林”为目标的“三化一片林”绿色家园建设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带动全市平原绿化向纵深发展。2009年，实施潼关陕西东大门、渭南秦岭北麓台塬迎坡面和渭河近堤三项绿化工程，当年，全市造林面积有了较大增长。2010年启动渭南境内连霍高速、西禹高速两条高速公路绿化工程，规划建设近3万公顷、总长283公里的宽幅林带。2012年，以道路、河流水系、城镇、工矿单位、出入境口、景区及直观坡面等为重点绿化区域，强化行政推动，加大资金投入，在全省率先实施大地园林化建设，涌现出一批造林绿化亮点工程。2017年完成造林绿化3.8万公顷，华阴市被陕西省林业厅命名为省级森林城市。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0.73%。

生态保护与建设。1996年开始，渭南市、县两级相继成立了保护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关停取缔了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工业企业，使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至2002年，先后建立了黄渭洛三河湿地、合阳县黄河湿地、大荔县沙苑3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9.75万公顷，保护了大量珍稀动物和湿地生态系统。建立了国家级华山风景名胜区和省级洽川、黄河龙门—司马迁祠风景名胜区。启动建设合阳、大荔2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和合阳县的甘井镇、白水县的尧禾镇等5个市级生态示范试点乡镇及45个生态示范试点村、1038户生态示范户，形成了县、乡、村、户四级生态示范网络体系。经陕西省政府批准建立了沈河水库、薛峰水库、五一水库、箭峪水库4个地面饮用水源保护区和9个市级以下饮用水源保护区。开展专项整治，沈河涵养林保护区和华县、华阴市的南山沙石开采区域生态环境得到保护，潼关县黄金产区生态得到治理和恢复。2004年，实施蒲城县泰陵生态林建设、临渭区线王宋村沟坡治理等5个生态示范点建设，引导全市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广泛开展。2011年，持续开展十多年的农村秸秆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推广活动成效显著，秸秆焚烧现象基本消除。以集中整治“脏、乱、差”和环境设施建设为重点，开展了8年的农村“清洁工程”，初步改善了农村环境面貌。2012年，启动了华阴市及富平、白水、华县4县（市）省级生态县创建工作。2017年开展“渭南市‘绿盾2017’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从根本上扭转了秦岭北麓和乔山南麓采石企业多、小、散、乱的局面。



潼关新貌

污染防治。渭南的环境污染主要是伴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至20世纪80年代已比较严重，污染防治问题逐渐引起重视。70年代中期，废气、废水、废渣作为点源治理初步提出来，但治理方法比较原始简单，效果不佳。80年代，“三废”治理的重点是大中型企业，仍属点源治理，但治理技术有所提高，如秦岭电厂运用水膜式除尘设备治理废水，收到较好的治理效果。1986年至1990年，废水年排放达标率为61.27%，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56.83万吨。90年代，治污力度加大。开始了噪声污染的治理，关停138家小造纸厂，整顿潼关黄金生产环境，完成沿渭河污染治理项目60个，完成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治理项目194个，三大火力发电厂等一批重点污染源得到有效治理。2000年，废水年排放达标率64.99%，176个超标大气污染源排放达标率98%，年平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86.72万吨。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保护以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基本目标；污染源的治理重点由工业转向区域流域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11个县（市、区）建成12座污水处理厂，全部投入运行；建成10个无害化垃圾处理场、有7个投入运行。采取结构、工程和管理三大措施促进节能和污染减排，淘汰一批冶金、焦化、电力、水泥、造纸及土法石灰窑等落后产能，新上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等一批节能环保的大项目。建成8个在线监控平台，实现全市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全覆盖。推广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基本形成“区域大循环、产业中循环、企业小循环”的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实现了主要污染物的持续下降。2017年渭河水质明显改善，渭河吊桥出境断面达到省考IV类要求。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165天，大气污染物指标可吸入颗粒物（PM₁₀）、细颗粒物（PM_{2.5}）、二氧化硫（SO₂）、二氧化氮（NO₂）年均浓度分别为135微克/立方米、71微克/立方米、18微克/立方米、56微克/立方米，降尘强度9.3吨/平方米·月，全市空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5. 山水宜居

渭南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前秦苻坚甘露二年（360），筑城于今渭南市老城区以北，因位于渭河之南故名渭南。隋开皇十四年（594）文帝杨坚出巡到渭南，又令将县城迁到沔水东侧符秦城南，即现存的老城址。隋代以后，老城一直是渭南县治所在地。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渭南县城主干道只有一条东西向两公里长的人和大街（今老城街）。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到渭南，渭南县城成为关中东部的物资集散地。上海等地的一些商贾和当地的工商业主相继在渭南火车站附近开办工厂；在西门街和沔河西岸兴建商业店铺和粮食集市，县城区开



始向西扩展。到1949年渭南解放时，县城面积4平方公里，居民3.5万人。

1950年，陕西省政府将大荔分区并入渭南分区后，渭南县城成为关中东部的中心城市。1958年，三门峡水库开始筹建，渭南城区一度划入库区淹没范围之内，城市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当时一座总高度只有三层的“航运楼”，成为渭南的标志性建筑。1964年三门峡水库建设方案修改后，渭南城区划到淹没范围之外，工业企业重新在此布局，渭南纺织机械厂、陕西省印刷机器厂等一批大型企业相继建成投产，促进了渭南城市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渭南城先后修建和改造了解放路、站北街、人民街、民生路、东风大街东段、朝阳大街东段等街道。到1982年，城区建成面积11平方公里、人口12.25万人，工业产值3.6亿元。

改革开放后，渭南快速发展。1984年，渭南县改为渭南市。1995年，撤销渭南地区，设立地级渭南市。此后渭南初步形成了以化工、机械、纺织、食品为支柱的工业体系，建成了7大贸易市场，是关中东部商业贸易和物资集散中心，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面貌变化巨大，新建了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辟了渭河北部工业区，初步形成“一城三区”的城市形态。到2001年，城区总人口29.9万人，建成区面积31.6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五横四纵”的道路骨架。建成了沈河公园、中心广场等公共文化休闲场所。2000年左右建成的体育馆、电信生产楼、广电中心楼、国贸大厦等成为渭南的典型建筑，市区的商业中心由北塘巷西移到以国贸大厦为中心的东风大街中段。

进入21世纪，渭南经济总量平均增速由2000年的8.2%提高到2012年的14.5%，带动渭南城市建设步入突破式发展时期，体现了以人为本理念，突出了渭南中心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

2003年引入了“经营城市”的理念，成立了渭南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渭南城市建设改变以往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城市建设及管理模式，获得了较为充裕的建设资金和灵活的机制，也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已经完成的乐天大街中段、渭清路城区段道路工程和渭河大街西段、仓程路中段道路及雨水泵站工程，以及“渭南北火车站项目”“城投大厦项目”等一批重要的城市建设工程，都是在“经营城市”理念的指导下开展的。

2005年启动的卫生城市创建活动是渭南“城市的革命”。从2005年开始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到2011年成功成为国家级卫生城市，渭南市先后实施了城区绿化、朝阳公园建设、南塬北坡绿化、沈河橡皮坝蓄水、沈西干渠综合改造、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渭南市中心医院搬迁等22个创卫重点建设、改造工程项目。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城市功能完善是创卫的重点，通过土地置换、银行贷款、招商



黄河高铁第一桥

张让欣摄

引资、社会捐资等渠道，先后投入30多亿元，完成了乐天大街中段排水工程，杜化路中段、胜利大街中段、东风大街中段、乐天大街东段、金水路中段和杜化路南段道路建设工程，东风大街中段、乐天大街、前进路等路段弱电入地改造工程。通过创卫，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难题，从30余条黑巷子到一路一特色、一楼一景观的城市夜景风貌；从上厕所难到建成130余个标准化公厕；从脏乱差的菜市场到实施改造的15个划行规市、净菜上市等十项指标达标的农贸市场；从黑烟遮日到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0天以上；从三堆泛滥的城中村到整洁优美的村容村貌；从老城绿化、沈河景观绿化、渭清路景观绿化、滨河大道道路绿化、南塬北坡绿化等一大批绿化项目升级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美好人居环境……渭南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在实施卫生城市创建的同时，渭南还进行了省级园林城市、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省级文明城市、国家级创业城市创建活动。至2017年，渭南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40.3平方公里，人口40.5万人。市区跨渭河“北扩”发展，初步形成“一河两岸、四大组团”空间格局。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到37.46%、33.01%、12.13平方米。市政设施完好率达到95%以上，自来水水质综合合格率达到98%，城市路灯亮灯率达到98%以上。如今的渭南，南靠秦岭，北跨渭河，东连赤水，西达零河，沈河由南向北穿城而过，是一座名符其实山水城市。如今的渭南，道路通畅，环境优美，经济快速发展，市民安居乐业，城市文化璀璨繁荣，是一座城市魅力与日俱增的宜居城市。

6. 旅游胜地

渭南的旅游资源特色鲜明，久负盛名。从180万年至100多万年前甜水沟文化遗址到渭华起义革命旧址，全市有各类文化遗址3697处，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处。渭南市地貌类型多样，山河壮丽，以西岳华山、洽川黄河湿地为代表的一批自然景观与众多人文遗存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明显资源优势。

渭南古代旅游起步较早，主要以华山旅游为先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渭南境内第一家旅行社“华山道教服务社”成立。这时期渭南每年游客有两万多人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渭南的旅游业正式开始起步。开始重视旅游资源和景点的开发利用，旅游服务设施投资加大。

20世纪80年代是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形成了华山风景区和司马迁祠墓风景区。这一时期的旅游开发以保护和恢复华山风景区为主。游客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分别从1980年的11.3万人次、85万元增长到1988年的61.7万人次、1946万元。

90年代，渭南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进行资源的深度开发。制定了《渭南地区旅游总体发展规划》。至2002年，累计投入资金3.8亿元，完成35个主要开发项目。全市形成了以华山为第一阶梯，以黄河一线为第二阶梯，以渭北人文旅



少华山霜叶尽染金蟾湖

游景区（点）为第三阶梯的梯队发展模式，“南山、东水、北人文”大三角旅游环线初显雏形。旅游服务网络体系逐渐完善，到1995年，已有17家旅行社，25家涉外饭店，还有60余家具有较高档次的宾馆。全市拥有各类旅游企业60余家，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间接从业人员13万人。2002年，全市接待中外游客4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5亿元。渭南旅游业基本完成了从资源到开发、从单纯接待到产业经营、从单一景区服务到“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齐备的产业体系全面形成的三大转变。

自2000年国务院实施旅游黄金周节假日以来，渭南旅游业逐渐步入黄金发展时期。从2006年中共渭南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建立特色旅游名市的目标，到其后又提出着力打造国际山水文化旅游城市，旅游业成为渭南的战略主导产业。在巩固提高现有旅游景区的同时，鼓励倡导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形式，包括大力开发以少华山为代表的新兴旅游景点，发展以陶艺村、御温泉为代表的休闲体验游，鼓励以白水富卓人家为代表的“农家乐”旅游。卤阳湖国际通用航空节的举办，让渭南旅游板块形成了“南山、东水、北人文、西航空”的新格局。2009年渭南市旅游局和三门峡、运城、临汾三市旅游局联合签署《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协议》，以及渭南市与西部23个城市签订《中国西部旅游城市合作协议书》，开启了渭南与其他区域联合发展旅游业的新篇章。渭南旅游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17年，渭南市游客人数达到5330万人次，入选中国旅游百强城市；旅游综合收入426亿元。全市共有21个A级景区，其中有华山风景名胜区AAAAA级景区1个，少华山森林公园、富平陶艺村、洽川风景名胜区等AAAA级景区13个，林则徐纪念馆、清代考院等AAA级景区42个。黄河魂、白水富卓人家2个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富陶集团1个国家旅游示范点。

